

目 录

卷首语

- 3 张昕 / 读懂中国的同时，也读懂世界

俄政治历史的范畴问题

- 7 姚海 / 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 19 世纪俄国革命运动
- 28 B·马良文 / 俄罗斯和中国是欧亚联合体的两个顶梁柱
- 43 林莹 / 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转型——基于普京时代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解析

俄罗斯/欧亚研究中的问题领域

- 77 C·巴尔苏科娃 / 俄罗斯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当代选择——以农业政策为例
- 97 张广翔，张文华 / 苏联赶超型的核工业发展政策——以乌拉尔地区为例
- 143 万青松，万秋波 / 俄罗斯外语战略简析
- 173 赵静 / 语言政策及其对格鲁吉亚族际关系的影响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肖辉忠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市崇明裕安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8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8 年第 5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ан Синь

Предисловие (3)

Яо Хай

Рус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XIX век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зменения концепций (7)

Владимир Малявин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два столп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28)

Линь Ин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ы---Анал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в эпоху Путина (43)

С. Барсук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выб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На примере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77)

Чжан Гуансян, Чжан Вэньхуа

Политика догоня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ядер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На примере развития атомной отрасли в Уральском регионе... (97)

Вань Цинсун, Вань Цюбо

Краткий анализ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143)

Чжао Цзин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её влияние на этн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Грузии... (173)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8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ang Xin

Foreword..... (3)

Yao Hai

Understanding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the 19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 Changes..... (7)

Vladimir Malyavin

Russia and China: the Two Pillars of the Eurasian Cooperation (28)

Lin Ying

The Middle Class and Transition of Authoritarian System: Analysis of Russian Middle Class in the Putin Era (43)

Svetlana Barsukova

Russian Contemporary Choic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 Case of Agricultural Policy in Russia.....(77)

Zhang Guangxiang, Zhang Wenhua

The Catch-up Development Policy of Soviet Nuclear Industry---A Case of Nuclear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Ural Region (97)

Wan Qingsong, Wan Qiubo

A Brief Analysis of Russian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143)

Zhao Jing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Impacts on Ethnic Relations in Georgia..... (173)

卷首语

读懂中国的同时，也读懂世界

张昕*

一个以中文为主要工作语言的中国学者，如何来界定针对中国以外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与主义”？这恐怕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同仁们必须不断追问和实践的难题。以《俄罗斯研究》学刊覆盖的地区为例，中国学者研究苏俄历史、中亚现当代政治、研究欧亚地区语言文化的变迁等诸多问题，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是相关的、有旨趣、有意义的？尤其是，如果说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面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学术体系的全面主导，已经在努力发掘“本土资源”的意义、争取自身的国际话语权、甚至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话，那么针对另一个时空环境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我们又如何来确定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

这一期《俄罗斯研究》刊发的七篇论文，都没有重复诸如“中俄关系”这类的“热门”或者政策议题，也没有侧重那些看似容易与中国建立关联的议题。而是比较深入地进入了前苏东、欧亚地区的某个国家或者次地区的内部，有意识地展示了研究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同程度地展示了特定概念、理论和行为，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特殊意涵和规律性的形态。

其中，姚海教授提供了一个对19世纪俄国革命中一组核心概念的一个“概念史”的研究，通过梳理人们对这些概念在不同语境、情境下的不同理解，来帮助理解俄国革命史本身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俄罗斯学者马良文从历史长时段出发，阐发了长期历史文明积淀对于当下中俄两国推动发展

* 张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欧亚联合体”概念的意义。林莹对当代俄罗斯中产阶级和政体变化的研究，将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与政权间的关系，置于对此议题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基于其他国家的研究），以此凸显在这对关系上，当代俄罗斯可能具备的特点。巴尔苏科娃关于当代俄罗斯农业政策的研究和张广翔、张文华关于历史上苏联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政策，虽然关注的时段不同，但是非常相似地考察了历史进程中特定产业政策的形成、演变和不断变动中的政策结果。最后两篇论文（作者分别是万青松与万秋波、赵静），都将语言作为一个政治现象和组织政治生活的工具，梳理了一个长时段基础上的语言政策及其后果的变化形态。这一组论文关注的具体议题虽然各有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我们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视野，展示了这类研究可能的丰富性，同时也凸显出这个研究领域内在的焦虑和问题意识的内在张力。

现有区域国别研究中，相当一部分从属于国际关系领域，由于国际关系研究高度重视大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战略研究，导致大量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只围绕对方和中国的国家间双边关系展开，这往往严重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另一类区域国别研究，则完全依托专门的区域国别研究单位展开，不与研究对象以外的领域进行任何交流，这样的知识生产组织方式，往往助长“地域壁垒”。区域国别研究不可能完全脱开研究者所在国家的视野和需求，但不能完全依附于国家政策导向设定的研究议程。单纯的短期对策研究和紧跟热点的时事评论，都无助于学科的长期发展和知识的积累。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回应普适化的问题和理论体系，需要提供一个对于世界的普遍关照。相应地，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也应该对本区域、本国别研究专业人士以外的群体，具备足够的相关性和吸引力。

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的语境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学科基础是超越时政热点的问题意识的最重要来源之一。相应地，我们也不能把特定国别和区域变成拒绝与学科知识沟通对话的挡箭牌。当下，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基础、同时回应学科领域基础知识、而并不一定直接和简单地回应短期政策研究、并不一定只是从形式上和中国发生直接关联的研究，还需要在中国提供高质量的发表管道和交流平台。在关于世界认知的国家知识体系建设中，也需要进一步得到重视，这是发展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

的一个重大制约。如何鼓励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在专业学科领域的学刊和本国别研究领域之外发声，提升研究的综合能力和影响，也是未来需要加强的方向。在这些领域，本期的《俄罗斯研究》刊发的论文，实际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和提供了进一步批评的空间。而《俄罗斯研究》学刊本身，也希望成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内能够提供上述功能的一个平台。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别区域研究中四种常见的研究路径。第一是“情况说明”型的研究，以梳理某议题的来龙去脉、整理总结其基本情况为核心，往往以归纳、总结作为最重要的贡献；第二是政策注解和阐释型的研究，更接近于政策报告；第三是使用已有的、往往是基于其他时空条件做出的所谓“一般”或者“更普遍”的理论或者认知框架，来解释特定国别区域内的研究对象；第四则是相反的问题指向：使用特定国家、区域的事实，来验证、批评或者进一步丰富已有的、往往是基于其他时空条件做出的所谓“一般”或者“更普遍”的理论或者认知框架。在这几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中，至少后两种又直接或者间接地会依赖某种比较分析，这种比较往往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本期《俄罗斯研究》的七篇论文，分别不同程度地侧重于上述四种研究路径中的一种，而其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已经比较完善的学科分工中出现的“解释”、“阐释”和“批判”这三个最重要研究路径之间经常出现的张力。比如，赵静的研究极为精彩地梳理和展示了历史上格鲁吉亚内部语言政策的演变过程，但在语言政策是如何影响格国内族际关系的因果机制问题上则着墨不多，尽管作者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了回答这个研究问题的巨大空间。如果作者能将已有的材料和社会科学中有关语言与族群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文献更好地结合，这将会是另一篇精彩的研究论文。

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总结自己在英语世界中多年从事中国历史研究之后的经验之谈，对我们也有帮助：“这一切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我曾经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

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化分析)，了解其逻辑，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①这些话对于研究另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中国学者，是不是也有真切的启示呢？

当下中国学者的关切已不仅仅是“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完全可以、也应该为回应“中国如何读懂世界”，为建立中国对世界认知的国家知识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对此，本期《俄罗斯研究》刊发的论文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各自的尝试，《俄罗斯研究》也愿意继续提供这样的知识平台，与各位同仁共同努力。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93页。

俄政治历史的范畴问题

从概念变化的视角理解 19 世纪俄国革命运动*

姚海**

【内容提要】在 19 世纪中后期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演变中，以及对其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用以指称其不同流派或概括其整体性质的名词概念。在实际使用这些名词概念处理革命运动史的具体问题时，应研究理解这些名词概念自身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并厘清其相互关系，尽量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19 世纪俄国革命运动 革命民主主义 虚无主义 俄国雅各宾主义 民粹主义 俄国革命激进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 K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5-0007(21)

在19世纪50-8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中，以及对这个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名词概念，用以指称其不同阶段的不同派别，或概括其基本趋势和整体特征。这些名词概念都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历史，同时又互有交叉，存在某些重合。按照美国学者格里森（Abbott Gleason）的说法，这是一个名词概念的丛林，很容易陷于其中而迷失方向。^①事实上，学界在使用相关名词概念解释这一时期俄国革命运动不同阶段、各个流派或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 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0BSS01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项目批准号：11&ZD134）的阶段性成果。

** 姚海，苏州科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① Abbott Gleason, *Young Russia: The Genesis of Russian Radicalism in the 1860s*,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0, p.34.

体面貌、共性特征的时候，经常存在模糊或混淆其内涵和外延的情况，从而对认识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历史造成困难和疑惑。本文从相关主要名词的历史和概念发展的角度，探讨19世纪中后期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本质特征、内部派别及其相互关系，以期更加确切和全面地理解激进革命运动及其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革命民主主义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демократизм)

“革命民主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进步思想界对农民改革前后出现的激进革命思想流派的较早称呼。在很长时间里，更经常得到使用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者”（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демократы）和“革命民主派”（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这两个术语。

19世纪60年代初，在进步刊物《俄国言论》上开始出现“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个词组。激进知识分子舍尔古诺夫在《俄国言论》上发表的文章中，以此来指称那些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连的人民革命思想的人。《俄国言论》杂志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自己就是舍尔古诺夫文章中所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①列宁后来也经常使用“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个称呼。

苏联学术界一般认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到1850-1860年代，形成了俄国社会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革命民主派”。据16卷本《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的定义，革命民主主义融合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农民革命思想，把农民革命视为消灭农奴制度的手段，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俄国在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农奴制后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通过农民村社走向社会主义。^②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在本质上，革命民主主义是与一切文明文化生活中、一切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等级

① Журнал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http://www.portalus.ru/modules/shkola/rus_show_archives.php?archive

②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Демократы//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Е.М. Жуков. М., 1968. С.922-923.

基础相对立的。”^①

但在使用“革命民主主义”这个概念具体处理19世纪中后期革命运动历史的时候，苏联时期很多史学论著经常将其涵盖1840-1880年代中期的主要革命派别组织及其代表人物。他们认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840年代末至1850年代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奥加略夫；在1860年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比萨列夫及其追随者；在1870-1880年代是革命民粹派。这个名单表明，在实际使用“革命民主主义”概念时，其基本定义被忽略了，它几乎被等同于19世纪中后期整个革命运动。当代俄罗斯学者叶辛指出，革命民主主义成了一个筐，各种观点都被解释为革命民主主义，都装进了这个筐。^②

实际上，俄国革命运动的上述著名代表人物或派别虽然都主张通过革命来改变现实，但在对未来俄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对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的理解以及对革命策略的主张上，是存在重大差异的。把他们不加区别地纳入“革命民主主义者”之列，明显是不合适的。

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和拉甫罗夫等人，是渴望通过农民革命对俄国社会进行“村社社会主义”改造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者，把他们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符合“革命民主主义”的一般定义。但是，把别林斯基、比萨列夫等人也视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就非常勉强。当代俄罗斯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别林斯基、比萨列夫等人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支持者，而并非俄国农民革命和村社社会主义的主张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个称呼对他们是不合适的。在理论上，别林斯基、比萨列夫都独立于以俄国村社社会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民主主义”。在他们看来，共和制结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梯，俄国必须完成这个在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已经完成任务，而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反对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民主革命。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共同点是都主张以革命方式实现俄国社会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иерархия//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пб., 1998. С.245.

② См. Есин Б.И. Об одной ли революции думали русские демократы в 40-8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Белинский, Писарев, Благовестлов)// Медиаскоп.Выпуск. 2011. №4. <http://www.mediascope.ru/node/932>

变革，但是他们的革命性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正是这种个性特点使得他们在根本上不同于赫尔岑等“革命民主主义者”。^①

这个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苏联时期，对于别林斯基这样极为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比较片面的，只是强调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信奉暴力革命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阶段，而忽略其最终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性变革来改造俄国的事实。^②当代俄罗斯学者叶尔梅切夫在系统分析别林斯基的论著书信之后明确指出，别林斯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是19世纪30-40年代的俄罗斯爱国者、启蒙者。”^③至于皮萨列夫，他根本就没有在俄国村社社会主义中看到俄国的前途，相反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现象。他也不相信农民能够独立地解放自己和建设自由的社会，并断言在俄国还不具备革命的条件。他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捍卫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化学道路”，即社会通过渐变、提高生产力、对人民的启蒙和不断提高其福利，分阶段地转变为自由和公正的社会。^④

此外，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派别和人物，也是很难被定性为“革命民主主义”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与革命民主主义的基本定义相去甚远。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密谋派，完全就没有打算通过农民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始终坚信并鼓吹以密谋、暴力和恐怖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1879年成立的民意党为自己确定的基本任务，是实施以刺杀沙皇为最终目标的革命恐怖；其核心主张是革命恐怖主义，而不是革命民主主义。

如果以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为依据，革命民主主义只是186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倾向之一。当然它不是孤立的现象，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赫尔岑的村社社会主义和农民革命思想，对日后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学术界对“革命民主主义”概念及其适用性问

① См. Есин Б.И. Об одной ли революции думали русские демократы в 40–8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Белинский, Писарев, Благосветлов).

② 参见姚海：“别林斯基再认识”，《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期。

③ Ермичев А.А. Был ли Белински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демократом и социалистом?//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академии. 2011. Том.12. Выпуск.2. С.125.

④ См. Нюхтилин В.А. Шпаргалки по философию. 2003. <http://metek-site.ru/metek.php>

题进行的深入讨论，“反映了对19世纪革命运动的研究所秉持的现实、认真和诚实的态度。”^①目前国内学界几乎还没有注意到俄罗斯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化和认识的更新，但这种变化应该受到重视，因为正确解释和定义革命民主主义，是全面理解19世纪中后期俄国革命运动复杂性的必要前提。

虚无主义（нигилизм）

虚无主义是1861年改革之后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并很快发展为激进革命青年的运动。在时间上，虚无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基本上同时存在，但与作为社会政治思潮的革命民主主义不同的是，虚无主义在最初几年主要是一种影响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和运动。虚无主义最本质的内容，是对现存的一切持绝对否定的态度。

虚无主义这个词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就出现在俄国出版物中。作家纳杰日金在1829年发表于《欧洲通报》的题为“一帮虚无主义者”的文章中，在否定和怀疑的意义上使用了“虚无主义者”这个词，将虚无主义作为“空虚”、“无知”的同义词。据文学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回忆，纳杰日金当时使用的虚无主义这个词，还完全没有后来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赋予这个词的意思，而只是用它来指称那些什么都不知道、在艺术和生活方面没有任何基础的人。^②

1858年，喀山大学教授别尔维在其题为《对生命开始和结束的观点的心理学比较》一书中，把“虚无主义”作为怀疑主义的同义词使用，把那些否定任何现实生活的人称为“虚无主义者”。而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1858年第3期上撰文评论别尔维这本书时，也用到了虚无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50年代末，这个词还没有流行。^③

1861年，保守主义政论家、文学评论家卡特科夫提出，“虚无主义”这个词的含义类似于“唯物主义”。他在一些辩论性文章中对虚无主义所做的

① Журнал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http://www.portalus.ru/modules/shkola/rus_show_archives.php?archive

② Григорьев А.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1988. С.60-61.

③ С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т. XXI, СПб., 1892. С.11.

定义，与稍后屠格涅夫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基本一致，即把虚无主义解释为强硬的否定立场、主张为破坏而破坏、嘲笑有教养有文化的人所珍视的一切、讽刺俄国生活中所有进步的表现、缺乏任何正面观点的否定一切的理论。^①

屠格涅夫在其著名小说《父与子》中，用“虚无主义者”来称呼他塑造的人物巴扎罗夫，并借小说中人物之口为虚无主义者下了定义：“他们不顺从任何权威，不接受任何原则，不管这些原则是如何受到尊重。”^②

《父与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使得虚无主义这个词迅速流传。当时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指出，《父与子》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虚无主义”这个词，无论是这个词所代表的东西的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词。^③从《父与子》这部小说流行开始，“虚无主义”被普遍用来称呼准备和实行大改革时期的社会思潮，而“虚无主义者”则被用来称呼那些被认为是“六十年代的人”的俄国青年。

在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虚无主义者的形象。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中的伏洛霍夫具有否定一切的特点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毛病，反映了当时无论在首都还是在外省“都已越来越经常出现的否定或者虚无主义的症候”。列斯科夫、克留什尼科夫、阿维纳里乌斯等作家在描写“虚无主义者”时，把所有否定性色彩都集中在一起，使这个名词具有了明显的负面的含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掘了虚无主义的积极、肯定的方面。1862年下半年，他在监狱中写出《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并于次年刊登在《现代人》杂志上。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者正直、高尚、意志坚定、为人坦诚、热爱艺术、珍视爱情，对工作和前途充满信心，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这部由当时激进革命者精神领袖所写的反映新一代革命青年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其主角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青年的榜样和化身。

虚无主义的社会基础，是19世纪上半期形成的新一代非贵族出身的知识

① Ширинянц А.А. О нигилизме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http://www.portal-slovo.ru/history/35437.php>

② Тургенев И.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 Т.3. М., 1954. С.213-214, 186.

③ Илья Овчиннико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трахов и Герцен: конфликт или согласие// Русский Журнал / Круг чтения. <http://old.russ.ru/krug/00gerzen-pr.html>

分子。^①虚无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了他们对1861年改革的失望，对自由主义的失望，对俄国社会的失望。^②至于虚无主义的直接来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拉霍夫都上溯到西方派以及“四十年代的人”：格拉诺夫斯基、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和屠格涅夫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赫尔岑在“直接的虚无主义之父”中据有特殊地位。斯特拉霍夫也把赫尔岑称为“理想主义的西方派分子和极端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他在虚无主义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③

赫尔岑本人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初曾表示不赞同卡特科夫和屠格涅夫使用的“虚无主义”概念，但是后来他改变了看法。19世纪60年代末，赫尔岑一再强调，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虚无主义之父，“十二月党人是我们伟大的父亲，巴扎罗夫们是我们纵欲的儿子。……我们这代人留给新一代的是什么呢？是**虚无主义**。”^④赫尔岑表示，他愿意为巴扎罗夫们的全部缺点和罪孽承担责任。

19世纪70年代，虚无主义一词在俄国辩论性文学中出现得少了，但在欧美报刊上却成为当时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符号。人们经常认为，俄国1860-80年代发生的一切骚动都出自于虚无主义者之手。^⑤1870年2月12日，马克思在读了弗列罗夫斯基所著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后对恩格斯谈到了俄国的社会局势，认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在俄国大学生等等中间风行一时的学

① 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俄文为：разночинцы，国内通常译作“平民知识分子”。但разночинцы的基本词义是“各种身份地位的人”。在19世纪，它指的是出身于贵族以外各个等级的知识分子。按照当时俄国的等级划分，贵族之外还有神职人员、荣誉公民、商人、市民、哥萨克和农民等不同等级，不宜将这些等级一概称之为平民。俄国不存在一个对应于贵族阶层的平民阶层。一些学者强调，俄国从来就没有过西欧类型的等级关系。事实上，当时不少著名激进知识分子都不是出自于我们所想象的平民阶层。例如，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来自于神职人员甚至较高职位神职人员的家庭，把他们称为平民知识分子是不合适的。在本文中，разночинцы这个词按其本义译为“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

② 参见姚海：“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及其根源”，《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第75-76页。

③ См. Илья Овчиннико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трахов и Герцен: конфликт или согласие.

④ См. Герцен А.И. Еще раз Базаров// 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омах. Т.8. М., 1975. С.316.

⑤ Зиновия Березка. Нигилисты и революция. 2012-02-21. <http://propaganda-journal.net/4982.html>

校青年虚无主义的现实基础。”^①

以否定一切为特征的虚无主义思潮和运动不可能长时间局限于社会文化层面，其政治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虚无主义运动酝酿了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两个重要倾向：一方面，许多虚无主义青年决心把知识和文化送到群众中去，进而发动和组织群众。他们到工业城市去做工，在工人中间组织合作社，开办文化补习学校，这就是后来“到人民中去”运动的发端。另一方面，虚无主义运动中崇尚暴力和恐怖的倾向逐渐发展，俄国雅各宾主义的形成，以及1866年卡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成为19世纪70年代革命恐怖主义的先声。

苏联时期，虚无主义这个历史名词在革命运动史研究中被淡化了。但是，作为对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称呼和概括，虚无主义不应被忽略和遗忘。虚无主义对19世纪下半期激进革命运动的面貌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很难抹掉的。在当代俄国史学界，虚无主义运动重新引起关注，出现了一些直接以虚无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成果。^②有观点认为，虽然19世纪俄国激进革命思想包含的具体观点多种多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否定俄国“丑陋的”现实和存在的一切；俄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虚无主义”，可以把“虚无主义”与改革后俄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视为同一事物。^③当然，这只是就改革后俄国革命运动总体上的否定特征而言，而对于其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和内部的差异，则必须有更具体的描述和进一步的概括。

俄国雅各宾主义（якобинство русское）

意大利学者文图里从俄国革命思想史的角度指出，“虚无主义”是同时流入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两股思潮的源头：如果强调个人的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8页。

② См. Ударцев С.Ф.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правовая теория анарх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М., Форум-М, 1994. С.11

③ Ширинянец А.А. О нигилизме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http://www.portal-slovo.ru/history/35437.php>

抗，就会到达无政府主义；如果强调少数革命家的政治作用，就会到达雅各宾主义和革命精英理论。^①国内学界对于以巴枯宁为代表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已有较多关注，而对于俄国雅各宾主义还鲜有涉及。^②

俄国雅各宾主义是19世纪下半期俄国革命运动中最极端的流派，形成于1862-1866年间，其后逐渐发展为俄国革命运动的主流，对整个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俄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对俄国雅各宾主义的定义是：“俄国解放运动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时期的一个革命思想流派，其主要特点是将革命视为由少数革命者实行的通过密谋夺取政权的政变，主张通过革命专政保卫革命成果并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改造。”^③

在俄国激进革命知识分子中，对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推崇从十二月党人就已开始。彼斯特里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明显的雅各宾主义性质，他本人也经常被称为雅各宾主义革命者。一些当代俄罗斯学者强调，彼斯特里系统地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首先是雅各宾主义。19世纪40年代，别林斯基一度也迷信罗伯斯庇尔，认为暴力和流血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必然途径。

19世纪60年代初，一些激进革命者更具体地宣扬，为了革命事业必须实行大规模的恐怖。当时刚进大学、后来成为俄国雅各宾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特卡乔夫认为：“为了改造俄国，必须杀掉所有25岁以上的俄国人”。^④另一位激进革命者舍尔古诺夫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应该杀掉作为现制度支柱的十万个地主、所有贵族高官和整个寄生特权阶层。^⑤这些典型的雅各宾主义言论，在激进革命青年中传播很快。俄国雅各宾主义形成的标志，是1862年春天由莫斯科大学学生扎伊奇涅夫斯基以“中央革命委员会”名义撰写，并得到迅速传播的《青年俄罗斯》小册子。作为俄国雅各宾主义的政

①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327.

② 参见姚海：“俄国雅各宾主义的形成”，《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3期。

③ Якобинство русское//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Е.М. Жуков. М., 1968. С.860.

④ 特卡乔夫的姐姐在回忆录里提到了这一事实。См. Анненская А. Из прошлых ле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Н.А.Анненском)// 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 1913. No.1. С.62.

⑤ К молодому поколению// Рудницкая 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М., 1997. С.100-102.

治宣言,《青年俄罗斯》绝对地否定改革,认为摆脱俄国现状的唯一出路是消灭一切现存秩序支持者的流血的无情的革命;提出了必须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的恐怖的思想;强调革命党夺取政权后应在政治上保留中央集权、坚持实行专政、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社会实行改造。^①《青年俄罗斯》对恐怖、暴力和密谋的推崇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19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以至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青年俄罗斯》奠定了俄国雅各宾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伊舒金小组则最先开始了俄国雅各宾主义的实践。^②伊舒金小组成立之初,曾把准备和落实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这本书里提出的教育、组织和发动人民,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但是由于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没有结果,小组主要成员对宣传和文化工作失去信心,转而接受了《青年俄罗斯》的雅各宾主义观点,开始进行密谋和恐怖活动。

1866年2月,在伊舒金小组中成立了一个名为“组织”的秘密小团体,其任务是利用开办合法的图书馆、书店等形式,在各地建立一个由“中央革命情报局”领导的革命组织网络。^③伊舒金小组确信,在他们采取一系列革命行动包括恐怖行动之后,沙皇政权必然会张皇失措,统治权力将会陷入街头血污。不久,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活动,在“组织”的内部又成立了一个更秘密的名为“地狱”的核心组织,由大约30人组成,其直接任务是对统治阶层代表人物实施肉体消灭,最高目标是刺杀沙皇。^④伊舒金要求,“地狱”的成员必须彻底摆脱道德准则的束缚,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那些妨碍和干扰事业的人的生命,在必要时也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在组织内部宣布的非道德原则和采用的控制方法,实际上就是稍后涅恰耶夫《革命者信条》的早期版本。

① См. 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Е.Л. Рудницкой. М., 1997. С.147- 148.

②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伊舒金 1840年4月3日出生于萨拉托夫省,1863年到莫斯科做旁听生。当年秋天,以伊舒金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虚无主义青年小组。

③ Радик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60-90-е годы XIX века составил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ый и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этап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http://allrefs.net/c2/47w7k/p33/>

④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p.336.

就本质而言，伊舒金组织是以乌托邦理想与极端手段相结合为特点的。小组成员认为，暗杀沙皇将会引爆一场社会革命，至少能迫使政府做出重大让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组织成员卡拉科佐夫^①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次行刺沙皇，这是俄国雅各宾主义的首次重大行动。

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涅恰耶夫现象，是俄国雅各宾主义达到新阶段的一个标志。涅恰耶夫曾在伊舒金组织中接受了最初的革命锻炼，把伊舒金尊为自己的“精神之父”。他提出了实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恐怖活动的设想，建立了名为“人民裁判”的密谋组织，并且首先策划暗杀了不满其专横做法的组织成员、大学生伊万诺夫，以期“用血来巩固组织”。他提出的由一个少数革命家组成的“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来安排未来社会秩序、用强制命令的方式组织全部社会生活的狂妄想法，被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为“荒诞的实际组织计划”、“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②

俄国雅各宾主义的主要理论家特卡乔夫，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运动中密谋派的代表人物。但他认为“一切通过人民”的民粹主义口号，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凝聚为高度集中的密谋组织的革命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唯一创造性推动力量。在民意党的理论、纲领和实际活动中，俄国雅各宾主义的主要内容，如密谋、恐怖、由少数革命者夺取政权并改造社会的思想，占有决定性位置。

俄国雅各宾主义是贯穿于1860-1880年代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倾向。它与当时其他革命思想、派别和组织有联系，但也有明显差异。例如，它与革命民主主义有接近之处，但并不坚持农民革命和农民社会主义，而更侧重于密谋、恐怖和暴力的斗争手段。它与民粹主义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革命民粹主义密谋派的代表特卡乔夫和民意党主要领导人，都是典型的俄国雅各宾主义者，但是民粹主义运动中以拉甫罗夫为代表的宣传派，和“土地与自由社”中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农村派（“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后是“黑土重分社”），则不能归入俄国雅各宾派之列。

① 卡拉科佐夫也来自萨拉托夫省，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与伊舒金是表兄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1页。

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1860-1870年代之交，民粹主义登场了。民粹主义问题被认为是苏联（俄罗斯）“历史科学中最复杂、最尖锐、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①为了解民粹主义的复杂性，需要了解民粹主义这个词的产生和定义的变化。苏联时期著名俄罗斯语文学家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在《词的历史》中指出，“19世纪60-70年代形成了一个新词：народник（民粹主义者），用来指称激进知识分子中一个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人物。该流派认为，农民是理想国家机构的唯一基础。中性名词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民粹主义或民粹派），形容词 народнический（民粹主义的）。”但那时对这个词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很明确的界定，斯拉夫派、莱蒙托夫、普希金都被认为是народник。^②美国著名俄国史专家派普斯则认为，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这个词是在187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只是用来描述当时俄国激进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往往还带有贬斥的意思。^③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народник还是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它们在书面俄语中得到普遍使用的时间要晚得多。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在达里的词典以前，没有任何一部[俄语]词典收入这些词。”^④查阅达里《俄语详解词典》的不同版本可以得知，这部词典第二部分（字母И-О）1865年的第一版和1881年的第二版中都还没有这些词，直到1905年的第三版才收入了народник。^⑤这意味着，与民粹主义有关的词，是到20世纪初期才被收入标准俄语词典的。

但在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有所扩大。1897年出版的勃洛克豪斯和叶夫隆的《百科词典》，是较早收入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这个词的百科类辞书。在这部《百科词典》中，民粹主义第一次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了解释：“这一术语没有很确定的词义。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被用

① Троицкий Н.А.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как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756.htm

②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слов. <http://wordhist.narod.ru/pred.html>

③ Abbott Gleason, *Young Russia: The Genesis of Russian Radicalism in the 1860s*, p.33.

④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слов. <http://wordhist.narod.ru/pred.html>

⑤ См.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Даля (3-е издание). Том.3.СПБ, 1905. С.1200-1201;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слов. <https://azbyka.ru/otechnik/Spravochniki/istorija-slov/829?>

于指称一些不同的思想。在19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刊物与街头爱国主义激烈辩论的时候，‘民粹主义者’经常被定义为粗鲁的沙文主义和大众肆无忌惮本能的代表。同时，民粹主义经常被用作民主主义和关注人民的同义词。……在当代俄罗斯文学评论中，通常划出一类‘民粹主义小说家’，其中既包括格列布·乌斯宾斯基，也包括H.B·兹拉托弗拉茨基，尽管他们代表了对人民生活的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作家和政论家谁都不愿意被称为‘民粹主义者’。只有卡布利茨-尤佐夫声称自己的观点是‘民粹主义理论’，而这又导致很多在认识上接近民粹主义的人抗议把自己称为民粹主义者。……尤佐夫逝世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产生，‘民粹主义者’这个术语似乎又复活了。围绕在《新言论报》(Новое Слово)周围的作家和他们的主要理论家B.П·沃龙佐夫，虽然没有自称为‘民粹主义者’，但不反对别人这样称呼自己。应该承认，民粹主义在其较好含义上是我们精神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①

与勃洛克豪斯和叶夫隆的《百科词典》差不多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很有影响的《格拉纳特常用百科词典》，但它没有收入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者等名词。

在19世纪90年代那一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和俄国革命未来发展的著名论战中，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俄国版本称为“民粹主义”，从而使这个以往很少被使用的术语逐渐流行起来。^②司徒卢威把所有那些否认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激进分子都称为民粹主义者，将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民粹主义之父。从司徒卢威开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流派受到关注并进入了俄国思想和学术领域。司徒卢威关于民粹主义的观点，被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学家波古察尔斯基(雅科夫列夫)所接受，对20世纪初俄国革命之后的苏联史学界也有很大影响。

第一次俄国革命后，1909年出版的勃洛克豪斯和叶夫隆《小百科词典》第二版对民粹主义这个词作了新的解释：“19世纪7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流派，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研究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知识分子

①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СПб, 1897. С.586-587.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лахо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еакционер.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52037>

与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接近。民粹主义产生于这样的思想：人民（主要是农民）中间存在的社会和道德理想（如村社和劳动组合原则、宗教信仰等），可以成为社会改造的出发点。由此开始，知识分子渴望‘到人民中去’，‘扎根土地’，向社会和道德基础高于受过教育阶层的人民学习。一些作家相信，由于俄国人民的生活具有这些特点，俄国的政治和社会演变不会步西欧的后尘，并将绕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在20世纪初的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主义党的纲领中，民粹主义思想被归纳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这一口号。^①可以认为，这个定义是最接近于1917年革命以后对民粹主义的一般认识的。

十月革命以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俄（苏联）学术界对俄国民粹主义的评价曾是充分肯定的，并且特别强调民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精神联系。但在基洛夫被刺杀后，对民粹主义的评价逐渐转为否定。斯大林在小范围里说过，“如果我们用民意党人去教育我们的人，那就是在培养恐怖分子。”^②在1937年6月联共（布）中央《关于近期宣传工作》的决定中，民粹主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③所有民粹派活动家，包括革命民粹派和自由主义民粹派，都遭到否定。解散了全苏政治流放者协会，停办其刊物《苦役与流放》，停止已经开始的出版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等人著作的工作。^④

1938年出版的乌沙科夫《俄语详解词典》被称为20世纪第一部标准俄语词典，它收入了народник（民粹主义者）这个词，将其定义为“民粹主义的追随者”，但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民粹主义）却没有出现在词典中。^⑤1939年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第一版第41卷有民粹主义词条，对它的解释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具有革命情绪的非贵族知识分

①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Мал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в 4 т. СПб., 1907-1909.

② См. Седов М.Г.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 теоретиках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В кн.: История и историки. М., 1965. С.257.

③ См. О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Правда, 15 июня 1935.

④ См. Троицкий Н.А.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как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756.htm

⑤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4 т.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Дмитрия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Ушакова.Т.2. М.: Гос. ин-т «Сов. Энцикл», 1938.

子的运动，其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映了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利益”，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创始人，巴枯宁、拉甫罗夫和特卡乔夫所代表的三种倾向，构成了民粹主义的理论基础。^①这个解释在很长时间里是对民粹主义的标准定义。

对民粹主义的学术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恢复。苏联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概念的形成、定义及其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位置问题，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

涅奇金娜(М.В. Нечкина)、科瓦里钦科(И.Д. Ковальченко)、列文(Ш.М. Левин)、斯米尔诺夫(А.Ф. Смирнов)和索科洛夫(О.Д. Соколов)等人认为：(1) 民粹主义只是解放运动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阶段的一个时期，即1870-1880年代；(2) 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及60年代整整一代革命活动家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非民粹主义者；他们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萌芽，但还没有形成系统观点，民粹主义是到1860-1870年之交才形成的；(3) 俄国解放运动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革命民主主义时期(186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时期(1870年代)和自由民粹主义时期(1880-90年代)。

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如伊登贝格(Б.С. Итенберг)、谢多夫(М. Г. Седов)、安东诺夫(В.Ф. Антонов)、特瓦尔多夫斯卡娅(В.А. Твардовская)和菲利波夫(Р.В. Филиппов)等人则认为：(1) 解放运动中整个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阶段都是民粹主义性质的；(2) 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和最权威的思想家；(3) 因此俄国解放运动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即1860-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时期，以及1880年代初到1890年代中的自由民粹主义时期。^②

两种不同意见实际上涉及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产生了这样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民粹主义者吗？或者，民粹主义者是(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吗？”^③应该指出，以涅奇金

①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Том.41. 1939. С.170-172.

② Троицкий Н.А.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как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http://www.situation.ru/app/j_art_756.htm

③ Там же.

娜为代表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也更便于厘清当时各种革命思想和派别的发展线索及相互关系。而按上述第二种意见，亦即基本上延续了司徒卢威观点的意见，19世纪中后期革命运动的所有派别、组织和人物都被归纳于民粹主义，使民粹主义成了一个庞杂的没有明确边界的术语。因为在事实上，民粹主义是革命运动在一个时段内的具体表现形式，民粹主义概念的特定内涵使它难以概括和包容整个1850-1880年代的革命运动、不能反映这一时期革命运动各阶段和各派别都具有的共性特征。

苏联（俄国）学界一般认为，民粹主义的激进化是一个递进的过程，从主张宣传，到鼓动暴动，到密谋恐怖。但在严格意义上，这一说法只适用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革命民粹主义。如果将此说法扩大到上述第二种观点即广义的民粹主义，对一些具体问题就不能自圆其说。例如，1862年扎伊奇涅夫斯基撰写传播俄国雅各宾主义的宣言《青年俄罗斯》、1863年伊舒金密谋恐怖组织成立、1866年卡拉科佐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等极端激进思想和行动，都远远早于主张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的相对温和的民粹主义思想家拉甫罗夫，都发生在民粹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之前。这种情况说明，在19世纪中后期的革命运动中，存在着多种倾向和多个派别，它们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虽然互相之间有一定的交集和影响。

在西方学术界，美国学者格里森对民粹主义概念有独到的解释。他认为，民粹主义是个好词，但它不能在未经定义的情况下使用。首先，在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还没有人在广义上实际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术语，这一事实应该会让那些谨慎的历史学家仔细斟酌。其次，那时的激进革命思想和运动经常被用模糊而难懂的术语“虚无主义”来指代，而虚无主义这个词本身都还需要定义。第三，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激进革命运动主要是在封闭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小组内进行，带有秘密的、地下的和精英的特征，因此很容易使历史学家们将之称为“雅各宾主义”或“布朗基主义”。格里森还特别提到，美国著名俄国史专家理查德·派普斯对使用“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这一术语来指代俄国革命运动整整一个阶段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格里森指出了民粹主义概念的泛化引起的问题，但他认为，1860年代到1880年代俄国激进革命者的指导思想，是在一个大的智识框架内形成

的，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术语或概念来替代的情况下，民粹主义仍是对这些思想的一个比较好的概括。^①

格里森的这个意见是在1980年发表的。10多年之后，俄罗斯学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更为合适的术语和概念来概括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革命运动，这就是“俄国革命激进主义”。

俄国革命激进主义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者开始使用“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来定义19世纪中后期俄国革命运动的总体面貌和本质特征。1997年，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推出了由鲁德尼茨卡娅主编并作序的文件集《19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②文件集系统地收录了19世纪50-8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各个流派的纲领性文件、宣传鼓动材料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文章、书信、小册子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9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革命激进主义”的概念是从“激进主义”演变而来。“激进主义”这个名词产生于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被用来定义当时的改革运动。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主义走向极端，形成了雅各宾派所代表的“革命激进主义”。

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这个词。政论家卡特科夫在1840年的《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杂志上，最早使用这个词来指称当时激进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③从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期，俄国的亲政府的或自由主义的出版物，经常从否定性角度解释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几乎成了虚无主义和反抗现实的同义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一时期激进革命思想的表达方

① Abbott Gleason, *Young Russia: The Genesis of Russian Radicalism in the 1860s*, p.33-34.

②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Рудницкой Е.Л. М.,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1997.

③ См. Тонких В.А., Ярецкий Ю.Л.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правовой мысли России. М.: ВЛАДОС, 1999. С.232-233.

式和实践特点有关系的。^①

俄国（苏联）学术界对于激进主义概念的定义，百年来基本上没有变化。革命前的勃洛克豪斯和叶夫隆《百科全书》对激进主义的解释是：“源自拉丁文radicalis, radix。政治的或教会的、宗教的甚至哲学的激进主义，是一种原则或流派。这一名词意味着试图将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意见引向其根本的逻辑的或实践的结论，且不作任何妥协。”^②当代俄国学术界将激进主义定义为“一种在任何改造活动中要求彻底的根本性变化和最圆满结果的绝不妥协的倾向。”^③激进主义“经常被直接解释为要求从根本上改造政治进程、准备用坚决的不妥协的行动、极端的手段达到自己目标的心理结构”。^④作为社会政治流派，激进主义者不接受现存秩序，也不接受渐进变革的方式，其主要目标是以革命的方式根本改变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因此，理解激进主义不是取决于某种观点，而是斗争的方式。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中，都可以有自己的激进一翼，其立场的特点通常表现为不妥协性，有时还具有极权组织的色彩。^⑤

以鲁德尼茨卡娅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将19世纪中后期主张以革命方式实现俄国改造的思想及其影响下的革命运动，概括为“俄国革命激进主义”。之所以强调“**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是为了将其与原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激进主义”区分开来。在为《19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这本历史文献汇编所写的长篇序论中，鲁德尼茨卡娅特别突出了俄国雅各宾-布朗基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线索，将其视为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的主要体现。^⑥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用“革命激进主义”概括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革命思想和运动是有依据的。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各个革命派别、组织和代表人

① Костин Ю.В. Российски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http://www.jeducation.ru/4_2008/87.html

② Радикализм//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С.-Пб.: Брокгауз-Ефрон, 1890-1907. <http://dic.academic.ru/dic.nsf/brokgauz/18022>

③ Нов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4 т. М.: Мысль.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С. Стёпина. 2001. http://dic.academic.ru/dic.nsf/enc_philosophy/4730/

④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 Под общ. ред. А.А. Деркача, В.И. Жукова, Л.Г. Лаптева.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1. С.382.

⑤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и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России в 19 веке. Русский Радикализм. <http://5fan.ru/wievjob.php?id=9868>

⑥ Рудницкая 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М., 1997.

物，全都或多或少地接受和发展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所代表的革命激进主义。

19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到实践的发展过程。作为早期的俄国雅各宾主义者，十二月党人彼斯特里比较系统地表达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思想。1830-1840年代，赫尔岑、别林斯基也都曾崇拜过罗伯斯庇尔。不过，直到1861年改革前，激进主义基本上仍在一般民主主义思想的轨道上发展，并且主要体现为一种思想的表达，还没有进入实践和行动的阶段。^①

但是，农民改革不能满足激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反而引起了他们对改革的强烈不满和抵制。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俄国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破坏现存制度来实现自己所渴望的目标，他们“不能抵制这种想法的诱惑”，^②并以投身革命的方式给自己关闭了参与改革的道路，把自己排除在可能成为其政治活动学校的实际工作之外。从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号召罗斯拿起斧头”，到1862年俄国雅各宾主义的宣言、1863年以发动农民暴动为目的的“喀山密谋”、1863年伊舒金小组成立、1866年卡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1860年代末为革命不择手段的涅恰耶夫现象、1870年代初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暴动思想的盛行、“到人民中去”运动的展开、1876-1877年建立农民武装、发动农民革命的“奇吉林密谋”、1878年查苏里奇行刺圣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将军和随后的革命恐怖主义浪潮、1879年索洛维约夫行刺亚历山大二世未遂、1870年代末特卡乔夫提出革命恐怖是“俄国道德和社会复兴的唯一手段”^③的理论，直到革命恐怖组织“民意党”成立、多次组织针对沙皇的恐怖行动并最终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这一系列重要事件，展现的正是俄国革命激进主义不断发展和强化的历程。

俄罗斯学界推出“俄国革命激进主义”这个概念，来概括19世纪中后期俄国革命运动，抓住了这一时期革命运动中各个派别、组织和主要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共有的本质特征，找到了他们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对现实持绝不妥

① См. Костин Ю.В. Российски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② Леонтович В.В.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762-1914). Париж, 1980. С.185-186.

③ См. Рудницкая Е.Л.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М., 1997. С.433.

协的彻底否定态度，坚定不移地把革命作为彻底推翻现存制度、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唯一途径。虽然激进革命运动在不同阶段的主要倾向，及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道德面貌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而言，作为现存制度的叛逆者、批判者、否定者和破坏者，他们具有一脉相承的革命激进主义特征。科斯金认为，俄国革命激进主义产生于俄国社会的特殊性，它建立在迷信暴力的基础上，具有反宗教的无神论的性质和战斗的进攻性质。^①而在其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纲领越激进，实现纲领的策略就越极端，因为理想的激进程度与现实的历史前提是成反比的。在意识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在通常条件下绝无可能实现的情况下，激进革命者便寄希望于非常手段和非常途径，试图通过密谋、暴力和恐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19世纪中后期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一系列名词概念相继出现、流行以及被另一些名词概念所替代，反映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革命运动激进化的历史。在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的某些交叉和重叠，表明了革命运动中各倾向各派别之间在精神、纲领和策略方面的联系。而“革命激进主义”概括了它们的共性特点，较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俄国革命运动的面貌、本质和趋势。

俄国革命激进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形成和演变，既是俄国历史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也是独特的俄国发展道路的结果。它不仅给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也深刻影响了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俄罗斯的命运。

【Abstract】 During and when exploring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some concepts of nouns were used to refer to their different genres or to summarize their overall nature. While employing these noun concepts to deal with specific problems of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istory, we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① Костин Ю.В. Российски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and changes of these concepts. Only when we know their connotations, extensions, and clarify their mutual relations, can we objectively reflect basic features and trends of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during this period.

【Key Words】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Nihilism, Russian Jacobin Populism, Russian Revolutionary Radicalism

【Аннотац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и эволюц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ередины и конца XIX века, а также в процессе его позна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озникли некоторые понятия и концепции, использующиеся для обозначения раз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да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или обобщающие его общую природу. С целью понимания конкретных проблем истор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анных концепций следует изучить историю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и изменения данных понятий, уточнить их коннотацию и развёрнут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ояснить 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попытаться объективно отразить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данный период.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XIX век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нигилизм, русское якобинство, популизм, русски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和中国是欧亚联合体的两个顶梁柱*

B·马良文**

【内容提要】未来的欧亚大陆有可能成为以俄中两国为基础的具有超文明性的联合体。它不仅具有地区意义，更有世界意义。与西方地缘体系自我认同的原则相反，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区别原则与协同原则，将“玄同”、“混合”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关系”范畴纳入其中。中国社会的协同和网状特性，以及相应的欧亚元文明的双层结构，对改变世界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欧美世界体系和欧亚世界体系并不一定彼此冲突，按照协同原则，两种体系可以同时并存，形成彼此之间能够互补的、多种地缘体系共存的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俄中应加强人文等诸多领域的深入而又全方位的合作。

【关键词】中俄关系 欧亚超文明联合体 欧亚大陆 中俄人文对话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5-0028
(15)

国际局势的新变化，要求我们换个角度重新审视俄中互动的的基础，研究两国关系发展的全新理论和前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俄关于远东西伯利亚历史认知的比较及当代启示”（项目编号：18BGJ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原文刊于俄罗斯《发展与经济》杂志2018年第19期（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два столп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Развитие и экономика. №19. март 2018）。感谢作者授权本刊发表。

** B·马良文（Владимир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Малявин），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

近年来，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号召在欧亚大陆创建统一的经济空间，并以此促进全球秩序的根本改变。俄罗斯注定是这项规划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能够提出相应的经济创意，而且还要在欧亚大陆区域内寻找与中国进行更紧密及全面合作的方法。

尽管俄罗斯实业界努力抓住各种合作的机会，但他们常常会遭遇失败，或者遇到种种不可预见甚至难以理喻的困难。俄中两国的政治关系也经历过不少突然发生的、看似毫无理由的挫折。究其原因，往往是人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错误导致的：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世界观去衡量他人，特别是具有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

西方政客会不由自主地以他们烂熟于胸的个性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为出发点与中方交往，但却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哪怕是稍有成效的对话。到中国经商的西方商人秉持的是“生意是市场匿名参与者的互动”的理念，会遭遇不解甚至敌意。在中国工作的俄罗斯实业界人士努力“用自己的方式”与中国伙伴私下达成协议，搞俄罗斯国内那一套，似乎也能得到中国人的理解。但一般而言，最终往往都是无果而终。有时外国人会努力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反复强调自己对中国的情感和尊重，但他们也会很快意识到，这些尝试不会见效，中国人对他们仍然态度冷淡甚至很不友善。个中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心态和生活方式的某些重要特性。不仅如此，欧洲人还没意识到，在他们与中国人接触过的程中，无意甚至有意地遵循着西方典型的对抗式的意识形态。

再比如，“如何在谈判中战胜中国人”这类图书在俄罗斯层出不穷。然而，在与中国交往中唯一有效并能促进中方理解的方法，是中国强调和宣传的“双赢战略”。不需要费尽心力在政治或者商业活动中说服中国人，更何况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也很难做到。不要总想着战胜中国人，要唤起他们的愿望，使之愿意参加我们自己的事业规划，并利用他们的资源达到双方共同的目的。当然，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唯一可行的。

中俄合作的必然性

毫不夸张地说，消除俄中人民之间的互不了解和误会，是俄中合作领域最迫切的任务。可以分三个阶段或者说从三个方面发展俄罗斯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一是确定中俄世界观、民族心态及文化认同的独特性，总而言之，找出双方做事出发点的独特性；

二是认知双方的交际特点，特别是俄中商业文化的交往特点；

三是确定俄中合作做伙伴所面临的战略任务。

不难发现，俄罗斯与中国的确是战略伙伴，这不仅是世界局势变化所致，就双边关系的本质而言，也应该是战略伙伴。俄罗斯自主宣布“转向东方”，努力保持自己在中亚的传统优势地位，同时也要从与中国发展关系中获益。相应地，中国正在向西推进，并且打算成为欧亚强国。于是，两国发展的这种差异性使得中亚、南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俄中合作具有前景的区域。中国是该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强国。然而，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因素制约着中国在该地区的拓展，其中之一就是中亚各国及蒙古国对中国的警惕。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该地区有着不容置疑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因此，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在中亚和欧亚相邻地区进行平衡和互补，在与自己有密切联系的地区达到牢固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实现该区域稳定的必要条件是，跨地区的各个国家能够自由地发展与俄罗斯或者中国的关系，不打破现有的平衡。

尽管俄罗斯及其主导下的欧亚联盟与中国之间会因具体问题时不时产生各种分歧，但我们始终是平等的伙伴关系，都尽心尽力地维护着相互尊重和友好合作的氛围。中国的拓展是北约和欧盟东向扩张的巨大反力，而北约和欧盟东扩是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强的主要原因。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有更广阔的前景，还因为中国的东向拓展还包含一个同样重要的方向——东方，这里指的是太平洋地区。俄罗斯和中国在该地的角逐明显被排除了。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尤为重要，因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会在亚太地区加强与中国的对抗，因此，中国在西部边境拥有坚实

的大后方具有重要意义。这将提高俄罗斯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可以说，在欧亚和亚太地区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俄中两国继续进行全面合作。不仅如此，该地区正在逐渐形成全新的国际秩序，尽管进程缓慢，但定会对世界秩序的全球建构带来方方面面的重大影响。伴随这种秩序生成的，是发生在诸多领域的种种实验：金融（出现了不依附于外汇的国际结算形式）、基建（修建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走廊）、经济合作、政治互动（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国际政治（多极世界理论）、欧亚地区特有的文化互动的形式，等等。

协同——理解欧亚世界观的关键

我们可以借助“协同”（Синергия）这一概念，探寻俄中的共同理论。借助这种理论，可以构建一种新的、建立在俄中关系基础之上的秩序，就其本质和目标而言，它同时也是全球秩序。目前，“协同”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人文学科也偶有使用）：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文化理论、系统学等等。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协同一词意味着“协助”和“合作”，但该词也有其独立的含义，因为与“合作”不同，该词属于这样一些“联系”和“关系”，它们不在反思的范围之内，不被有意识地进行调节。协同可以从最简单的生活形式开始，打造出新的经验品质甚至新的生活方式。在人类生活中，“协同”几乎是“创造活动”的同义词。

如果谈欧亚世界观的哲学基础的话，那么协同理论首先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即亚洲文化传统缺乏这样一些形而上学体系，这些体系建立在形式同一性的思想以及以此为前提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平行论的思想基础上。东亚哲学思想并非产生于印欧语系的区域范围之内，与本体论退化原则不一样，出发点总是“存在”的多样性。相应地，协同指的也不是本质或者形式，而是某个空间的特定组织，或者确切地说是地点，更确切地说，是某个绝对的、原始的点，是母体，它使得万物同时存在成为可能。相应地，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们的审美氛围，是流逝中的跨存在性，就像幕间休息或者世界节奏中的间歇一样，是奇（读音为奇数的“奇”）点：这

个点既是充盈的，又是完全静止的。

从存在的协同性视角观察欧亚，就可以重新评价欧亚区域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它在西方坐标体系中会显得奇怪和令人费解。在西方文献中，特别是在带有政治性特点的刊物中，经常提及俄罗斯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孤独”和“孤立”。似乎这两个国家创建不了稳固的联盟和政治同盟。上文中提到，协同是欧亚地缘政治的主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欧亚大陆上两个大国的“孤独”不是别的，恰恰是协同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它用一种自发的、不确定的“相容性”、自我组织能力以及文化自由交流的“关系”，取代了形式上的协议，广义上讲，用旨在让各种力量和文化价值观相互适应的形式，取代规约。这种定位会使得具体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感受到彼此在道义上的责任。欧亚的文化标准显示了，政治和道德能以何种方式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直接对接。

因此，欧亚联合体无须超验主义或者形式上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原则。包括俄罗斯（因其遵守各种宗教仪式，包括东正教、伊斯兰教、喇嘛教甚至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仪式）在内的亚洲社会可以团结成一体，促成团结的不是思想，甚至也不是价值观，而是认知深层意识的经验，靠着这种经验，无须法律上的形式主义，人们就可以在礼仪交往中直接形成坚不可摧的众志成城。本质上讲，这是“实时”存在的经验，文化形式由此而来。

可以说，政治意义上欧亚空间的特点是根深蒂固的中立性。这个空间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政治体制，本质上具有元政治性。协同带领个性去寻找尚未清晰显现的认同，让个性自由发展，总而言之，使人成为人。

对欧亚世界统一体的认知会成为一个突破口，有助于找到面对全人类的、普遍的、与此同时还能保留人类生活形式多样性的真正人性的人类发展道路。西方孕育出一种能动的、为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消耗自然资源的管理方式。就其特性而言，这种方式不可能适合全世界，俄罗斯历次革命和俄罗斯现代化的经历大概最能说明问题。协同战略一方面能让万物自由地相处和相容，另一方面又能将所有参与生活创造和世界舞蹈的主体，提高到存在的永远充盈状态，亦即永生。行动确实有效的条件是，它是一种联合行动且始终遵循万物本源。这种遵循无须费力，也容不得恣意。这是一

种原始动作，它先于万物，或者更准确地说，超越万物，就像在相容的空间里，相似先于本质。它是存在的各个层级和各种力量的和谐及协同形式（试比较妙不可言的俄语词“品”：«чинопоследование»^①）。“世界统一体”或В·穆拉维约夫（Валериан Муравьев）所说的“超时间共同体”的自我见证——只有这样一种伟大行为才能成为全人类文明的基础。^②

若想认知欧亚世界的建构原则，就需要长期努力完善心智，需要方法论层面的精神完善，要有“开阔的”、容纳百川的、实事求是的意识。在欧亚世界里，人被重视不是因为他有某种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取决于他的心智成熟度，以及他在自己身上培养敏锐精神的能力。

欧亚空间有其独特的文明和地缘政治的深度。在它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平原和森林中，个人和民族都在自由迁徙和融合，彼此之间很容易从极端的仇恨转变成真诚的友谊，或者从友谊变为仇恨。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和中亚扩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这一特性，早就被乌赫托姆斯基（Эспер Ухтомский）指出过，正是这个特点，成就了伟大的俄罗斯和全球范围内的俄罗斯世界^③。但这里谈的也是欧亚协同的最低等级，其特点是，人的社会性的表达缺乏稳定的形式，人际交往缺乏一种清晰的固定形式，好客和敌意这种对立的两极同时存在。俄罗斯军官阿尔谢尼耶夫（Владимир Арсеньев）和“土著人”德尔西·吴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的交往，就是这类浑然天成的友谊的最好案例。欧亚世界的这种无形的整体性还有一个时间轴。在欧亚草原和沙漠的干燥空气中，保存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有时在一块石头上就有不同历史时代的印记。欧亚空间是时间的无底洞，其中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渊源。

欧亚的协同建构还有另一个更高等级，其特点是人际交往的精致性表达。与这一等级对应的是文字传统、国家建制和道德完善，该等级社会生活

① “чинопоследование”本身的含义，是根据官位划分的尊卑，官职低的尊重官职高的，如果按原意翻译的话，前后文会不通顺。咨询本文作者马良文老师，他建议翻成“品”字。译者也认为比较合适，三个口，以一定的秩序排列在一起，构成一种协同关系——译者注

② Муравьев В.Н. Овладение временем.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ПЭН), 1998. С.38.

③ Эспер Ухтомский. К событиям в Китае.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Запада и России к Востоку. Рубеж XIX-XX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Либроком, 2012. С.80.

的真正基础是礼仪。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和东亚的“中央帝国”（中国的自称）是欧亚世界在该等级的两大代表。两个帝国的国家建制都具有超民族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文化中心性。

显而易见，社会形式双层结构的较低等级，对应的是欧亚空间的边缘，较高等级对应的是中心。也不难发现，两个等级有其共同的基础，即人心的相遇和沟通。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人的社会本性的表达程度上和解释的精致性上。难怪人们以为，“失礼求诸野”是中国第一位智者孔子所言。

礼仪把参与者联合在一起的同时，又让他们拉开距离，使之感受到人际交往的界限。礼仪要求洞察“整个世界”，但这种整体性本身又并非肉眼可见。这种对万物的洞察，从协同学原则来看，正好符合道家鼻祖老子的这样一个训诫，当代一些中国学者把老子的这一观点视为中国的世界理念之根基：^①“以天下观天下”。另一位中国古代道家代表庄子的观点与老子琴瑟相合，他完全正确地指出，“藏天下于天下”的能力是心灵宁静的前提条件。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令人疑惑，甚至有些荒唐：怎么能藏世间于世间？或者如何把事物从它自己身上剥离开来去观察它呢？很显然，这里讲的是观察不在场的事物，讲的是摆在眼前但谁也看不到的世界。这里有其深刻的含义，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既不可能是外在的也不可能是内在的事物。它要想成为它自己，就需要“发生变化”，放弃或超越自己，按照中国的说法叫“自虚”。世界的出场要求精神变化，使精神能够超越现状。

越来越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某些远东国家里，圈子文化被赋予重要的意义。在东方，圈子的生活正是不断地努力自我塑性，努力使自己获得圈子所具有的超个性品质。这是头等大事，并且可能是东方世界使人成为人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协同的实现与其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不如说是对欧亚空间现实状况的确认。彼此千差万别的民族和社会群体在这里自由相遇和融合。欧亚的典型特征经常被调侃成可“随意变更的关系”。这里指的不是用法律或者习俗来调节的关系，而是用最朴素的道德情感：好客和亲热，或者相反，怀疑和敌视。二者之间很容易发生转变。当然，好客和亲热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中

^①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国（乃至整个欧亚）的礼仪不过是这类关系的升华。

在协同的世界图景中，我们本质上是在寻找能让世界与其自身相符的方法，让不同的力量得以和谐相处的措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愿意（抑或没能力）确定欧亚世界新秩序的形式和原则，它本能地非但不去引导，而且还被某种来自上方的力量所指引，这种力量最终会成为导致生活发生创造性改变的能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本质上是现实主义者，是他们所说的这样一种“综合国力”的现实主义者，这种综合国力不一定要用全民总动员方式，恰恰相反，是通过“自我放空”获得的，让一切成为自己，自由发展。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而言，合作以及由此带来的益处，比形式上的目的和意识形态公设更重要，这就如同在协同视域中，学习的过程比抽象的知识更重要一样（远东的文化传统证实了这一点）。的确，只有行动才能获得一切，目的本身一文不值。中国的智者与其说已经获得知识，不如说正在学习，并在此过程中体会着自己的存在。中国追求的“韬光养晦”（中国古代战略遗训，为邓小平所用）在中国商业文化的诸多特点中表现出来，从喜欢伪造和仿造国外品牌，或者满足于为西方产品提供零件的角色，到现在的一种趋势：创建五花八门的生产、金融和商业企业网络，个体公司及个体本身都消弭在其中。中国的商业活动与其说是个体现象，不如说是集体现象，它的生长环境是准家族性质的，强调的是礼节交往。

全球维度的中国文明

尽管中国世界有内在的整体性和连续性，但其成员在思维和行动上并非千篇一律。恰恰相反，中国文明的各个地区之间都存在差别，有时还极大，不仅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地理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内陆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就存在巨大的差异，“特区经济”及众多外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香港和澳门是“特别行政区”，台湾也属于大中国的范围。东南亚为数众多的具有经济影响力的中国协会，构成了中国世界的外部区域。最后，还有遍布世界的中国散民，他们与自己的历史祖国有紧密联系。

在这个庄子所言的“藏世间于世间”的多层结构中，有其自己的组织原

则，它使得中国的天下具有离散性结构，这种结构同时也是双层或者两极建构。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两极，一级是“天”，代表着超民族的、准帝国的国家性，另一极是“地”，属于日常生活的范围。中国世界的这两个源头彼此之间是不透明的，因此也无法彼此对立。根据中国的观念，现实是不在场的，这就会赋予现实以一种战略属性，因为战略行动是隐蔽的，不自我显现的。两极建构使得中国在其所有全球目标上都表现出独特性，方便维护国家主权，而主权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建构为中国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缓慢扩张拓展着空间。与“天下”理念相符，中国跻身世界并以特殊的方式实现着全球化：它藏身于自己的“天下”之中。

我们在中国进行全球化的这样一种方式中看到了协同原则的作用，这就是在全世界拓展中国社区或者中国城（又译唐人街）。中国城是生产和消费中国的世界形象的地方，但在社会层面上，它又是“世界中的世界”，对于外部环境而言是不在场的，或者说藏在阴影之中。本质上就是一座中国仿制品-模拟物的工厂，而且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它并非某个孤立的宾馆等地域空间，而是无孔不入的、被彻底地美化和修饰的日常生活，在毫不掩饰的假定形式下，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的确，无论身处何地，中国人都感觉自己像在家里一样，他们有意摆脱自己的原型，目的是为自己释放出可以与他者交往的空间，塑造自己的新形象，把周围的环境变成内心世界“反光和暗影”的环舞。但是，由于中国城主要是为游客而设的，所以它实际上只是这样一个网状结构的冰山之一角，中国社会亘古以来就建立在这个网状建构之中，其基础是社会的一种自发组织形式：亲朋、同乡、圈子关系，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掩盖下的私人关系。

只有在中国之外，网状建构才会浮现出来，而且成为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失去了诸多官方色彩和泛中国的形象。侨居国外的中国人首先代表自己的家乡，其次才是中国人。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发现，中国散民的政治和文化作用并不是单一的。有一种观点很有市场，认为中国散民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是中国政治的宣传者。在俄罗斯，这种观点久盛不衰。早在 20 世纪初，在远东地区对中国社团进行社会调查的阿尔谢尼耶夫以及其他作者就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应

该承认的是，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因为中国政府总想把国外散民当成发挥国家影响的支柱。但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群体，它消融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很难捕捉到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子，这个社会群体是自我组织和自给自足的，在很大意义上是“不在场”的。中国人不是讲“山不是山”吗？这张社会之网很容易嵌入到当地的各种社会结构中，从商业领域到宗教界再到黑帮社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混合样式，比如从美食到工业品牌。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城是人际关系的延伸，中国社会就建立在关系网上，因此可以假设，中国城也是世界范围内多种文明协同共建的一个台阶。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让中国散民以它现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单位，参与到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生活中来？消除或者压制网状的中国社会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将其纳入俄罗斯社会。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提供一定的自由，不限制中国社区与俄罗斯人的日常接触，创建双方友好和互助的氛围，同时保持对移民的涌入及其流动的严格行政控制。移民的数量、地点和他们的职业活动应该符合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网状社会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本身具有很强的民主性，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垂直权力”。由于权力嵌入其中，所以加强了社会的等级性。在研究身处欧亚区域的国家之间的当代合作方案时，应该考虑到地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双层建构，寻找适合每个层级的最佳合作形式。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就会很容易发现，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开展行动的。

中国人眼中的生活空间

在制定针对中国和中国散民的政策时，还需要考虑到中国日常文化的基本原则。

中国世界观的核心范畴不是个人，而是具有等级性的特定社会群体。其中，个体的“我”服从某个最高的集体统一体，同时也被后者所确证。正因

为如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道德完善的努力等同于生命本身。由此产生了中国日常文化的几个普通准则：

第一，中国人被教导不要把“我”放在首位，不公开宣称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愿望。中国文化的第一个公理是：在出现个体的“我”及其反思之前，人们先进入纯粹的交际关系。人的自我肯定是在与他人的共处中完成的。就像中国的古代园林，在修建时就考虑到旁观时的样子，中国的山水画兼容多点透视，中国人做事总是考虑在场的其他人的立场或者观点。

第二，中国人赋予交际的象征形式以重要的甚至绝对的意义：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礼貌公式、标准手势等等；同样具有绝对意义的还有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表达方式，它们强调言语过程中沉默的意义。

第三，中国人擅长在构成现实的复杂多样性统一体中理解现实，或者确切地说，理解时间和空间。例如，在中国古代绘画或戏剧舞台上，都能看到时空相隔甚远的几个事件同时在场。中国人可能很容易理解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话：生活就是一堆细节。中国人远比欧洲人发达的敏感性就由此而来。

第四，中国人把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成个人命运的一部分，而且几乎个人命运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个人优缺点的最公平的评判者。与别人交往时表现出来的个人的诚信和公正，也被中国人理解成实用层面的事物，是个人的社会资本。

中国伦理的主要概念是“面子”，即社会认可的、个人的社会要求的总和。面子可大可小，取决于社会地位。面子可能会丢失，且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只要周围的人不再给面子，他的面子就丢掉了。单凭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回面子的。

此外，还有两个尽人皆知的社会生活原则，一是关系，二是人情。所谓关系，是等级框架下个体之间特别信任、同时又非常形式主义的一种联系；人情并非同情或普通的热情，而是在既有的“关系”基础之上的对伙伴的义务，冷静地寄希望于彼此之间都能给对方带来好处。

无论如何，中国人固有的行为模式本身就形成反差：对“自己人”特别礼貌和周到，对“陌生人”则很冷淡，往往还公开表现出不友善的态度。相应地，在中国文化中，“真诚”和“信任”并非指个人情感和思想的真诚表

达，而是指个人情感和思想非常应景。这种能力本质上需要道德和职业方面的专门培训。在中国，即便是友谊，也与互给面子相关。

很显然，包括商业领域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与俄罗斯人的社会心理和民族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俄罗斯文化的特点是，努力触探人类经验中事物的边界。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差异，恰恰是妨碍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有效合作的最大障碍。这种差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目前，迫切需要系统地研究和解释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商业文化的差别，制定一套中俄企业家和实业家有效合作的方案。这应该是两国国家层面的合作项目。实业界各个环节都应加入其中，特别是中小企业，也包括金融贷款组织，因为未来发展的潜力正是商业活动的这些领域。不仅如此，商业低端链条的合作，才能为俄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俄中实业界的具体合作可以涵盖以下内容：

一是在企业文化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和社会调查，目的是为俄中企业界提供建议，找到更有前景的经济合作方向。

二是把专业咨询公司现有的实践经验系统化和理论化，旨在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研究经济合作的大型项目创造条件。

三是为俄中双方的集团和中小企业代表开设进修班和培训班，目的是搞清楚并实际掌握两国企业文化的基本概念和价值观。

四是举办多功能研修班和相关会议，交流两国创新发展的已有经验。

五是创建全国网站，交流商业信息和咨询服务经验，把地方的商业合作也纳入其中。

俄中对话的人文空间

与经济和政治合作相比，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乍看起来是次要的，实际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当国家和人民就他们的世界地位和相互关系达成共识以后，彼此的合作才能成功。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俄中文明系统地相互认知问题至今还没有提上日程。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发现，研究俄中的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相互影响和对合作形式的认知，不仅能丰富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使得人文领域的这些知识发生根本性变革。俄中文明都如此独特，两国积累的历史经验如此丰富而又多样，乃至比较研究能够促进为上述学科制定新的理论基础。上文中提到的中国社会的协同和网状特性，及其相应的欧亚文明（确切地说是元文明）的双层结构，以及欧亚政治的两极建构，这些内容对改变世界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旅游业对欧亚两个大国之间的“协同互动”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业的使命是与科学研究、教育和媒体一起，共同促进欧亚人民历史命运的共同感，形成欧亚地区特有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新形式。旅游业的发展会成为基建和物流领域合作项目的自然结果，而基建和物流是中国最感兴趣的事情。在欧亚修建横跨大陆的交通动脉，是形成作为全球特殊共性的欧亚世界的主要条件。众所周知，旅游是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行业，但旅游中的文化因素对于促进俄中在这方面的合作也非常重要。中国传统所宣告的“以世界观世界”，实际上指的是走遍世界的天涯海角，这句话能使我们认知世界的内部尺度，认知在什么条件下世界整体与其各部分之间具有相对性。沿着横跨欧亚大陆交通线设计的旅游线路，可以用来创建尚未显现的欧亚世界的未来模样，揭示欧亚世界的离散性和网状性特性。然后从这里找出各种特殊需求，以便对新道路的设计方案提出工程、建筑以及生态方面的各种原则。由这些道路所创造的世界，应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创造瞬间，它连接的是不可知的未来和远古的过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后考古历史学的世界：是一个在里面重新创建历史的未来世界。这个在想象中呈现出来的链接历史和未来的永恒世界，应该成为全球旅游业的空间。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阿斯塔纳的面貌为完成这项任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它在离散的空间内将远古的过去和未来联结在一起。丝绸之路东西向的主干线，是未来欧亚地区旅游业最发达的路线。当然，南北走向的丝绸之路也很重要，它连接的是中国西部地区 and 阿尔泰以及南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只有成功创建统一的欧亚经济及政治空间（涵盖中亚、蒙古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才能是稳固的和有

效的。这会是一种新的元文明共同体，其基础、潜力和目标都代表着全球力量。它可以成为与西方欧美体系迥然不同的欧亚全球体系。

可以将协同理论视为这种世界体系的基本理论，它能够保障其成员根据自己的历史特性自由发展。这种理论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意义还有待思考，各种专业背景的学者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为实现欧亚一体化规划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一点，欧美世界体系和欧亚世界体系并不一定彼此不断冲突，因为欧亚共同体是建立在“自我放弃”和“自我区别”的基础之上的。它注定是“藏天下于天下”，是多样性的世界，不让任何事物与自己对立，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在这种意义上，它会获得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的类似特点，但又不被形式上的认同所制约。这种世界的特点是面向未来，追求创新和实验，探寻尚未显现出来的现实。可以设想，上述两种世界体系能够同时并存。全球世界既不会是单极世界，也不会是两极或者彼此敌对的多极世界，而是彼此之间能够互补的、多种地缘体系共存的世界。

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或者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人的生命潜力的彻底释放。俄中在协同理论基础上的合作，会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

（翻译 郭小丽，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Abstract】 In the future, the Eurasian continent may become a consortium beyond civilizations based on Russia and China. This will be of both regional and world significanc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 of Western geopolitical self-identificati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system is principles of self-discrimination and synergy, which incorporates the category of “relationshi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oncepts such as “xuantong” and “mixed”. The synergy an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two-layer structure of the corresponding Eurasian civilizations have great implications for changes in the world order. In additio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world system and the Eurasian world system do not necessarily

conflict against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ynergy, the two systems could coexist, forming a world in which each other can complement and multiple geopolitical systems could coexis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both Russia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in-depth and all-round cooperation in many fields such as humanities.

【Key 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Eurasian Complex beyond Civilizations, Eurasian Continent, Sino-Russian Humanities Dialogue

【Аннотация】 Будущи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может стать новой мета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общностью,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ей глобальную по своим основаниям, потенциалу и целям силу, обладающую не только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но и мировым значением. Вопреки принципу запад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ой данной системы являются принципы само-оставления и синергии, включающие категорию «связей» в так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ции, как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и «целостность». Си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сете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двухуровне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меют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изменения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Кроме того, ев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и евро-азиатская миросистемы не обречены на конфликт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Согласно принципу синергии, обе системы могут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формируя мир, в котором нескольк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стем сосуществуют и дополня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данной цели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должны укрепить и расширить всесторонне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о многих областях, включая 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ета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общность,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диалог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转型 ——基于普京时代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解析

林莹*

【内容提要】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中产阶级与威权体制转型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威权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既得利益者，是社会稳定器，将阻碍转型的发生。就俄罗斯而言，一方面，俄罗斯中产阶级内部异质化，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严重依赖威权体制，是阻碍转型的力量；另一方面，俄罗斯私人部门的中产阶级不满现有的经济政治地位，是转型的推动力量。两者的分裂导致俄罗斯中产阶级无法以独立、整体的身份发出政治诉求。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如何处理与中产阶级的关系，特别是私人部门的中产阶级，平息由其充当主力的抗议活动，将成为俄罗斯政府的一大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中产阶级 俄罗斯社会 俄罗斯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5-0043
(34)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话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至今，关于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转型的研究热度有增无减。一些

* 林莹，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民主化后，并没有发展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反而停留在威权体制，并有民主倒退的趋势。这不仅违背了转型理论的一般性原则，也让民主化在何种状态下能够巩固成了值得商榷的问题。转型理论认为，威权主义的起点是极权主义，终点是民主政治，威权体制只是一个过渡的不稳定的状态。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与完美理论不匹配的变数，就是威权主义实现的多样性。就此，有必要在威权主义和民主之前加上相应限定词，包括竞争性威权主义、选举式威权主义、委任式民主、未完成民主和低度民主等等。实际上，给予这样的限定词，一定程度上已经承认了威权主义不是必然要向民主过渡的，无论是竞争性威权还是后全能主义，都存在这样的默认。伴随着普京“主权民主”和“可控民主”的出台，俄罗斯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又拉开了帷幕。

然而，发起于 2011 年 12 月的反杜马选举舞弊，历经 2012 年 2 月、高潮于 2017 年 3 月的反腐大游行，似乎让失落的西方学者看到了希望——俄罗斯存在自下而上的革新力量，威权转型存在可能性。按以往的经验，转型的发生或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或靠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由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蔓延至地方乡镇的游行，无论从范围还是影响力看，均为普京当政以来所罕见。与此同时，根据列瓦达民调中心、全俄舆论中心和公众舆论基金会公布的游行数据，中产阶级是游行的主力军，有超过一半的游行者是工作稳定、生活宽裕、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因此，部分研究者认为，中产阶级作为新兴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寻求国家的变革，有望成为普京体制的颠覆者。这符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期——中产阶级是反对威权政府的先锋力量，中产阶级的壮大能够推动民主转型。可是按照这一逻辑，又如何解释 2013 年 6 月之后陡然下降的游行数量、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的亲普京大游行，以及 2018 年 3 月普京的高票当选？普京的声望居高不下，游行者的诉求不是改弦更张去推翻现有政府，而是寻求公平、清廉并获得更多福利保障和政治权利。这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诉求，于当权者而言，改变现有政权模式的诉求难以满足，但给予民众更多的利益保障是可以实现的，这一过程还能够收买民意。鉴于此，中产阶级是否充当民主转型的推动力？较之其他阶级，中产阶级是否更支持民主道路？其内部是否牢固、

团结、同质并具有凝聚力？本文拟从价值观念、政治诉求、内部结构和社会抗争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求重新评估中产阶级对于民主转型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中产阶级是民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中产阶级的壮大能够带来民主改革，这一著名论断来自转型政治的三条逻辑。

首先是现代化理论逻辑，其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化”。美国政治学家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第一个系统性论述这一观点的人。他于1959年发表的论文“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提出了经济繁荣与民主化呈现正相关。文中指出，一个国家越富有，越能够带来阶级结构的改变，为民主化创造机会，也越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①随后，拉里·戴蒙德、亚当·普沃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和罗伯特·巴罗等沿着这一逻辑，用大量的案例实证了这一观点：转型国家之所以成功民主化，是因为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必然发生在中等经济水平及以上的国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大批中产阶级，就成了民主的主要推手。

第二条逻辑是，“资产阶级是驱动民主转型的阶级力量”。美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其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里，运用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法，得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②他认为，工业革命进程中存在农民、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唯有以商品经济和自由市场为后盾的资产阶级，才能够完成推翻土地贵族和封建王权的革命。因此，只有资产阶级壮大了，国家才能实现民主。值得注意的是，摩尔提到的资产阶级应等同于现今中产人群中的企业主和个体商户，他们不依附于政府，能够适应市场的规则并要求降低政府干预。因此，有人也把摩尔的这句话翻译成“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 Vol.53, No.1, pp.69-105.

^②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45-350页。

第三条逻辑是，“中产阶级力量壮大后，能成为威权体制的掘墓人，实现民主转型”。这一论述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他认为中产是介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稳定而可靠的群体，珍视并维护现有地位，“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建立最好的政体”。^①到了近代，中产阶级似乎天然地和民主联系在一起，为了保护个人财产，要求限制政府并分化权力，特别是那些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断言，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性运动都由中产阶级这一群体领导，他们的领导才是革命成功的关键。^②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总结了27个可能导致转型成功的变量，中产阶级的壮大是最为重要的变量之一。他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商人、教师、公务员、管理者和专家的职业分布，可以保证这一群体成为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城市中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要么民主化失败，要么民主政治动荡不安。”^③从价值观来看，卡梅隆·罗斯（Cameron Ross）等人认为，中产阶级的成员，特别是那些成长于后苏联时期的年轻成员，比普通大众更能表达对民主价值观的支持。^④皮尤全球调查中心的报告也论述了中产阶级比其他群体更重视民主制度的维护，对于涉及公平选举、公正司法、公开演讲和自由媒体等方面拥有更深层次的诉求。^⑤在社会抗争方面，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从过程论角度分析，得出了中产阶级联合其他群体发起的社会运动成为威权政体垮台的导火线这一结论。^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中产阶级一直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最近抗议活动的引擎”，年轻一代的中产对政府抱有更高的期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10-220页。

②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9.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④ Evgeny Gontmakher and Cameron Ros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tisation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15, Vol.67, No.2, pp.269-284.

⑤ 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Views on Democracy, Religion, Valu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merging Nations”, 2012, <http://www.pewglobal.org>

⑥ Doug McAdam et al.,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许，敢于反抗腐败无能的政府。^①中产阶级促使威权政府倒台的案例并不少，韩国全斗焕政府、菲律宾马科斯政府是典型案例。

大量的研究结论都指向了中产阶级对民主转型的决定性作用，它可以是催化剂、主要推动力量，乃至关键的变革力量。然而也有对上述三条逻辑进行抨击的学者。他们的观点是：“现代化不一定导致民主化”、“资产阶级对民主也有负面作用”，以及“中产阶级不是威权政府的反对者，而是其支持者”等。主要案例是 1974 年后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后苏东国家。

表 1 中产阶级是威权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吗？

	赞成派	否定派
经济诉求	中产阶级的壮大要求自由市场，保护个人财产	中产阶级成长于政治与经济权力未分离的环境，依附于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
政治诉求	要求有限政府，更广泛的政治权利和开放的阶层流通渠道	安于现状，社会的稳定器，排斥政治变革
价值观	倾向于民主价值观，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	倾向于保守主义和强人统治
联盟诉求	能够形成阶级联盟，目标和利益趋同	内部异质，无法形成阶级联盟
结论	主导社会运动，颠覆威权政体	延续威权统治，继续“自由换香肠”的社会契约

注：表格由作者自制

首先，亨廷顿自我反思，在政治架构不稳定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动乱。随后，奥唐纳根据南美国家的转型实践，得出了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比程度低的国家，更容易成为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的观点。林茨（Juan José Linz）、斯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等认为，民主的成功不在于经济发展，而取决于政治精英的考量，他们与反对派和利益集团的博弈能够决定民主能否持续下去。上述学者反驳了现代化理论，否定了经济发展与转型之间的正相关性。为此，普沃斯基只从民主巩固的角度来分析：“富裕国

^①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6.

家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民主在富有的社会中更有可能存活下去”^①，表明尽管经济发展不是触动转型的因素，但却是巩固民主的因素。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亨廷顿给予更多的条件限定，认为民主在穷国无法持续，应该存在于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过渡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民主转型。^②

对第二条逻辑的反驳集中在资产阶级的虚伪论上。资产阶级首要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财产，扩大市场，因此要限制国家的恶，但对民主没有特殊偏好。例如，资产阶级不希望给予工人农民等其他群体政治权利，大众民主对其可能是一场灾难。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就认为，当资产阶级利益受制于工人并被群众运动所威胁时，他会选择威权主义。^③费尔南德斯（Leela Fernandes）则说，在经济转型之中，当意识到其利益无法兑现之时，许多中产阶级背弃了现行的民主体制而支持独裁者。^④因此，只能说资产阶级的某些诉求与民主体制相契合，但不代表他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墙头草”的特性在法国大革命和当代转型国家中都有体现。

对于第三条逻辑，最有力的反驳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从拉美国家的转型实践可知，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安于现状并维护现状，恐惧于动乱和变革，在价值观上更偏向于保守主义。因此中产的规模越大社会越稳定。尤其在后苏联国家，中产阶级成长于威权体制中，与后者有天然的契合度，其财富、社会福利和前景都与此相关，中产阶级就成了维护威权体制的主要力量。鉴于此，学者陈杰（Jie Chen）建议，将中产阶级的壮大与威权转型分为两条路径，前者的实现并不能推论后者也能够成功，两者不是单线的因果机制，而是动态的相互关系。^⑤鸟井（Takashi Torii）认为，

① Adam Przeworski et a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 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35-139.

② [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著，刘惠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9页；[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6-57页。

③ Evelyne Huber and John Stephens, “The Bourgeoisie and Democracy: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Social Research*, 1999, Vol.66, No.3, pp.760-775.

④ Leela Fernandes, *India's New Middle Class: Democratic Politics in an Era of Economic R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pp.187-188.

⑤ Jie Chen, *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5.

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尚未分离之下，中产阶级成长于垄断资本主义当中，因此依赖于威权体制。^①此外，还有一系列学者强调中产阶级内部难以发出一种声音，也难以团结其他群体来达到改弦更张的目的，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国家。

那么，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实践支持了上述哪一派的观点？西方学者多为赞成派，认为中产阶级拥有充当转型推手的潜力，但其内部异质化严重、力量弱小，目前来看不足以完成这一使命。托马斯·雷明顿（Thomas Reminton）根据俄罗斯官方的人口和经济数据，重点分析了中产阶级的异质化。^②他计算了2000年到2010年俄罗斯人均收入的中位数，得出了与其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不相符的结论。他认为10年间俄罗斯人均收入有了显著的增长，但从中位数来看，人均收入呈现不够聚集而分层明显，贫富差距拉大，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人群。这一效应映射到中产阶级身上，就是中产的最高端人群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中低端中产阶级，呈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化趋势。年收入在1.6万美元到2.5万美元（月收入为4万到6.2万卢布）的中产人群增长规模落后于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群。他的结论是，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两极分化严重，中下层中产阶级成为不平等和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显然不会与上层中产群体享有同样的利益观和行为准则。

2015年，邓迪大学的卡梅隆·罗斯（Cameron Ross）、肯特大学的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印第安纳大学的雷吉纳·史密斯（Regina Smyth）、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托米拉·兰基娜（Tomila Lankina）和马里兰大学的萨拉·奥特斯（Sarah Oates）等西方学者，联合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Mikhail Dmitriev）、叶莲娜·切班科娃（Elena Chebankova）、米哈伊尔·菲利波夫（Mikhail Filippov）、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的叶甫盖尼·贡特马赫尔（Evgeny Gontmakher）、伊丽娜·谢梅年科（Irina Semenenko）和圣彼得堡欧洲大学的弗拉基米尔·格尔曼

① Takashi Torii, "The Mechanism for State-Led Creation of Malaysia's Middle Class", *Developing Economics*, 2003, Vol.41, Issue.2, pp.230-232.

② Thomas Reminton, "The Russian middle class as policy objective", *Post-soviet affairs*, 2011, Vol.27, No.2, pp.97-120.

(Vladimir Gel'man) 等长期研究俄罗斯转型的著名学者，在 2015 年第 2 期的《欧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 10 篇文章。这些学者以 2011-2013 年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为切入点，围绕公民社会、政治反对派、政治改革、意识形态、大众媒体和民族主义等，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普京执政 13 年间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在这些研究中，中产阶级是其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任何涉及改革的议题都绕不开中产阶级。

从中产阶级内部构成来看，罗斯和贡特马赫尔认为，俄罗斯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多个层级的混合体，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对普京政府有强烈依赖。从抗议游行参与者的角度看，格尔曼认为 2011 年末的大游行表明，成长于后苏联时期的年轻一代更加激进，容易被反对派所鼓动而成为反普京的一支力量，政府不应当忽视这样的代际变化，对于青年中产所期望的政治空间、阶层流动要给予回应。从抗议诉求来看，德米特里耶夫则认为，2011 年以来的游行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游行有本质区别，后者是物质诉求的、排外的，并带有意识形态之争，前者则是反腐、法治和人权，这一变化预示着参与游行者诉求的根本性变化，政府不可能只以经济好处去平息中产阶级的怒火。从抗风险能力看，菲利波夫认为，政府宣扬的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让普通大众对改革失去兴趣，因为改革导致了不稳定，而不稳定带来了经济下滑，只有中产阶级的富裕群体才能够承受政治改革的代价和风险。此外，奥特斯分析了大众媒体对中产阶级的影响，那些年轻一代偏向于从互联网等新媒体上获得讯息，而从传统媒体获得讯息的人确实更支持普京，从新媒体获得讯息的人更反普京。^①总结上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就是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具备与威权政府抗争的勇气，但其内部复杂的构成使其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诉求，并呈现越来越异质化的趋势。在处理与政府的

① 上述学者的文章及观点参见 *Europe-Asia Studies*, 2015, Vol.67, No.2: Vladimir Gel'man,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Russia: A Troubled Transformation", pp.177-191; Richard Sakwa, "Questioning Control and Contestation in Late Putinite Russia", pp.192-208; Irina Busygina and Mikhail Filippov, "the Calculus of Non-Protest in Russia: Redistributive Expectations from Political Reforms", pp.209-223; Mikhail Dmitriev, "Lost in Transition? The Geography of Protests and Attitude Change in Russia", pp.224-240; Evgeny Gontmakher and Cameron Ros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tisation in Russia", pp.269-282; Regina Smyth and Sarah Oates, "Mind the Gaps: Media Use and Mass Action in Russia", pp.285-305; Tomila Lankina and Alisa Voznaya, "New Data on Protest Trends in Russia's Regions", pp.327-342.

关系上只有“较低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中产这一群体对于改革有心无力，并充满矛盾心理——虽然厌倦了普京，但没有比他更能托付信任的领导者；虽期待开放的政治环境，但不愿放弃现有的好处并期待更多的好处。但这些学者认为，按照历史的进程，以经济成果换政治屈服，短期内可以获得民意，长远看反而加速自由化进程，中产阶级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颠覆政权的力量，这是普京的“政绩困局”。

俄罗斯学者对这一观点有争议。首先，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为代表的官方研究机构，支持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观点，并通过2008年40周年所庆之际发布的《当代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和2014年的《中产阶级十年（2003-2014）》两份研究报告来阐述这一观点。^①这两份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权威的中产阶级报告都强调了一个主题，就是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发展水平与20世纪60-80年代的欧洲国家类似。因此，中产阶级面临的种种问题是发展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日趋完善，会陆续得到解决。目前，中产阶级与政府处于较为和谐的状态——中产阶级始终是普京的忠诚支持者、统一俄罗斯党的大票仓。中产阶级主张俄罗斯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价值观偏向政治保守主义，对西方民主道路认可度低。因此报告认为，中产阶级仍然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政府将努力扶持其成长。

统俄党和政府官员们也多次声明中产阶级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要扩大这一群体的规模。时任统俄党主席鲍里斯·格雷兹洛夫（Б.В. Грызлов）宣称，统俄党更倾向于社会保守主义，依靠中产阶级，捍卫这些不需要革命的人的利益。^②杜马议员安德烈·马卡洛夫（А.М. Макаров）称，经济危机中要保护中产，他们是最先的一批受害者，但他们是未来俄罗斯作为一个正常欧洲国家的基石。^③苏尔科夫（В.Ю. Сурков）也说，中产阶级是“国家沉默的英雄”，“他们存了几千卢布买了一个新的冰箱，现在正在失去一切。国

① Горшков М.К, Тихонова Н.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08; Горшков М.К, Тихонова Н.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0 лет спуст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2014.

② Борис Грызлов. У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крыльев не будет. 23.04.2005. <https://rusk.ru/st.php?idar=150593>

③ Андрей Левкин. День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26.11.2008. <http://www.polit.ru/author/2008/11/26/makarovsred.html>

家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衰退期间保护他们”。^①俄罗斯政府于 2008 年出台的《2020 年前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纲要》，宣称到 2020 年将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到总人口的 60%-70%。然而，俄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戈尔什科夫（М.К. Горшков）对此并不看好，他认为从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即便收入差距有所改观、福利条件有所提升、二次分配得到重视，中产阶级的规模最多只能扩大 8%-10%左右，不会超过总人口的一半。换言之，中产阶级的发展势头受阻，其增长能量已经耗尽了。^②他的建议是改变经济结构，壮大知识经济，发展创新型工业，为中产阶级的发展注入新活力。高等经济学院的奥夫恰罗娃（Л.Н. Овчарова）认同这一观点，她对贫困率进行了测算，认为只有发展第四产业，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才能壮大私人部门的中产规模，刺激经济增长而减少贫困率。^③此外，社会学所在编撰《中产阶级十年（2003-2014）》报告前后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包含不少具有启发性的结论，^④如季霍诺娃（Н.Е. Тихонова）与玛列娃（Т.М. Малева）提出的中产阶级划分的四大标准等，本文在之后的论述中也会有所涉及。其次，以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为代表的自由派，介于赞成与反对之间，他们强调的是中产阶级政治立场的可变性和依附性。中产的实用主义倾向导致其可同时出现在反普京和亲普京阵营当中，目前来看不是转型持续、可靠的推动力。格里高利耶夫（Л.М. Григорьев）和萨尔米娜（А.А. Салмина）认为中产阶级表现出对民主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需要一条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

① Мария Цветкова, Наталья Костенко. Сурков жалеет середняков. 01.12.2008. <https://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s/2008/12/01/surkov-zhaleet-serednyakov>

② М. Gorshkov, “The Middle Class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Model of Russia’s Development Today”,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54, No.5, 2015, pp.367-383.

③ Овчарова Л.Н.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Центр анализа доходов и уровня жизни НИУ ВШЭ, 2013.

④ Горшков М.К. Городско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2006. С.23; М.К. Gorshkov, “The Middle Class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Model of Russia’s Development Today”,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15, Vol.54, No.5, pp.367-383; Тихонова Н.Е. Влияние кризиса на жизн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6. No.4. С.52; Nataliya Tikhonova, “Middle Clas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2015, pp.123-134; Малева Т.М., Авраамова Е.М., Гурвич Е.Т., Зубаревич Н.В., Полякова А.Г. Долгосрочная концеп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50. Moscow: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 С.43.

二是能包容多元价值观，避免社会动荡和独裁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戕害。萨米娜认为，中产阶级对政府有清晰的认识：政府能够在维持稳定和秩序、解决社会冲突中有所作为，但对政府在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建立民主制度方面能做什么不抱希望。她还谈到了政治冷漠和投票率低的问题，当人们意识到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时，投票热情就会下降。多数人去投票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有政治偏好。^①西蒙·科尔顿斯基（Симон Кордонский）赞同这一观点，他还认为在以能源经济为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过于狭窄。大型国有企业攫取大部分利益，中小企业只有残羹冷炙。那些在中小企业就职的中产群体力量薄弱，以政策为导向，他们并不关注实行哪种体制，而关注给予多少政策扶持，因此实用主义倾向明显。^②此外，列瓦达民调中心、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和欧洲晴雨表民调机构也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产阶级的报告，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普京支持率、选举投票率和反腐游行等话题，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并不固定，往往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总结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就是中产阶级是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混合体，尽管出现了以其为中坚力量的反政府游行，但大部分人支持普京，不希望重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极端方案。因此，中产阶级仍然是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诚如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问题研究所给出的定义：中产阶级处在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中间地位，履行着一系列社会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社会稳定器和熟练劳动力再生产源泉的功能。这一现象在俄罗斯 2018 年总统大选中得到了印证，普京高票当选为总统，中产阶级仍然选择普京。俄罗斯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在现有政权体制下，给予中产阶级一定的政治空间、鼓励其多投票的问题。

中国学者对此持较为客观的看法。一方面学者们对“中产阶级”的概念进行了讨论，比如，是应该称为中产阶级还是中间阶层，另一方面也从成长条件来加以研究。学者们认为，中产阶级普遍存在先天不足、抗压能力弱、政治淡漠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利于其承担起社会结构主体和转型主要力量的

① Григорьев Л.М., Макаренко Б.И., Салмина А.А.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после кризиса: экспресс-анализ взглядов на политику и экономику. Е.М. Бугачева, 2010.

② Симон Кордонский, Сослов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Институт Фонд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08, С.28-35.

角色。山东大学王广振认为，中产阶级普遍具有政治惰性，缺乏变革的激情。同时，这一阶级也缺乏奉公守法的法制观念，一方面希望得到国家保护、惩治不劳而获，另一方面又企图钻法律的空子获取利益。他认为，把俄罗斯中产阶级看成是追求民主人权的主力军并不合适，因为这些意识在中产阶级身上未体现出来。他和孙嵩霞在 2014 年发表的综述性文章，就提到了中产阶级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社会政治功能非常不完备，远远不能起到社会政治关系调节器的作用。^①显然，没有行动纲领、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独立意识，就不具备创造历史的能力。中国社科院张树华研究员认为，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反映了转型期间的社会特点，不能叫“阶级”，只是个还在艰难形成的“中产阶层”。中央编译局的徐向梅研究员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汪宁教授皆持类似的想法。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关雪凌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董晓阳研究员等对俄中产阶级的发展较为乐观，认为其殷实自信、勤奋上进、能勤劳苦干、忍耐力强，憧憬依靠个人能力提升社会地位，只是无法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上海大学沈瑞英教授则认为，中产阶级只是转型的一个要素，并非有了中产阶级随之就会有公民社会，“社会秩序稳定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系统工程”，社会转型需要社会各阶层和国家的良性互动。^②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庞大鹏研究员主编的《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2011-2015）：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一书，详细介绍了普京时代的中产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书中论文作者之一的张圆圆认为，俄罗斯中产阶级对经济垄断和一党独大深为不满，但因为发展不成熟以及两难政治定位，将继续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政治冷漠，因此并不能形成对现政权的改变力量。^③辽宁大学曲文轶教

① 王广振、孙嵩霞：“转型期俄罗斯的中产阶级：相关研究的回顾及思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 年第 1 期，第 55 页。

② 具体文献见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第 52 页；徐向梅：“社会转型时期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社会透视》，2000 年 5 月；汪宁：“俄罗斯中产阶级论析”，《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2 期；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关雪凌：“经济转轨中的俄罗斯中小企业”，《欧亚社会发展研究》，1998 年，第 32 页；王广振：《转型期俄罗斯中产阶级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年，第 154-156 页；沈瑞英《矛盾与变量：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年，第 61 页。

③ 庞大鹏：《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2011-2015）：政治稳定与国家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49-250 页。

授和娄春杰则从经济的角度，论述了中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结论是中产阶级能够推动政治民主和经济增长，但要看其现有的社会地位和内部结构。^①总体而言，中国学者认可中产阶级的转型力量，但其诉求反映在经济和社会民生方面，不涉及彻底的政治变革。学者们较少关注中产阶级内部的结构变化，而是把重点放在其增长模式上，这是与俄罗斯学者的不同之处。

三派学者三种观点，足见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探究性。为了探讨中产阶级与威权转型的相关性，本文不再探讨中产阶级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具有阶级属性等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其政治态度、内部结构和社会运动等方面，来解释中产阶级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三、中产阶级的规模、内部结构、政治倾向与社会运动

中产阶级究竟是社会稳定器还是变革的推动力，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量。首先是中产阶级的总体规模，决定其能否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次是内部是否同质，再次是中产阶级对民主是否有政治偏好，最后是参与社会运动的中产阶级是否有转型诉求。

（一）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规模

用以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多种多样，但基本上都围绕着韦伯的财富、声望和权力三要素。在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贵族中产阶级”、“红色中产阶级”等称谓，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历史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社会地位和职业将俄国人口划分为以下大类：上层阶级是皇族、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占总人口的12.5%；中产阶级为商人、普通官僚和职业人士（医生、律师、经理），占1.5%；工人阶级包括工厂工人、工匠、士兵和水手，占4%；最为庞大的是农民群体，

^① 曲文轶、娄春杰：“俄罗斯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6期，第35-40页；娄春杰：“中产阶级、政治民主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7-169页。

占 82%。^①此时的俄国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处于顶端的王族、贵族压迫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来实现统治。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或法国相比，俄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小、社会地位低，夹杂在上层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几乎可忽略不计。可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不具有较为成熟的商品经济和独立身份的中产群体，仍然处于封建体制和小农经济当中。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劳动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在集体农庄内部，大多数人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据中国社科院的马强记载，“人人生活得差不多，如果用比例来算，5%的人生活得非常好，10%的人非常不好，而其余的 85%生活在中等水平”。^②这是按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来划分，中等收入群体占了最大的比例，体现的是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但不见得就是中产阶级力量强大，此时的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级的概念相去甚远。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经历了私有化改革之后，俄罗斯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占居民总数 5%的苏联权贵变成了享有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20%左右的居民是中等收入阶层，70%-75%则落入贫困阶层。同时期的日本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达到了 60%，韩国则是 55%以上，俄罗斯落后不少。^③

直至今日，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的规模仍各持所见。独立社会政策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of Social Policy, NISP）认为，符合以下三条中的两条标准即为中产：受过专业教育，拥有白领工作，拥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做选择（比如为孩子选择一所教学质量高的学校）。按这一标准，富裕的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 10%，中产阶级约占 20%，剩下的 70%接近或完全处于贫困之中。^④学者欧塞·斯卡拉坦（Ovsey Shkaratan）也同意，认为俄

① Michael Lynch, *From Autocracy to Communism: Russia 1894-1941*,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8, p.5.

② 马强：《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87 页。

③ 上述数据来自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年，第 53 页；冯绍雷、相兰欣：《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1 页；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7 页。

④ Donald N. Jensen, “In Search of Russia’s Middle Class”, May 29, 2013, <https://imrussia.org/en/society/467-in-search-of-russias-middle-class>

罗斯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22%左右，其中，中产的上层占 4%，包括高级经理人和富人。这些数据较为保守，似乎普京时代与叶利钦时代相比，中产群体的质量和数量都没有提升。然而，普京的第一、第二任期是俄罗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凭借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支撑，仅在 2000 至 2007 年间，实际工资就增加了 2.5 倍，新增了 300 万个就业岗位，中产阶级的规模无疑是扩大了。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Strategic Research）以年收入来划分中产，它根据皮尤全球调查中心（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将年收入 2 万美元定为俄罗斯全国中产阶级的划分线，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为 3 万美元。按此标准，共有 29% 的俄罗斯家庭（1500 万个）达到了年收入 2 万美元的水平，而 18% 的家庭（950 万个）达到了年收入 3 万美元，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 30%。^①

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对中产阶级的规模也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采用复合型指标比采用单一指标要精准得多。奥夫恰罗娃与玛列娃制定了一个包含收入和财产状况、教育、职业以及自我评定的复合型指标。其中收入和财产状况不得低于全国人均收入、可用的耐用消费品不低于全国人口的中位值，职业是非体力劳动者，教育要求是完成了中等以上教育，自我评定的得分不得低于 4 分。^②达到了三个以上指标的家庭是“核心中产阶级”；达到了其中两个指标是“半核心中产阶级”；只符合一个指标则是“边缘中产阶级”。如表 2 所示，根据收入状况，得以进入中产梯队的群体在 10 年内增加了 8%；而根据教育或职业来划分，中产阶级规模缩小了 1%；在自我评定方面，越来越多人没有信心认定自己属于中产阶级：2000 年尚有近 40% 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但到 2004 年急剧下降，2007 年和 2011 年稳定在 25% 左右。核心中产的规模只占总人口的 5%，这一数值比 10 年前下降了近 2%，半核心中产则保持在 10% 以上。

① Мария Привалова.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России: фантом становится реальностью. 25.04. 2012. <https://www.rbc.ru/economics/25/04/2012/5703f6969a7947ac81a67519>

② 关于自我评定方面的打分标准，可看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 2014 年的报告和季霍诺娃 2016 年论文中的具体表述：Тихонова Н.Е. Влияние кризиса на жизн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6. №.4. С.52-60.

表 2 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比, %

标准条件	2000 年	2004 年	2007 年	2011 年
收入	21.2	21.3	23.2	28
教育程度和职业	21.9	18	16.9	20.8
自我界定	39.5	15.9	25.4	25.2
核心中产阶级	6.9	---	3.6	5
半核心中产阶级	---	---	11.9	10

数据来源: Малева Т.М, Овчарова Л.Н. Российские средние классы науки и на пик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Москва: Ekon-Inform, 2008. С.20.

上述划分标准的最大优点就是能够清楚地得知,以收入、教育程度、自我评定和职位 4 个指标来划分,各有多少符合要求的中产群体。但无法得知当 4 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后中产阶级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规模。就此,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也使用这四个指标,但不划分“核心”、“半核心”和“非中产阶级”,而是分为“核心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潜在或外围中产阶级”,以及“其他阶层”。其中核心中产阶级是地位最高、人员稳定性最好的群体,而边缘中产阶级则缺乏稳定性,容易跌入潜在中产阶级的群体。严格意义上讲,中产阶级只包括“核心”与“边缘”两个群体,“潜在”只是离中产标准最近、最有潜力进入中产范畴的群体,他们的分布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产阶级的分类及规模, %

	核心中产阶级	边缘中产阶级	潜在中产阶级	其他居民
2003	11	18	23	48
2008	14	20	17	49
2009	11	15	25	49
2010	15	21	20	44
2011	15	18	23	44
2013	18	24	18	40
2014	16	26	19	39
2015	18	26	56*	

数据来源: 本表 2003-2014 年数据来自 Горшков М.К, Тихонова Н.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0 лет спуст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14. С.2-28; 2015 年数据来自 Тихонова Н.Е. Влияние кризиса на жизн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6. №.4. С.52.

*2015 年的数据来源没有区分潜在中产和其他群体,只有这一个数值。

由此得出了中产阶级的人数变化曲线。如图 1 所示，在 2003-2015 年的 12 年间中产阶级人数稳步上升。2014 年的中产人数占总人口的 42%，较之 2003 年的 29% 还是有非常大幅的增长，2008 年前后的金融危机使得中产人数跌落，但不影响之后的增长。同时，核心中产阶级的人数也基本呈上升趋势，从 2003 年的 11% 提高到 2015 年的 18%。与普通中产相比，核心中产的变化幅度更大，可知该群体比普通中产阶级更容易受国际局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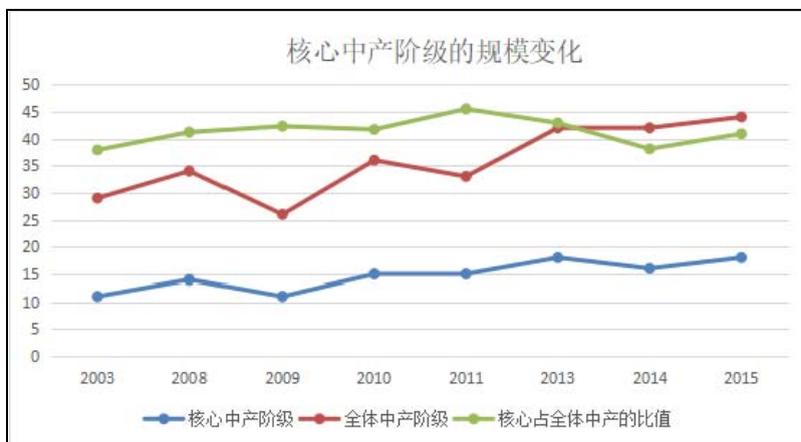


图 1 核心中产阶级的增长曲线，%

表 4 中产阶级的人均月收入（2014-2015 年，卢布）

	中产阶级		其余人口
	核心中产	边缘中产	
	2014 年 2 月		
人均月收入	23918	16694	11943
月收入中位值	20000	15000	10000
	2015 年 10 月		
人均月收入	22597	17073	13410
月收入中位值	20000	15000	11500

数据来源：Тихонова Н.Е. Влияние кризиса на жизн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6. №.4. С.52.

在收入标准上，如表 4 所示，核心中产的人均月收入中位值是 2 万卢布，

而边缘中产是 1.5 万卢布，这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季霍诺娃根据人数比例和中位数得出的数据。照此标准，中产阶级规模能达到总人口的 40% 以上。结合十年前的数据可以得知，中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平均收入差距正在缩小。从 2003 年春季到 2015 年秋季，非中产的收入增加了 5.76 倍，而核心中产增加了 3.97 倍，边缘中产的收入增加了 4.4 倍。

在年龄分布上，18 岁到 25 岁以及 31 岁到 40 岁的中产阶级分别占了总数的 20% 和 27%，说明中产阶级年轻化趋势明显。而列瓦达民调中心将 2011-2013 年的大游行界定为中产阶级为主力的游行，其中 18-39 岁的人占了 2011 年 12 月游行总人数的 56%。由此可印证，青年一代的中产阶级更激进、更具反抗精神。还需关注的是，在普京当政第一年出生、成长于普京时代的 130 万青年人于 2018 年获得了投票权。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的潜在人群，他们也频繁出现在游行队伍当中。

表 5 中产阶级的年龄段（2014 年，%）

年龄	占中产阶级的比重	占全体居民的比重
18-25	20	13
26-30	13	9
31-40	27	19
41-50	17	19
51-60	13	16
>60	10	14

数据来源：Горшков М.К, Тихонова Н.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0 лет спуст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С.13.

（二）职业分类

职业分类可引用公共经济学或政府经济学的方法，将其分为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和私人部门中产阶级。所谓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也指国家部门的中产阶级，包括政府公务员、法官、检察官、军人、安全部队、国有企业雇员、官方媒体以及由政府支付工资补贴的专家、教师、医生、地方自治机构、教会人员和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等。私人部门中产阶级也称为非国家部门的中产阶级(Non-State Middle Class)，则包括在市场经济中自负盈亏的商户、外资企业、中小企业、专家和技术工人等。俄罗斯学者多博林科夫的分类方法也极为类似——市场型中产阶级和非市场型中产阶级。两个部门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不一致，市场型中产阶级的影响是正向的，而非市场型中产阶级的影响是负向的。换句话说，市场型中产阶级（私人部门）的规模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而非市场型（公共部门）的规模扩大则会阻碍经济增长。^①按照这一逻辑，发展经济就应该努力扩大私人部门中产的规模。美国社会结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在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私人部门从业者持续上升，成为“核心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芬兰的核心部门中产集聚了专家、经理人和企业主，而边缘中产则是公务员、教师和小企业主等。^②俄罗斯则朝相反的趋势发展，如图 2 所示，68%的核心中产和 43%的边缘中产群体集中在公共部门，而在私人部门只有 13%的核心中产和 15%的边缘中产群体。这一的结构分布，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社会结构的畸形发展。

如果按时间和职业细分（如图 3 所示），首先会发现成长最快、占比最大的是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在 2007-2011 年的短短 4 年间，国有部门、安全机构官员、公共部门管理者和国有企业当中的中产阶级人数翻了一番多——2007 年只有 33%，到 2011 年就达到了 76.6%。这是质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群体间的力量对比。其次，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中产比例也在上升，从 2007 年不到 25%增长到了 2011 年的 44%——将近一半的人员达到中产的标准。由此可知普京对于军队建设和安全部门的重视程度，这一群体的福利条件、社会地位以及自我认同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仅对从叙利亚战场回来的 3.8 万军人就给予了相当于二战老兵的退伍待遇。再加上近些年全力组建的 40 万国民近卫军和信息战部队，未来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中产阶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可见，俄罗斯政府在极力培育国家部门的中产，使其成为整个中产阶级的核心力量，这不得不说是—招极为成功的“收买”策略——这一群体的职业背景、晋升渠道和福利条件依赖于政府，不太可能寻求对现有政权体系的改变，也不可能成为威权转型的主要推动力。

① [俄]弗·伊·多布林科夫、[俄]阿·伊·克拉夫琴科著：《社会学》，张树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280-283 页。

② M. Kibinen,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nd the Labor Process”, *Acta Sociologica*, 1989, No.34, pp.5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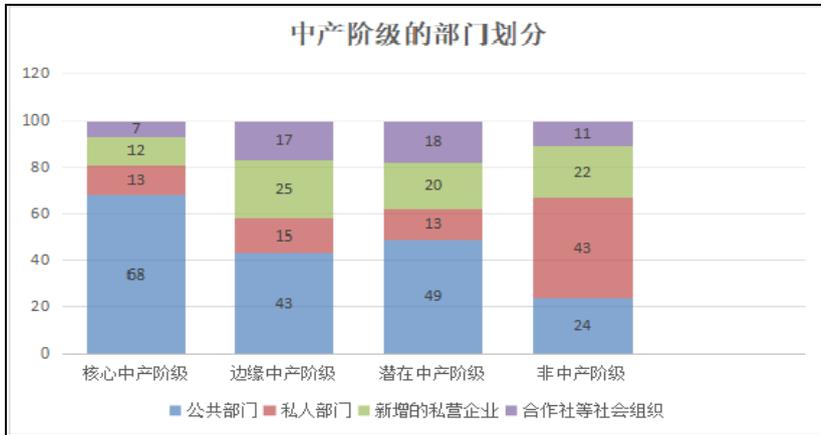


图2 中产阶级的部门分布（2014年，%）

资料来源：Горшков М.К, Тихонова Н.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0 лет спуст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С.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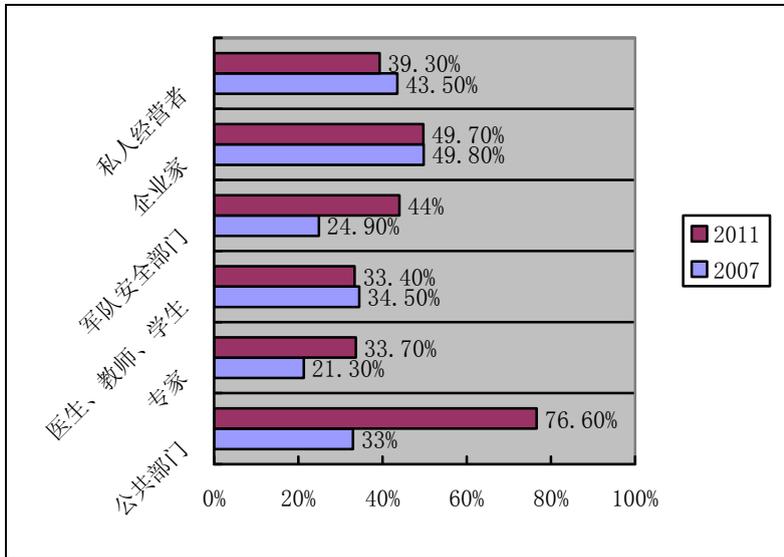


图3 各个职业当中的中产阶级比率（2007、2011年，%）

数据来源：Овчарова Л.Н.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Центр анализа доходов и уровня жизни НИУ ВШЭ, 2013. С.10.

最后，在总比例一致的情况下有升必有降，降的是那些私人部门的企业主和商人群体。2007年这一群体当中的43.5%是中产阶级，而到2011年降至39.3%。相较医生、教师和学生，这一群体的降幅是最大的。他们遭受的经济危机和制裁损失最大，面对市场的动荡也最为脆弱，有一部分已遭遇破产危机而滑入赤贫阶层。因此，商人和企业家群体对普京的支持度最低，他们失望于政府的政治经济表现，对普京承诺的未来经济改革极不信任。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反对普京当选，带动整个私营部门都对普京体制有反感情绪。如表6所示，商人和企业家群体对普京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的支持率低于平均水平12%，而反对人数超过其他职业群体。显然，如何改善与私人部门群体的关系将成为俄罗斯政府的难点。

表6 对普京参加2018年大选的态度（按职业划分，%）

	总体	退休者	失业者	熟练工人	非熟练工人	职员	商业部门专家	预算部门专家	公务员	商人和企业家
支持	47	63	40	41	42	43	45	46	50	35
反对	12	11	16	13	9	10	13	11	12	26
无所谓	41	26	44	45	49	46	42	42	38	39

数据来自全俄舆论中心2017年5月29日的调查，表格由曲文轶制。参见曲文轶：“经济因素、普京的政治支持及2018年大选”，《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2期，第102页。

（三）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

后苏联空间的中产阶级普遍存在“政治惰性”，是“沉默的大多数”，俄罗斯亦不例外。在20多年的杜马和总统选举当中，中产阶级的低投票率现象愈演愈烈，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探求其低投票行为的内在原因。戈尔什科夫在2006年就做过一个涵盖了莫斯科、圣彼得堡、图拉和罗斯托夫等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民主观调查，发现其政治兴致极低，是冷漠者、中立者、偏保守主义，也是亲普京者。如表7所示，他们不太愿意将自己界定为民主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宁愿选择“无主义”（没有倾向）。

表 7 所支持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现状（2006 年，%）

意识形态	1999	2003	2006
自由主义	14	6	12
共产主义	3	2	3
社会民主主义	6	4	4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5	5	7
共识政治	24	11	11
其他	1	1	2
没有倾向	36	51	53

资料来源：Горшков М.К. Городско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06. С.48.

对比美国学者布琳·罗森菲尔德（Bryn Rosenfeld）于 2011–2013 年对参与游行人员的调查（如表 8 所示），发现抗议人群比普通大众更有意识形态倾向。一定程度上看，他们的意识形态界定已经非常明确了：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超过了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参与游行的中产阶级当中，认为自己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人，比普通人更倾向于参加示威活动。这其中 30%的公共部门中产者自认为是民主派，而私人部门中有 39%。可见，职业性质和部门分类对意识形态有根本上的影响，即便同样参与游行的人，也对“民主主义”和“民主派”有不同的认识。

表 8 参与抗议游行人员的意识形态（2011–2013 年，%）

意识形态	2011 年 12 月	2012 年 2 月	2012 年 9 月	2013 年 1 月
民主主义者	37.8	31.4	28.9	37.2
自由主义者	31.2	27.	23.1	25.2
共产主义者	12.6	18.2	17.1	7.4
社会民主主义者	9.5	10.4	9.9	8.9
民族主义者	6.1	12.7	11.7	7.4

资料来源：Bryn Rosenfeld, “Reevaluating the Middle-Class Protest Paradigm: A Case-Control Study of Democratic Protest Coalitions in Rus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Vol.111, No.4, pp.648-649.

倘若只围绕民主观这一方面，则可将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民主观与整个欧洲的民主观做对比。戈尔什科夫在 2006 年的大城市中产阶级调查里，专门罗列出了对民主观的调查，针对的是民主不同要素的重要性（如表 9 所示）。

欧洲社会调查小组在 2012 年开展的 29 个国家民主观调查，也针对了“民主不同要素的重要性”，并加上了“如何评价民主”以及“如何预估民主的未来走向”三个问题（如表 10 所示）。从两者的调查结果来看，双方都认为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因素。俄罗斯的数据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2%）、司法独立（34%）和新闻出版自由（27%）。然而，在政治反对派的功能和自由选举方面，俄罗斯与大部分欧洲国家出现了分歧——对于政治反对派的作用，只有 15% 的俄中产阶级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比普通大众的 17% 还要低；“自由公平的选举”是仅次于“法治”而最多被欧洲民众选择的，但俄罗斯人对自由选举的重视程度几乎排在倒数。这一结果与季霍诺娃 2010 年的研究结果相同：俄罗斯中产阶级认为反对派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其作用不是批评政府，而是协助政府更好地工作。此外，与普通大众相比，中产阶级对工人参与企业管理（6%对 10%）和减少收入不均（14%对 19%）等更为淡漠。鉴于此，俄罗斯中产阶级重视实质民主胜过选举民主和价值民主，体现的是民主的“工具性”和“投机性”。

表 9 “以下选项你第一眼就意识到，这就是民主”（2006 年，多选题，%）

民主因素	城市人口	城市中产阶级
支持不同政党的权利	27	29
自由选举	10	10
司法独立	29	34
宗教自由	34	43
政治反对派是为了监督政府	17	15
罢工的权利	19	22
新闻出版自由	21	27
最重要议题上的全民公投	18	23
员工参与企业管理	10	6
加入任何政党的自由权利	3	4
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	19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7	52
直选总统	25	34

数据来源：Горшков М.К. Городско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С.23.

表 10 民主不可或缺的因素，2012 年

	选择次数最多	选择次数前三	选择次数最少	选择次数后三
自由公平的选举	2	17	0	0
可区分的政党	0	0	0	10
对政党的批评	0	1	0	0
政府问责	0	13	0	1
政府自我辩护	0	0	0	0
参与审议	0	0	4	23
责任政府制	0	0	24	28
对移民的包容	0	0	1	13
法治	26	29	0	0
横向问责	0	10	0	0
少数者权利	0	0	0	3
新闻自由	0	0	0	2
媒体可靠性	0	5	0	0
打击贫穷	1	11	0	0
缩小收入差距	0	1	0	5
直接选举	0	0	0	2

资料来源：Monica Ferrin and Hanspeter Kriesi, *How Europeans View and Evaluate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3.

表 11 中产阶级的政治选择（2013-2014 年，%）

	2013			2014		
	总体	中产阶级	核心中产	总体	中产阶级	核心中产
现政权即便有错也支持	70	76	79	73	75	79
现政权必须被推翻	28	23	21	27	24	20
俄罗斯需要铁腕才有稳定	62	61	63	59	52	49
民主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	38	38	37	40	48	51
稳定比改革更需要	68	69	69	70	69	78
哪怕影响稳定也要改革	31	31	30	29	31	22

资料来源：Петухо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в стране и их восход среднеласник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14.

此外，俄罗斯社会学所综合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佩图霍夫（В.В. Петухов）也对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和 2013 年相比，2014 年选择“不能

失去民主”的中产人数增加了10%，比总体值多了8%。然而在具体实践上，支持“淡忘错误而支持现政权”的中产阶级比普通大众还要多。较之2013年，2014年选择“俄罗斯需要强权”的人减少，但有近70%的人选择“稳定比改革更重要”等等。选择“国家需要改革”的人数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改革派仍然属于少数派。尽管这一数据的可信度值得商榷，但无可否认反映了大部分中产的政治态度和选择倾向，普京依然是中产阶级认可的领导人。

（四）社会运动

中产阶级表达自我诉求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参与竞选活动、加入政党、提交请愿书等，但最为激烈的是抗议游行。中东欧国家近些年爆发的颜色革命，重新让人认识到了社会运动对政治转型的巨大影响力。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社会抗争必须从规模和强度上都达到一定标准，才会促成威权转型。在强度方面，只局限于地方性抗议对威权政体的威胁有限，必须由地方性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抗议，且抗议中心要在首都。在规模上，人数稀少的抗议也不会引起政府的重视。甘森（William Gamson）的研究表明，成员规模低于1万人的抗议只有30%的成功率，而成员高于1万的成功率达到了67%。^①

从诉求方面看，抗议一般从经济诉求开始。威权统治者为了获得政治合法性，都要促成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一旦出现经济危机等不可控的因素，以经济诉求为主的抗议就会爆发。但要想促成威权主义转型，抗议者必须拥有政治诉求。以政治诉求为目的的抗议活动，无法通过给予抗议者经济好处而平息下来。因此，抗议政治学提出了一个模型——抗议兴起后，将经历经济抗议、政府回应、政治抗议，最终达到政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目的。^②于俄罗斯而言，近十年来的抗议活动从经济诉求转变为政治诉求，这印证了抗议政治学的模型。然而政治诉求也有程度差别，抗议人群有多种组合方式。因此，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来判断一次抗议带来多大的政治影响力。

^① William Gamson,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51.

^② 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6-235页。

列瓦达民调中心对三次大游行的调查，就包含了抗议的人群组成和抗议者的动机。尽管调查当中并没有特意选取中产阶级作为对象，但可以从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选项筛选出中产群体。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游行参加者都有大学文凭，2012年9月这一比例为53%，而2013年7月为71%，表明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参与到游行当中。企业主和小型公司的所有者相对来说比较少，在8%-10%之间。在私人部门方面，2012年9月私人部门从业者占参与游行人数的32%，到2013年6月上升到51%。^①这印证了私人部门比公共部门的参与比例更高的观点。在收入方面，6.6%的人能支付食物费用但支付不起衣物费用，40%的参与者能买得起冰箱电视机等高档耐用品，15%的人能够买得起车。由此可知，抗议者大部分介于中、低收入之间，属于“边缘中产阶级”和“潜在中产阶级”。

表 12 抗议者的群体属性，%

	2011年12月	2012年2月	2012年9月	2013年1月	2013年6月
支付不起衣食	3	2	1	1	1
支付得起食物， 支付不起衣服	4	5	7	5	7
有足够衣食，买 不起电视冰箱	21	25	29	19	17
买得起冰箱电视， 买不起车	39	41	45	58	35
买得起车	27	24	16	16	31
买得起任何想 要的东西	5	3	3	1	8
很难回答	1	0	0	0	2

资料来源：Левада-центр. Опрос на митинге оппозиции 12 июня. 17.06.2013. <https://www.levada.ru/2013/06/17/opros-na-mitinge-oppozitsii-12-iyunya/>

在抗议诉求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政府的不满”、“反对政府迫害反对派人士”是一半以上人群的参与动机，要求普京下台也排在前列。民众陷入了政治厌倦期，对于政府官员在“在电视上侃侃而谈”、“填满自己的口袋”，

^① Левада-центр. Опрос на митинге оппозиции 12 июня. 17.06.2013. <https://www.levada.ru/2013/06/17/opros-na-mitinge-oppozitsii-12-iyunya/>

以及“帮助其他国家”没有好感^①，而是希望能够看到中产阶级的上升空间，改变垄断式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模式。还值得注意的是，10%的人选择了“跟从朋友去参与”，这是典型的“机遇螺旋”效应。社会抗争本身能够带来持续的抗争机会，刺激其他群体的抗争行为，一起抗争事件会引发另一起类似的抗争事件发生，它的反面是“沉默螺旋”。螺旋效应在俄罗斯较为普遍：大部分人都不行动，则原本有行动意向的人也退却了，只要有代表行动起来，则剩下的人不断效仿，大规模的抗议就此爆发。

表 13 抗议者的参与动机，%

	2011年12月	2012年9月	2013年1月	2013年6月
对政府的不满	73	40	68	70
对政府迫害反对派的不安、愤怒	——	——	——	60
道德责任感	——	29	34	53
政权更迭，普京下台	——	26	46	46
对抗议游行的支持	——	25	19	37
许诺的改革是虚假的，民众没有参与权	52	11	22	16
跟随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去参与	10	10	3	6

资料来源：Левада-центр. Опрос на митинге оппозиции 12 июня. 17.06.2013. <https://www.levada.ru/2013/06/17/opros-na-mitinge-oppozitsii-12-iyunya/>

然而，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与私人部门的中产阶级是否具有同样的政治动机？从美国学者罗森菲尔德的统计来看，两者的行动出发点并非一致：33%的私人部门中产阶级要求推翻普京统治，而公共部门的只有26%；22%的私人部门中产阶级因经济要求而示威，而公共部门的为30%。可见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是要求政府给予更多好处，而私人部门的中产阶级有更多的政治诉求。从参与规模上看，两者也有显著的差别。如图4所示，55.9%的示威者属于中产阶级，而整个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一半，因此中产阶级的参与度比其他阶层更为活跃。同时，来自公共部门的中产阶

^① Andrei Kolesnikov, Denis Volkov, “Do Russians Want Change?”, January 16, 2018,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75261>

级参与者与其人口比例相当，为 14%左右，因此超额参与者就来自私人部门——只占了总人口 20%的私人部门中产阶级却有 42%的参与率，大大提升了整个中产阶级的参与规模。按照这一逻辑，只要扩大公共部门中产阶级的比重，减少私人部门中产阶级的比重，就能有效地削减类似的抗议运动。对于那些参与抗议游行的公共部门中产，可以通过取消其职务、地位、特权和晋升机会来达到让其屈服的目的。如此一来，自下而上的动员就可以有效管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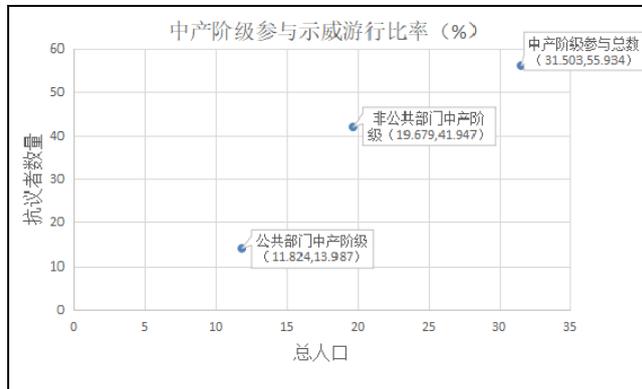


图 4 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参与游行的比率（2011-2013 年）

数据来源：Bryn Rosenfeld, “Reevaluating the Middle-Class Protest Paradigm: A Case-Control Study of Democratic Protest Coalitions in Rus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Vol.111, No.4, p.644.

并非所有的集会游行都是为了抗议。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出现的大规模游行则是支持政府的。虽然有部分人认为政府裹挟了民意，打着人民的旗号来满足当权者的野心，“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民众的诉求，是来自政府的礼物”“自由换克里米亚”，^①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俄罗斯自尊心的体现，是对过去错误的一种纠正。中产阶级参与反政府游行，也有另一部分参与支持政府的集会。2012 年“欧洲晴雨表”的调查表明，尽管中产阶级比普通大众更为反动，但同样比普通大众更为支持政府。这看似矛盾的结果

^① Andrei Kolesnikov, “The Russian Middle Class in a Besieged Fortress”, April 6, 2015, <http://carnegie.ru/2015/04/06/russian-middle-class-in-besieged-fortress-pub-59655>

却表明了中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两极分化严重。诚如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所言，中产阶级在参与反对派集会时表现活跃，但在支持政府的集会上同样活跃。

表 14 中产阶级参与反普京和支持普京的游行集会
(2011-2012 年, %)

	中产阶级	全体居民
参与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	15.9	2.1
参与支持普京的游行集会	8.4	0.9

数据来源: Eurobarometer, “Russia Survey 2012”, <https://www.gesis.org/eurobarometer-data-service/survey-series/central-eastern-eb/sampling-fieldwork/>

对此现状的另一解读是中产阶级民粹化。民粹主义在俄罗斯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指 19 世纪起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企图以人民的力量，依托村社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包括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到民间去”运动和“土地和自由”运动等，也称为经典民粹主义。第二种则接近于当代西方学界的定义，指大众力量反精英、反全球化、排外和民族情绪的政治社会态势，也叫平民主义。其所发起的民粹运动可引发社会动荡，侵蚀到政权的合法性，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颠覆力量。第三种则是现代化进程和民主政治的新产物，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工具，领导者通过迎合中下层民众、宣扬平均主义来赢得选举。领导者也可利用外交安全困局来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达到聚集到领袖周围的“旗帜效应”，以此转移国内矛盾，“执政集团借以作为掩饰国家和公民的隔阂、维持现状的手段”。^①俄罗斯中产阶级民粹化体现在，一方面中产阶级认为政治腐败和选举不公侵害了自身利益，迫切希望政治权利的维护，另一方面又在克里米亚事件、美欧经济制裁、英国间谍门事件和俄罗斯运动员兴奋剂事件上支持普京，反对西方的威胁。由此可见，普京对于中产的民粹化具有“可控性”。^②通过引导民意，激发民意，

① 关贵海、林文昕：“俄罗斯民粹主义：现象、根源与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29 页。

② 费海汀：“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历史比较”，《国际政治科学》，2017 年第 4 期，第 122 页。

培养有利于自己的民意，在此基础上要求按民意行事，这就是裹挟民意的典型做法，体现的是民粹主义的政治手段。照此趋势，中产阶级内部将更加分裂，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更加被动和可操控。

（五）中产阶级的国家构想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 2014 年的报告，对于中产阶级理想的国家形态进行了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社会正义、人人平等”的权利，其次是“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回归国家传统、道德价值观”和“人权、民主、言论自由”；但“自由市场”和“新的革命”支持者较少。由此可见，中产阶级仍然是保守的、重视稳定胜过民主自由的保守派。

表 15 中产阶级希望呈现的未来国家形态，2014 年，%

	中产阶级	所有人口
正义社会、人人平等、国家关心人民	49	56
俄罗斯回归大国地位	35	31
回归传统价值、道德观	34	32
人权、民主和自我表达的自由	33	27
社会稳定，没有革命和动荡	27	29
强大、严酷的力量来保证社会秩序	16	21
俄罗斯是俄罗斯人民的民族国家	16	20
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问题	14	12
自由市场、私人财产权、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	14	10
与西方和解，加入西方共同家园	10	6
新的革命和变革以重建俄罗斯	1	2
上述项目都不符合	2	3

数据来源：Горшков М.К, Тихонова Н.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0 лет спуст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С.101.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与列瓦达中心合作的调研结果则是相反的结论，民众迫切期待改革：42%的人支持决定性的、大规模的改革，41%的人赞成渐进的改革，1/5 受访者认为有必要保证自由和公平的选举，1/3 的莫斯科人认为未来应该提高国家服务质量和对企业的扶持，只有 11%的人拒绝改变。^①尽

① Andrei Kolesnikov, Denis Volkov, “Do Russians Want Change?”, January 16, 2018,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75261>

管无从探求两个报告中哪一个更精准地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心态，但可以肯定，中产阶级确实一方面寄希望于改革，打造更为开放和自由的市场，保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又惧怕改革带来的动荡，对现有的福利和好处不忍放弃。倘若大多数中产阶级偏向保守，则会拒绝风险，继续走威权主义道路而支持普京的政治治理，倘若是偏向革新，则对自由和民主有新的界定和期许，乃至加入“西方共同家园”。

四、结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产阶级是俄罗斯威权政体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还是维护威权体制的稳定器。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为代表的官方机构不认为这一问题有可商榷的空间。因为中产阶级正在稳定增长，核心部分始终是稳定和适中的，潜在中产阶级正在向外围和核心部分迈进，上升渠道畅通有效，中产阶级始终是社会的稳定器。尽管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引发了抗议游行，但这只是发展性问题而不是结构性问题。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为代表的独立机构则认为，中产阶级已经崛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变革力量。但是局限于内部分裂和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中产阶级不具备行动的能力。除小部分上街游行外，大部分表现出政治的冷漠，继续充当沉默的大多数。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从现代化理论出发，认为中产阶级将成为转型的主要推动力。这一看法考虑到了中产阶级的分裂、软弱和保守观念，认为转型能否发生将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的自由派学者则认为，中产阶级处在变革和守旧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期待民主化改革来抑制腐败、提高司法公正度，另一方面担心改革的动荡，强权削弱后整个社会局势会走向不稳定。

结合上述各方观点，以及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规模、政治态度、职业分类和未来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产阶级崛起趋势不可逆转。俄罗斯中产阶级与西方国家一样，要求公平选举、开放而自由竞争的市场以及更高的政治地位，这是其与生俱来的阶级属性。但是，俄罗斯的特殊性就在于中产阶级对威权体制转型的态

度不一致，目前有以下三类：（1）推翻威权体制，改变空有民主政体之表，而无多元主义之里的局面；（2）维持威权体制和强人政治，不改变现有的垂直体系架构，但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自由市场和法治，建设真正的公民社会；（3）不诉求对现有局面的任何改变，不能对任何事物产生影响，因此不想影响任何事物。即便改变现状，也应该是政客的事，普京可以是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是主要的改革者。这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分为相互对立的三个派别，民主派、中间派和保守派。目前来看，中间派和政治保守派占据了上风，对未来“求变”诉求不及“求稳”诉求。

其次，中产阶级内部结构异质化，导致了意见和行动的分裂。这一群体中，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是以国家财政支付薪水、获得职业地位和晋升渠道的政府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强力部门从业者、从政府获得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国有媒体和教会人员。他们是保守派和中间派，不寻求颠覆政权，但希望有一定程度的改革以使自身得到更高地位和利益。他们依赖于现有体制，是维护政权的中坚力量，反过来也是威权转型的主要阻碍力。而中小企业从业者、外资企业雇员、个体工商户等私营部门中产群体，是经济危机和西方制裁的主要受害者，也是长期遭受经济垄断和寡头资本主义迫害的群体，他们成为抗议游行的主力，是威权体制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倘若俄政府没有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一部分群体很有可能结成政治联盟而成为体制外反对派，充当威权体制掘墓人的角色。此外，还有在私营媒体、不受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私人运营机构、纳瓦尔内为代表的反对派中产阶级，是《非营利组织法》和《外国代理人法》的管控对象，他们的诉求是完全颠覆现有体制，结束普京统治，但他们仍然是社会上的少数派，不足以撼动普京坚实的民意基础。

第三，普京有意培育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使其居于核心中产的地位，成为中产的多数人群。特别是通过军队和联邦公务员队伍建设来加强垂直权力体系，稳固现有权力模式。目前来看这一举措卓有成效。公共中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四年内增幅超过两倍，超过一半的核心中产阶级都在公共部门，这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产群体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和独立属性。普京得以

借助这一群体的力量来主导整个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动，中和中产阶级内部的反对力量。私人部门中产规模不断缩减，生存和发展空间受限，除一部分得以进入核心部分外，其他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的边缘部分。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化是公共部门中产规模膨胀的必然结果，使中产阶级不仅充当社会稳定器，还要充当威权体制的稳定器。在整个中产内部，稳定超过变革，发展超过民主，秩序超过公平的倾向十年来有所加强。

最后，延续这样的中产阶级建设模式，将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公共部门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私人部门的中产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中产阶级结构的不合理，也反映了俄罗斯能源经济结构的畸形。延续目前的结构势必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也限制了中产阶级自身的成长。如同俄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戈尔什科夫所言，按照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继续下去，中产阶级增长能量已经耗尽了。鉴于此，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产人群的均衡增长，保持经济增长并维护社会稳定，将成为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ddle clas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has been controversial.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middle class is the backbone for the authoritarian transition, and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middle class is the stabilizer of the society, which will hinder the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iddle class who has grown up in the Putin era as a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elaborates the ambival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against the Putin regim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ts internal structure, value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social protest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middle class exists internal heterogeneity. The one in the public sector relies heavily on the authoritarian and the others in the private sector does not satisfy the exist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The split has left Russia's middle class unable to make political appeals as an independent and integrated whole. As a resul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ddle class and quelling the protests will become a challenge for the Putin

regime.

【Key Words】 Middle Class; Russian Society; Russian Social Transi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ак развёртывалась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возникли спор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редним классом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ей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Одни учёны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ой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а другие считают, что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м и стабилизатором общества, он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одной стороне, внутр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 существует разнородность.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екторах сильно зависит от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и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частных секторах не довольствуется имеющим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татусом и является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аскол двух групп приводит к тому,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не может выраж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м и целостном качестве. По мере измен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ы, как налажива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средним классом и умирять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доминированные ими, является серьёзным вызовом д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утин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欧亚研究中的问题领域

俄罗斯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当代选择 ——以农业政策为例*

C·巴尔苏科娃**

【内容提要】俄罗斯的国家农业政策，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政治底色，到当前国家介入和支持农业的重大转变。从农业土地私有化和私人农场的创立，到通过国家优先发展规划（农工综合体）、制定俄罗斯食品安全理论；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到实行进口替代（以回应西方制裁）等主要农业政策，可以看出俄罗斯农业政策中的自由与保守两种色彩。俄罗斯农业政策不能一以贯之，原因是高度受制于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也有俄罗斯内部发展模式转换的因素。

【关键词】俄罗斯农业政策 俄罗斯进口替代 俄罗斯食品市场

【中图分类号】D751.2; F3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5-0077(20)

俄罗斯当前的农业政策受到的关注程度，似乎超过了整个后苏联时期。进口替代政策的实行，意味着俄罗斯要肩负解决一个复杂问题的重任：用国内生产的食物满足国民的需求。然而农业是惯性极大的一个领域，只有长期、

* 本文俄文版发表于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杂志2017年第5期（俄文标题为：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英文版发表于Social Sciences杂志2017年第4期（英文标题为：Agricultural Policy in Russia）。根据文章的主要意思，中文标题略有调整。作者授权本刊发表中文版，在此表示感谢。

** C·巴尔苏科娃（С.Ю. Барсукова; Svetlana Barsukova），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经济社会学系教授、经济社会学研究实验室副主任。

持续的努力，才能在农业上取得成功。目前的努力能够持续多久？接下来是否又会被取消？这些都是疑问。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农业改革 ——土地的“半私有化”与建立私人农场的努力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农业政策是不合理的。当时的中央政府不问经济成效如何，就把资源分配给农业生产者。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亏损，会定期地被一笔勾销。强制的农产品征收政策，限制着发展动力。由此，苏联农业部门以农产品产出低效、劳动生产力效率更是极低而著称。但这是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下唯一可能的农业生产和组织模式，其实质是，为了社会进步的名义（彼时的社会进步被理解为公平），经济效率要时刻准备做出牺牲和让步。苏联农业领域内如此不正常的经济政策，为的是要达到两个效果：保持食品低价格和确保农村居民就业。在冷战期间，这事关苏联的大国荣耀与苏联体制的说服力。换句话说，政治的权宜之计，是苏联农业政策的基石。

政治路线的变迁（起始于戈尔巴乔夫主政期间的改革，以及此后叶利钦治下改革的加速），意味着此前农业政策的终结。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方案，要求在农业经济中引入市场原则。按照他们的方案，在农业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农业土地私有化和建立私人农场。从中体现出的与其说是改革者们的坚定决心，不如说是其对市场肤浅天真的认知。

虽然国外的经验已经表明，即便没有土地的私有化，仍然可以有发达的、市场化的农业经济（如英国），但土地私有化仍然一度被认为是俄罗斯农业改革的必需要素。俄罗斯土地私有化开始于 1990 年的“土地改革法”^①。此举带来了大量的、直到今天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土地私有化的初始方案，是建立一个“土地分配基金”^②，占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 10% 的土地，从中把土地分配给那些想成为私人农场主的原集体农民。但是很快就表明，绝大多数

① Закон РСФСР “О Земельной реформе”

② Фонд пере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земель

数原集体农民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做私人农场主。这种情况可能导致退回到原有的社会主义土地所有权模式，对于自由派改革家而言，这是无法接受、也不会考虑的选项。为了应对此种倒退的危险，叶利钦总统在 1991 年底签署了第 323 号总统令：“在俄罗斯执行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①，其实质在于，迅速、一步到位地在新所有者间分配土地。该总统令开启了在紧急状态下推进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对数以百万计的新土地地块进行测量和登记，在技术上是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引入“土地份额制度”^②的原因。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给农场成员颁发特殊的“证书”，证明其拥有一份农场土地的份额。实际上，人们获得的是“土地份额证书”，而不是土地本身，这种私有化方式由此被称为“半私有化”。^③跳过期间的过程来看今天的现状：目前有近 900 万份土地份额（约代表 9000 万公顷土地），仍然没有“实物兑现”，仍然是属于“集体土地份额所有权”^④，而不是真正的土地私有权。由此，在土地使用方面，造成了大量的问题和混乱。^⑤

在创建私人农场主阶层的问题上，依据的是同样幼稚的逻辑和思路：快速完成。但是大部分集体农庄成员不想成为私人农场主，不愿意自己经营农场，因为要承担风险和缴税。他们宁愿继续做农业企业的员工，过着按时领工资的生活。在大规模的宣传造势之下，以及国有和集体农场被强制取消，私人农场还是被推动起步了。但很快就表明，私人农场根本无法生产出与国有和集体农场等量的食品商品来。从 1992 年到 2000 年，在俄罗斯农业总产值中，私人农场的份额仅仅从 1.1% 提高到了 3.2%。^⑥

改革者们认为，只要私人农场拥有土地，并且能在自由市场上买卖，其

① Указ № 323 «О неотложных мерах п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земельной реформы в РСФСР».

② Институт *земельных долей*

③ Виссер О, Мамонова Н, Споор М. Инвесторы, мегафермы и “пустующие” земли: крупные земельные сделки в России// *Земельная аккумуляци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Под общ. ред. А.М. Никулина.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Дело” РАНХиГС, 2012. С.77.

④ 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земел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РФ в 2014 г. http://www.mcx.ru/documents/document/v7_show/34347.133.htm

⑤ Фадеева О. Земе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селе: наступит ли “момент истин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 2009. Т.10. №.5. С.50-71.

⑥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Росстат, 2015. С.393. http://www.gks.ru/free_doc/doc_2015/year/ejegod-15.pdf

经营效率就会自动提高，因为有苏联农村居民副业蓬勃发展的先例。1990年，在苏联解体前夕，这些居民副业贡献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农业产出。改革派思想家把居民副业的成就，归功于私人劳动、归功于“为自己”自由工作的胜利，并且认为私人农场会同样取得成功。他们错了，因为他们不明白在苏联体制下社会化农场与家庭副业之间的共生关系。资源先是由中央统一分配给国有和集体农场，然后再分流至家庭副业，进而保障后者的发展。^①随着社会化农场的解体，家庭副业失去了“供血者”（донор），其经济奇迹也就风光不再了。实际的情况是，私人农场并没有复制苏联家庭副业的辉煌，而是大批地破产，或者是将其经营范围缩小到供应自己家庭所需。其农产品的盈余度（可用于销售的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企业。俄罗斯农业生产遭遇了悲剧式的滑跌：2000年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是1990年水平的62.8%。1990-2000年间，牛的数量从5700万头减少到2750万头，险些倒退了半个世纪（作为比较：1942年是1880万头）。^②

表 1 1990-2014 年俄罗斯农业产出情况

	1990	2000	2010	2014
按生产者类型的农业产出占比，%				
农业企业(从国有农场、集体农场转型而来)	73.7	45.2	44.5	49.5
家庭副业	26.3	51.6	48.3	40.5
私人农场		3.2	7.2	10.0
主要农产品的产量				
牛肉和鸡肉（万吨）	1011.16	444.58	716.68	907.03
牛奶（万吨）	5571.53	3225.90	3184.73	3079.09
粮食总产量（百万吨）	116.7	65.5	61.0	105.3

农产品生产衰退造成的市场供应不足，导致大量进口几乎没有关税和配额的外国产品。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是美国牛肉的最大出口市场。1997

① Никулин А.М.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и семьи в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симбиоз// Куда идет Росс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 Под ред. Т.И. Заславской. М.: Дело, 1998. С.218-229.

②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охота и охотничье хозяйство, лесовод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Росстат, 2015. С.92. http://www.gks.ru/free_doc/doc_2015/selhoz15.pdf

年，俄罗斯食品进口额达到了 133 亿美元，是出口额的 8 倍多（出口额为 16 亿美元）。当时，在俄罗斯的进口结构中，食品和农产品原料占 25.1%；而在出口结构中，二者仅占 1.9%。^①

总之，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农业改革，名义上说是由经济合理性所驱动，实际上是改革派政治计划的牺牲品，他们为了推行其自由化方案，不惜一切代价。“向市场的一跃”^②是俄罗斯农业经济的灾难。^③对于这些改革派，俄罗斯人称之为“翻版的布尔什维克”^④并非偶然，意在强调他们对一种思想的痴迷甚至到了违背常识的地步。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与社会主义做斗争的自由派改革家，沿袭的恰恰是为了达成政治目标而牺牲经济的苏联式逻辑。

2000 年代的农业政策：国家回归

进入 21 世纪，在农业经济中，政府调控的因素回归。原因有很多，诸如对市场“自我组织”结果的不满，对进口食品依赖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的整体衰落等。普京的政策是逐步提高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借此恢复国家的“秩序”。该政策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疲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动荡了。农业政策也随之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对进口食品引入配额制度，以及制定“发展农工综合体（2006-2007 年）”的国家优先计划。^⑤

国家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上升，有两个原因。其一，对农业的投入和资助能使执政当局获得政治红利，由此可以表明其“人民性”，及其渴望回到保守主义精神价值传统的“根本”。其二，1998 年的金融危机和卢布贬值，造成进口食品价格上涨，推动投资流向本国农业领域。同时，农业利益集团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 2003. С.638-639. http://www.gks.ru/bgd/regl/b03_13/Main.htm

② Рынок в рынок

③ Нефедова Т. Сельская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епуть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3; Абалкин Л.И. Аграрная трагедия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9. №.9. С.4-14.

④ Большевики наоборот

⑤ Приоритет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ект “Развитие АПК” (2006-2007 гг.)

开始活跃起来，要求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即便此后金融危机的衍生效应渐渐淡去，但是已经投下的资本，仍然寻求行政的保护。

但政府仍然在惯性的影响下，部分地延续着此前的自由化方案，包括积极争取世贸组织成员的资格（需要提醒的是，俄罗斯在 2006 年与美国成功达成协议）。在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一面是农业利益集团，在俄罗斯农业部的支持下，主张采取保护性的措施；另一面是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和财政部为代表的具有自由派思想的经济集团。前者提倡爱国主义，主张食品自我供应；后者秉承自由市场观念，支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

对部分进口食品引入配额制度，可以视为农业利益团体的胜利。2003 年，在俄罗斯独立之后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来自非独联体国家的肉类实行了配额制度，一改此前的“开门”政策。对鸡肉采取了绝对配额制（进口量不允许超过配额）。但是由于俄罗斯的方向是加入世贸组织，俄方承诺在 2003-2008 年期间，逐年提高肉类的配额额度，并降低超过配额部分的关税；对于鸡肉，从 2006 年起，从绝对配额制转为关税配额。俄罗斯确实这样做了。

肉类进口配额是“按国家”组织分配的，即，给每一个出口国固定的配额。俄罗斯的进口商希望取消这种分配方式，即，不必从既定的国家范围进口，而是可以从那些产品价格低的国家进口。如果这样的话，食品的价格就能降下来。但是政府部门仍然根据“政治需要”，在不同的国家间分配配额。这样的安排并非出于市场或者价格的衡量，而是出于对俄罗斯与特定国家之间关系的考虑。

提高肉类进口配额的趋势，在 2009 年终止，因为“发展农工综合体（2006-2007 年）”的国家优先规划中，包含了对养殖业的支持。遏制进口仍然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除了经济考虑之外，这个“发展农工综合体”规划还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此时，临近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普京准备重返克里姆林宫），两次重要的选举都要“保护后方”，即改善那些最为薄弱、同时又涉及相当选民利益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农业经济有着特殊的地位。

最初，国家预算拨给“发展农工综合体”国家规划项目 350 亿卢布，后

来提高到 470 亿卢布，并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资助。这是一个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规划：不直接给农业生产者任何补贴。其支持农业的主要工具，是对贷款进行补贴。农业生产者可以从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然后由国家把部分利息支付给银行。换句话说，在国家规划中配置的资金大部分流到了金融部门，农业生产者可以藉此在金融部门获得低息贷款。举例来说，普通贷款的年利率为 14%，而在此国家规划的支持下，农业贷款的年利率仅为 3%~4%。私人农场和家庭副业生产者，无论其生产的农产品品种是什么，都能获得优惠贷款；而农业企业只能在建设或者更新养殖场项目方面，获得此类贷款。

这种情况很能说明政策的性质。从经济效率上说，支持家庭副业生产者是很有问题的。但对其的支持，与其说是经济政策，不如说是社会政策。自由派经济学家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支持，认为财政资源应该集中支持管理先进的农业企业，而不是“散花式”地支持所有农民。但是俄罗斯的国内政策逐步朝着国家-保守主义、父权-家长式的国民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民俗化的方向发展。饲养一头奶牛的老奶奶也是国家支持的对象，这在“村间小屋”（Домик в деревне）^①牛奶品牌的广告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对养殖业的支持很能表明政府对普通农民的关注。要知道，俄罗斯国内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呼声，即，支持种植业。特别是从出口创汇的角度，粮食、大豆和植物油是最具前景的。从 2002 年起，俄罗斯进入了国际粮食市场，此后逐年扩大市场份额。鉴于无可争议的成就，粮食出口商希望成为政府农业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但是在“发展农工综合体”国家规划的框架内，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养殖业利益集团声称国家对（肉类）进口的依赖是不能接受的，这个集团在争取政府资源方面，赢得了明显的胜利。

从“发展农工综合体”国家规划项目中，可以总结的最后一条，是官僚、行政高于市场之上，这也与俄罗斯国家整体的变化相一致。大额的补贴贷款，只有在得到地方行政部门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发放。行政部门有权认定每一个具体项目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有无助益。此外，在抵押不足的情况下，地方

^① 该商业广告上的图片，就是一位典雅的老奶奶，一头干净的奶牛和一所别致的村间小木屋——译者注

行政部门可以出面向银行担保（依托专门的担保基金）。而其他没有得到地方行政部门支持的借贷者，只能从银行申请普通贷款，即，没有利率补贴的优惠贷款。与政府关系的远近，是能否获得经济机遇的主要因素。

很难相信，在俄罗斯农业部的网站上，居然每周公布“发展农工综合体”国家规划执行情况的排名。得益于驯鹿养殖的数据，雅库特经常是排行榜的前几名。该国家规划项目胜利完成。农业部的总结报告指出，不仅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而且绝大多数是超额完成。显然，有一些指标是“书面”上完成的，比如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数量。一些合作社在国家规划执行完毕之后，也就关门大吉了。虽然这些报告与苏联时期的报告有相似的荒诞之处，但是“发展农工综合体”项目本身是真实和重要的：在养殖业领域内实施了为数众多的投资项目，也由此带动了农业领域内的商业投资。在国家的支持下，农业逐渐被视为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在 2005-2010 年间，在农业经济领域内的固定资本投资增长了近 3 倍，从 790 亿卢布增加到 2020 亿卢布（按实际价格）。同期，牛肉和鸡肉的产量（净重）增长了近 50%，从 500 万吨提高到 720 万吨。但是由于转型期肉类产量跌幅过大，以至于还没有恢复到 1990 年的水平（1010 万吨）。诚然，由于商业界不信任政府会严肃、长久地扶持养殖业，他们往往做那些“短平快”、回报迅速的项目。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做“速熟肉”：鸡肉和猪肉。就鸡肉而言，在 2005-2010 年间，进口鸡肉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从 47% 下降到 18%，俄罗斯本土鸡肉产量的发展速度之快于此可见一斑。就猪肉而言，由于回报周期短，凭这一点就可以抵御政治形势波动的影响，因此很多投资者选择投资猪肉生产。至于俄罗斯国内最为缺乏、进口量最大的肉类产品——牛肉，由于生产周期长、风险大，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极其谨慎。^①

俄罗斯对食物安全的特殊解释（2010 年）

农业经济的成功以及俄罗斯国内对保守主义的偏好，为梅德韦杰夫总统

^①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охота и охотничье хозяйство, лесовод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Росстат, 2015. http://www.gks.ru/free_doc/doc_2015/selhoz15.pdf

在 2010 年签署“食物安全构想”铺平了道路。评价这一举措的重要性，需要回顾该问题的历史轨迹。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反对派的俄共，反复提出要制定一部这样的联邦法律。但是，即便是在左派占优的国家杜马，当时也没有接受俄共的提议，因为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和认知模糊。自由派是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把食物安全定义为食物数量充足和食物的可获得性，食物安全即在一个地方，所有的人民，所有的时刻，都有充足的经济能力获得足够数量的食物（维持健康生命所需的数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进口食品是可以接受的。这也符合进口商和地方官员（他们担心食品缺乏引发动乱）的利益。该立场得到了为俄罗斯政府做顾问的国际组织专家的支持。与此相反的是保护主义的政策立场，认为食物安全就是自给自足，就是国家在食物供应上的独立。这种立场符合俄罗斯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他们呼吁政府支持和保护国内农业，抵御进口食品，这也是俄共对食物安全的理解和解释。当时国家杜马的议员很清楚，即便俄共的提案能在杜马通过，也会被叶利钦总统否决。

普京主政以后，那些自称是“国家主义者”的政治力量，再次希望国家杜马通过食物安全法律。但是他们的努力无果而终：在普京的第一任期，虽然有明显的帝国倾向，但是仍然偏好于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推动国家发展。而食物安全议题作为共产党反对派的名片，是不能让其得势的。但是情况在变化。随着俄罗斯农工综合体的发展，民众爱国主义情绪的上升，关注食品市场无疑会给统治精英带来政治红利。此外，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的继任者，此时正准备把总统宝座还给普京，他当然希望在自己仅存的任期内扩大工作成就的清单。食物安全法规若是能在他手下通过，无疑会提高其政治形象。

因此，2010 年 1 月，梅德韦杰夫以总统令的方式，签署了“食物安全构想”。^①对于梅德韦杰夫总统而言，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其本身的实际意义不容忽视，因为这是第一次在总统的层级上规定，进口重要食品品种，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俄罗斯大大远离了全球主义者的

^① Доктрин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Доктрин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 февраля 2010 г. http://state.kremlin.ru/security_council/6752

话语体系，以总统令的形式把食品安全等同于不进口食物，等同于关键食物品种的自给自足。^①

根据该构想，到 2020 年前，俄罗斯国产食品在本国市场的份额：粮食，不低于 95%；糖，不低于 80%；植物油，不低于 80%；肉和肉类制品，不低于 85%；奶和奶制品，不低于 90%；鱼产品，不低于 80%；马铃薯，不低于 95%；食用盐，不低于 85%。构想不仅提及了数量指标，也对质量和居民对食品的可获得性等，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都不是实质性的内容。对俄罗斯国家农业政策有真正影响的，是自给自足这个目标。

食品安全构想中的理念在俄罗斯民众的宣传普及，是按照一个非常简单化的话语框架进行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食品出口国，一类是食品进口国；俄罗斯必须摆脱食品进口国的身份标签，最终成为一个荣耀的食品出口国。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并不清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如此简单划分，而是多元化的。比如说美国，它不仅是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也是一个主要的食品进口国；而且美国还经常出口又进口同类的食品。一些专家试图解释如何来衡量食物安全。他们认为，不应该用进口食品占国内市场的份额（食品安全构想中如此定义）来衡量，而应该用国内总产量（加上出口的部分）占总消费量的比例来评估。依此标准，俄罗斯食品安全根本无须担忧。^②但这种观点只为少数的专家所理解和接受。对公众而言，一个简单却根深蒂固的认知就是：商店里有太多的进口食品，绝对是一件坏事。

面对进口产品，俄罗斯国内农产品并没有价格优势，特别是当卢布强势的时候，但是可以通过非透明的措施限制进口。首先，俄罗斯国产食品被宣传为“生态清洁”，与“污秽肮脏”的进口食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之际，这类宣传十分有效。俄罗斯人很容易相信我们的肉要比进口的肉好，但是却很难相信我们制造的汽车或者计算机比国外的好。其次，行政当局根据各职能部门对进口食品质量的投诉，加大对国内市场的保护。

① S. Wegren, "Russia's Food Policies and Foreign Policy",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 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0, Vol.18, №.3, pp.189-207.

② Шагайда Н, Узун 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оценк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5. №.5. С.63-78.

与进口食品相关的职能部门众多，如：海关，消费监督部门^①，农业监督部门^②，以及其他部门等。2010年1月生效的限制美国鸡肉进口的禁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官方的说法是俄罗斯禁止氯洗鸡肉（苏联时期的养殖场也是这么做的）。问题是当俄罗斯国内鸡肉短缺的时候，就能够忍受也需要美国的氯洗鸡肉。而随着“发展农工综合体”计划的执行，俄罗斯鸡肉产量大增的时候，廉价的美国鸡肉就成了障碍。俄罗斯的禁令持续了8个月，直至美国用尽了所有的施压方式，并最终改变工艺放弃使用氯气消毒处理鸡肉。

当与某个食品出口国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俄罗斯方面往往会采取措施，限制该国“低质量”的食品进口。例如，在波兰政治家发表针对俄罗斯的尖锐言论之后，俄罗斯方面以卫生和流行病为由，限制从波兰进口一系列的食品。与卢卡申科的分歧，最终演变成与白俄罗斯的“牛奶战争”，当时白俄罗斯数百种奶制品被禁止出口到俄罗斯。虽然俄罗斯官方不承认针对食品进口限制的背后有政治因素，但是二者的关联是如此明显，以致普通民众都能清楚地意识到。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民众还是业界，都认为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遥遥无期。特别是普京总统还说过，俄罗斯对全球经济融入不深，反而把俄罗斯从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2009年2月，在与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会晤时，普京的一段话成了俄罗斯的流程语：“我们全力以赴要加入世贸组织，还好你们没让我们进去。”此时的农业生产者不再担心加入世贸的问题了，他们深信国家会长期保护农业。事实证明，他们过于乐观了。

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农业生产者的回应

2012年，俄罗斯政策中的自由主义态势复苏，克里姆林宫的钟摆朝着自由主义方向移动。联邦职能部门加紧了俄罗斯的入世谈判。对于这些变化，农业界是最大的反对力量（在农业领域，可能只有粮食出口商保持镇定，因

① Роспотребнадзор

② Россельхознадзор

为其利益不受俄罗斯加入世贸的影响)。农业生产者摆出的理由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的承诺和义务,对于国家的食品安全是一个威胁。农业界坚持认为,在加入世贸和国家食品安全的问题上,只能二选一。实际上,不久前通过的“2013-2020年农业发展国家规划”^①,其初始目的之一,仍是要完成在食品安全构想中设定的指标(即,进口替代)。但如今被要求退回修订,以适应俄罗斯加入世贸后应履行的准则。

农业生产者强力抵抗。他们能预见到一系列的威胁:进口关税降低,国家对农业生产者补贴减少,利用卫生规范限制食品进口的机会不多。^②加入世贸被他们解释为国家背叛行为,可能导致民族农业的瓦解,影响国民的健康。农机制造业发起了公开抵制,领导了一个“叫停世贸”(Стоп-ВТО)^③的运动,并成立了一个“世贸信息”(ВТО-Информ)^④分析中心,用“爱国主义专家鉴定”来分析俄罗斯加入世贸的利弊。他们甚至试图发动一次全民公投,但是被中央选举委员会拒绝了。农业集团自认其行动不仅是为了本行业的利益,更是为了国家的经济福祉。

简言之,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的一方不提食品安全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给自足的食物安全概念偏离了自由主义路线。而反对的一方则咬定食品安全,强调俄罗斯加入世贸必然危及己身。从民意来看,根据俄罗斯公众民意研究中心(ВЦИОМ)2012年夏的调查数据,加入世贸的支持者数量只是非常微弱地多于反对者(分别为30%和25%)。而在十年之前,当时是自由主义的兴盛时期,一半多的民众(56%)支持加入世贸,反对者只占17%。^⑤

不是所有的农业团体都加入到了反对者的行列。有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选择与政府官员进行秘密谈判,就具体问题讨价还价。也就是说,很多农业企业、农业协会,并不公开批评俄罗斯加入世贸,而是就本行业、本领域的利益游说政府部门。他们把自己定位于“建设性的批评者”,其立场是:保

①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на 2013-2020 гг.

② Барсукова С.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России к ВТО: неизбежные потери и возможные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для агробизнеса// 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2013. №3. С.76-81.

③ <http://stop-vto.ru/>

④ www.wto-inform.ru

⑤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ЦИОМ: мнения россиян о Всемирной торгов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Центр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2012. <http://gtmarket.ru/news/2012/08/27/4916>

护主义从原则上看，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农业领域）的情况是一个例外，需要加以保护。行政当局坚决挡回了这样的诉求，并使其明白，俄罗斯融入国际一体化的路线不容讨论。农业生产者终于意识到，在大的政治游戏中，自身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比如，养猪行业曾经是“发展农工综合体”国家规划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也被寄望为俄罗斯农业的发动机，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既定事实：生猪进口关税从40%降到5%，冷冻猪肉配额内进口关税降为0。业界认为这是背叛，因为此前的经济政策不是这样，当时的政策很明显，是支持本国农业。

克里姆林宫政策急剧地、出乎意料地转向自由主义，也引发了立法部门的反对。入世议定书完全是因为统一俄罗斯党才得到批准。其余的杜马党团（公正俄罗斯、俄共和自由民主党）几乎一致地投了反对票。俄罗斯18年马拉松式的入世谈判，险些在议会中功亏一篑：238票赞同，209票反对。

即便有农业集团的反对，俄罗斯还是于2012年8月加入了世贸组织。“食物安全”这个术语，再次沦为反对派的口号，彻底淡出了政府官员和亲政府政治家的词汇表。“食物安全”以梅德韦杰夫的另一个不成功政策的身份，被收录在了俄罗斯的历史档案之中。但尘封不久，就被翻案。

进口替代政策：食物安全思想的新生

乌克兰事件以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引发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和贸易制裁。2014年8月，俄罗斯政府做出回应，宣布实行进口替代政策^①，限制一系列欧美农产品进口。食物安全不仅重返官方话语之中，更成了俄罗斯国内政策的核心方向。曾被世贸规范伤害到自身利益的俄罗斯农业生产者，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再一次，俄罗斯的农业政策，成为政治形势的衍生物。

政府再次关注农业政策，与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卢布大幅走低对于食品进口到俄罗斯国内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些与俄罗斯关系友好国家的食品，也是如此。其次，由于俄罗斯有着相当丰富的淡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以

① Импортзамещение

及对于食品的刚性需求（即便收入下降，也要购买），农业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执行进口替代政策的领域。第三，石油市场的不景气，迫使俄罗斯寻求新的出口品种。农产品被寄予厚望，是有根据的：在俄罗斯的出口结构中，食品和农产品所占的比例，从2000年的1.6%，提高到2014年的3.8%，达到190亿美元，超过了武器出口额。如今，在小麦、大麦、玉米、植物油、鱼和其他农产品方面，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净出口国”了。同期，在俄罗斯的进口结构中，食品和农产品所占的比例，从21.8%降到了13.9%。^①

在食品市场上的进口替代政策，得到了相当多民众的支持：约70%的俄罗斯人对禁止欧美食品进口持积极态度。^②这是非常矛盾的现象，因为进口替代政策对普通民众的消极影响很明显：消费选项减少，产品价格上升，质量下降。食品质量下降与食品生产的低端转向有关，也与想用同样的原料生产出更多食品的企图（以此占领进口食品的空缺）有关。比如，由于牛奶短缺，目前，俄罗斯70%的奶酪中含有植物脂肪成分，这属于食品掺假行为。联邦消费监督机构^③经常能查到类似的违规做法，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予以制止。因为行政当局明白，在目前的情况下，除了掺假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实现进口替代政策。

俄罗斯民众对进口替代政策的支持，与俄罗斯国内的意识形态氛围密切相关。亲政府的媒体试图营造一幅画面：一个团结的民族，为保护国家的利益，预备好了承受艰难。这幅图景隐含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与俄罗斯敌对的世界。对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压倒性多数的俄罗斯人（近70%）选择的答案是：他们为了削弱和羞辱俄罗斯。^④但是媒体不讨论消费者的代价问题，因为爱国主义就意味着自愿牺牲。农业集团巧妙地运用俄罗斯人的爱国感情，抗议西方试图让俄罗斯失去大国地位。这种情绪可以称之为“怀旧复仇主义”。^⑤目前，在俄罗斯，一种被青睐的食品营销方式，是“苏联化”。即，在食品的名称、包装和广告中，往往会有对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Росстат, 2015. С.632-633.http://www.gks.ru/free_doc/doc_2015/year/ejegod-15.pdf

②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2015. М.: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6. С.241.

③ Роспотребнадзор

④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 2015. М.: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6. С.238.

⑤ Nostalgic Revanchism

苏联因素的指向。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

在财政预算吃紧的情况下，还要加速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迫使政府选择农业作为优先的政策方向。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私人农场没有取得理想的发展成效，俄罗斯政府转而重点关注和依托大型和超大型的农业企业。大型农业企业许诺，可以确保农业生产高速增长。但现在的局面不能与 1998 年的情况类比。当时卢布暴跌的背景是，较高的失业率和低产能利用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低，农业投资积极性高。而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同，农业需要大量的政府投资才能加速发展。

俄罗斯政府的政策选择，对大型的农业控股公司（аgroхолдинги）有利。这类企业复制了苏联集体农场的模式，但却是俄罗斯大地主、大资本主义的版本，这是一种融合了企业官僚与行业规范的庞然大物。农业控股公司发端于 1998 年金融危机之际，并迅速控制了庞大的资源：根据 2006 年的全俄农业普查数据，农业控股公司数量仅占农业企业总数的 0.113%，却控制着 81.5% 的耕地，48% 的牛，47% 的猪和 63% 的鸡。^①是俄罗斯制度环境的特点，造就了农业控股公司如此庞大的规模。对合同法规的执行和保护力度薄弱，使得企业会最大限度地自保和自给。这虽然对企业会有巨大的行政负担和成本，但是可以保护自己相对独立于无效的仲裁。企业横向与纵向结构的一体化（控股公司的形式），是对俄罗斯制度环境质量的一种补偿式回应。

2014 年，俄罗斯三家最大的农业控股公司（“Мираторг”、“Черкизово”和“Рысарпо”）的净利润近 500 亿卢布。^②政府愿意与这样规模的企业进行对话，并为他们提供重要的支持。农业控股公司成为国家农业政策的主要获益者，同时也是强大和积极的游说者，因为这些公司的业务，对食品市场的行情极端敏感。此外，大多数农业控股公司都与市政和地区行政部门关系紧密，这进一步加强了其游说的效率。政府承担了“火车头”的角色，没有它什么都玩不转，政府也由此成了此种选择的人质（被农业控股绑架）。农业

① I. Davydova, J. Franks, “The Rise and Rise of Large Farms: Why Agroholdings Dominate Russia’s Agricultural Sector”, *Mir Rossii*, 2015, №.3, pp.133-159.

② 根据《ТОП-20 крупнейших агрохолдингов России по выручке за 2014 год》(10 Августа 2015 г.)的数据计算得出，http://milknews.ru/analitika-rinka-moloka/reitingi/krupneishie_agroholdingi_rossii.html?template=115

控股被非正式地称为“寡头农场”（олигархоз），并非无故。这个称呼实际上是综合了“寡头”和“苏联集体农场”两个含义。^①

如果说在“发展农工综合体（2006-2007年）”的国家优先计划中，政府当时还支持私人农场、家庭副业和农业合作社的话，那么现在这些都被遗忘了。即便私人农场的产出占农业总产值的10%，还是被撇在了农业政策的边缘位置。政府已经没有兴趣把私人农场当作经济增长点了。私人农场在政府政策中的位置，是保持农村发展，防止农村地区荒漠化。而世界的经验表明，即便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农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小型的家庭农场在欧美农业的所有制结构中，仍占绝对的优势。就俄罗斯而言，截至2016年1月1日，全国仅剩余21.5万家私人农场。

家庭副业的农业产出占俄罗斯农业总产出的比例相当高（40%左右），但也与私人农场一样，成了被忘却的对象。家庭副业通常被教条地批评为“返古现象”，诚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家庭副业的生产效率是低下的。但是随着危机加重，家庭副业的活力注定会上升，因为这是一条生存之路。政府和老百姓各自解决自己的问题，彼此没有交集。从事家庭副业的人，从来不谋求在公众场合发出声音或者游说什么。他们有意识地保持低调，遮掩经营规模，避免被政府关注，因为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引来麻烦。要想使家庭副业的生产商品化，需要为他们参与到农产品市场创造制度上的便利（如，通过农业合作社，或者与大型农业企业签约等等）。

培育多层次、多种经营方式的农业经济耗时耗力，因此，政府没有走这条制度化建设的道路，而是选择利用现有的预算资源，“手动”管理农业发展进程。政府部门希望通过为大型农业企业提供强大的激励措施，来弥补失去的十年（高油价的岁月）。各级官员都希望在卸任之前，能够汇报农业经济上的成就。在这种官僚逻辑之下，依托大规模投资项目，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政府反复磨练的本领，是如何与一小撮食品市场上的大型玩家谈判，而不是为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制度空间。

^① Никулин А. Олигархоз как преемник постколхоз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 2010. Т.11. №.1. С.17-34.

结论与谏言

——农业政策需要非政治化和务实主义

俄罗斯农业政策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一贯的、长期的发展计划。政治环境的周期变化——时而偏向自由改革主义，时而偏向国家保守主义，都直接影响并反映在农业政策之中，致使农业政策缺乏稳定性。往往是，前一个阶段的努力，被后一步的做法勾销。比如，对私人农场的大规模支持让位于对超大型农业控股公司的青睐，食品市场开放让位于保护主义，这些变化的背后原因，是政治环境和话语转向了国家安全。国际局势的变化、俄罗斯内部政策的变动、以及选举周期的需要，都会影响农业政策。俄罗斯农业政策已然成为一个随着政治之风而动的风向标。农业利益集团乘机随潮而上，尽可能利用政策机遇，实行短期战略，上马快速回收项目。这都是与农业经济的本质相背离的：农业是最具发展惯性的一个行业。短期行为会造成长期后果，包括生态问题。

因此，为了农业领域的发展，必须保障该领域稳定的游戏规则和优先方向，必须使农业政策回归到非政治化和务实主义的范畴。重要的是，要进行长期的制度建设，形成一个能够涵盖多样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制度框架。依托少数几个巨型农业企业、快速发展农业的急功近利的幻想，需要放下。否则只会助长这些大企业更加积极地游说，榨取政府资源。健康合理的农业经济，需要多元化的生产方式。对于农业控股公司而言，其未来发展方向应该集中于那些有“规模效应”的领域，如：粮食、油籽，牛、鸡和猪的养殖；其产品应该主要面向出口。而俄罗斯国内市场，可以由私人农场和中小型的农业企业的农产品来填补。对私人农场的支持，需要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考虑到比较优势、劳动分工等因素，特别是要给予一些具有民俗生产性质的私人农场以支持，但也不局限于此。

需要遏制农业集团的游说，进口替代政策对于他们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会一直鼓吹。经济史的一个教训是，只有对那些有全球竞争潜力的行业，在初始的发展阶段，给予其保护支持，这样的保护主义才能是有效和有益的。保护主义不能普遍化、持久化，只能是有针对性的和暂时性的。

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居民实际收入减少，政府应该调整对农民的资助结构和方式。目前的模式，是通过补贴贷款的机制来运作的。实际上，政府资源主要是流向了金融部门。这种模式需要改变。对消费者进行食品补贴，俄罗斯几乎没有用过，其实可以作为替代选项，这种补贴方式，还能够刺激需求。为此，需要调整俄罗斯社会政策的原则，从对整个社会群体的补贴（如所有的退休员工，所有的多子女家庭），转到对低收入家庭的特定的、有选择性的补贴。显然，应该同时加强税收纪律，否则那些赚取“影子”收入的家庭，也可能被划到低收入的行列。当前，如果引入“食品券”制度，无疑会受苏联时期凭票供应记忆的影响。需要通过媒体宣传，消除二者之间的关联，同时介绍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实际上就是利用不同的途径，帮助困难家庭获得食品。

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俄罗斯有责任严格限制对农民的补贴。因此，政府未来的补贴，应该避免采取那些可能会“扭曲市场”的黄箱政策。有很多世贸规则不限制的措施，可以充分利用，来推动农业生产。比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粮仓等），振兴育种和基因科研机构，发展高质量的农业教学，完善农村地区的道路建设，更新养殖场以消除环境威胁，等等。

重要的是，要避免爱国主义情绪的进一步升级（应对“敌国的阴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起来反对进口替代政策对消费者的负面影响，那是因为爱国主义因素还处于上升阶段。电视等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冰箱与电视机”之间对决的结果，可能会发生变化：实在产品的重要性，将胜过视觉产品的虚拟性。情绪过热能引发钟摆效应：从对政府的热情支持，变为激烈反对，那将是一场社会灾难。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爱国主义膨胀，但随后消失，结果是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政权。爱国炒作可以作为一时的经济手段，但不能作为长期农业政策的基础。

最后，为了形成一个长期的农业政策，我们需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该政策的目的是什么：（1）使俄罗斯可以独立于国际市场，自给自足，最大限度地减少进口？还是，（2）加大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做国际食品市场上的一个关键角色？显然，这两个战略目标不是相互排斥的。但这是两

个不同的战略，也会包含着不同的实施措施。有人认为，可以先解决食品自给自足这个目标，然后再实现出口的目标，这种观念是错误和有害的。如果从一开始就确定好发展目标，就可以省去从一种战略转向另一种战略所耗费的成本。

如果选择第一个战略目标，意味着整个政策的设定，是为了在国内市场上保护俄罗斯的生产者，也自然会在外国企业使用土地资源方面设置歧视性障碍。选择这个目标，不需要变更农业部目前的权限。

而第二个以出口导向为目标的战略，显然更有前景。但是为此需要大幅调整目前的农业政策：鼓励和推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土地使用机制、建设世界级的科研教育和人才培训中心（包括雇佣外国专家）等。在此战略目标之下，农业技术与工艺的发展是优先，而不在意其来源是俄罗斯的，还是国外的。

完善俄罗斯的土地法，无疑，第一步需要把俄联邦土地资源的注册、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集中归口到联邦土地管理部门。然后由该管理部门完成对所有土地的地籍登记，即，划定地块间的边界，并把这些信息录入到国家不动产地籍信息系统之中。现在的实际情况是，80%的农业土地没有登记到这个信息系统中（即，没有确定的边界），进而阻碍了土地市场交易和土地流转。同样要紧的是，让地块的地籍价值接近其市场价值。目前的价值确定程序，是由俄联邦经济发展部制定的，其确定地籍价值时运用的是“以收入定价值”的方法，即根据土地面积和土壤质量，来估算在其上从事农业生产的潜在回报。这种估价方法应该补充进来其他一些要素，比如，基础设施情况，土地的现状，当地市场的状况，等等。这样，才能使地籍价值接近市场价值。经过如此的调整之后，就可以依靠地籍价值，更准确地计算土地税（特别是在没有大规模土地交易作为参照指标的情况下）。

在推动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方面，需要建立信息和咨询服务中心，帮助寻找销售市场，以及提供产品认证。国家应该扶持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因为这有助于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如果俄罗斯要大规模地走进全球食品市场，就需要取消对生产转基因食品的国内法规禁令，需要加强在基因工程领域的研发，同时要使俄罗斯的卫生标准与国际标准协调对接。为此，农业部的权限

需要扩展，建立附属的专业机构，用以支持出口和加速推动技术创新。诚然，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随着本国生产者地位的不断巩固，俄罗斯国内市场应该逐步放开。 (翻译 肖辉忠)

【Abstract】 Russian state agricultural policy evolves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e in the general political line from the radical liberalism of the 1990s to state patronage and active suppor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oday. The privatization of land and the creation of private farms, the National Priority Project Development of the Agro-Industrial Complex, the adoption of Russia's Food Security Doctrine, Russi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import substitution in response to Western sanctions are considered as stages of this policy, through which both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ve could be observed. 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Russian agricultural policy is inconsistent because of its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as determined by foreign policy collis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s internal development model.

【Key Words】 Russian Agricultural Policy, Russian Import Substitution, Russian Food Markets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эволю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мены общ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от радикально-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1990-х гг. д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атронажа и актив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аграрной сферы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качестве её этапов рассмотрены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земель и создание фермерства, приоритет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ект “Развитие АПК”, принятие Доктрин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ступление РФ в ВТО,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 как ответ на санкции Запада. Делается вывод о не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следствие сильной привязк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контексту, определяемому как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коллизиями, так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е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苏联赶超型的核工业发展政策 ——以乌拉尔地区为例*

张广翔 张文华**

【内容提要】在美国核威慑的刺激下，苏联迅速全面启动核计划，采取赶超型的发展方针，在短期内把当时国内最具有科技潜力的资源和人才集中在核工业发展领域。乌拉尔地区因其地缘、自然资源、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等优势，迅速发展成为核工业中心。苏联时期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8月到1949年8月是起步阶段，主要任务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生产核材料；1949年9月到50年代中期是完善阶段，核武器综合体初具雏形；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成熟阶段，核武器综合体发展完善，成为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核工业通过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到多元的突破，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在与美国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战略制衡的政治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经过转型和重组，走出了困境，焕发了活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引发了世人对苏联核工业的负面评价。横向来看，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的过程中，军事和政治目标也高于道德和生态要求。

【关键词】美苏关系 乌拉尔地区 苏联核工业 俄罗斯核工业

【中图分类号】D87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5-0097(4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苏联核计划档案文献资料翻译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 15ZDB064)、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苏联核计划中的核保密城市研究》(项目批准号: 2017086)的阶段性成果。

** 张广翔,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张文华,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核武器自诞生以来就是影响美苏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核垄断优势迫使苏联采取赶超型的发展方针，不计成本地建设和壮大本国的核工业。而苏联核工业的壮大又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军备竞赛，苏联核工业就是在美苏之间不断博弈中发展壮大。虽然苏联解体，但继承了苏联主要核遗产的俄罗斯，仍旧拥有世界领先的核工业，在世界核工业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时期由于政治原因，有关核工业的资料都是保密的，相关研究也是严格禁止的。这一时期的有关著作^①大都是核计划的参与者撰写，仅在核工业部门内部发行。苏联解体之后，相关著作批量涌现，著述者不仅有核计划的参与者，还有历史学家，政府也开始组织整理、筛选相关历史档案，并出版历史资料集。^②遗憾的是，官方在筛选档案文献进行出版时，仍规避了大量重要的、总结性的文献，导致一些关键性数据仍旧“悬而未决”。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资料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必要的实证材料，使之进入了新的研究阶段。随着官方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史学界掀起了研究核计划的热潮。首先，出现了一批依据最新解密档案探究核工业发展历程的著作。^③其次，乌拉尔地区、伏尔加河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作为核计划实施的重要基地，成为历史学家研究区域性核工业发展的对象。乌拉尔地区的研究侧重于核工

① Асташенков П.Т. Курчатов.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7; Головин Н.И. И.В. Курчатов. М., Атомиздат, 1967; Чернышев В. А.Ванников.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9; Петросьянц А. М. и др.(Ред.) Академик Лев Андреевич Арцимович.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Знание, 1975; Снегов С.А. Творцы. М.,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79; Сивинцев Ю.В. Курчатов И.В. и ядер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М.,Атомиздат, 1980; Чалмаев В.А. Мальшев. 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1; Елфимов М.И. Маршал индустрии: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о А.П. Завенягине. Челябинск., 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2.

② Рябев Л.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 . 1938-1945, Часть 1-2. М.,Наука, Физматлит;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ФТИ , 1998, 2002; Рябев Л.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1-7.Саров, РФЯЦ-ВНИИЭФ; М., Наука, Физматлит, 1999, 2000, 2002, 2003, 2005, 2006, 2007; Рябев Л.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III. Водород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6, Книга 1-3.М.,Наука, Физматлит , 2008, 2009, 2010;Пелипенко А.Д.(отв. сост.)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в СССР 1946-1953 годы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Т.1-8.Саров (Арзамас-16), 1999-2001.

③ Негин Е.А, Голесова Л.П, Куличков Г.Д. и др.Советский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Конец атом. монополии.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Саров., РФЯЦ-ВНИИЭФ, 2000; Андрияшин И.А, Чернышев А.К, Юдин Ю.А. Укрощение ядра: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и ядер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СССР. Саров.,Красный Октябрь, 2003; Завалишин Ю. Создание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ядерных боеприпасов. Саров., Красный Октябрь, 2007.

业发展状况，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①伏尔加河地区的研究侧重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结构设计方面的内容；^②西伯利亚地区的研究则侧重于核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史，并致力于评价西伯利亚地区核工业在巩固国防中的作用。^③再次，核工业所在的核保密城市^④成为地方志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⑤最后，核工业史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①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Создание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Урале. Челябинск, Урал. Акад., 1999;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Толстикова В.С. Тайны «сороковки». Екб., ИПШ «Ураль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95;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Толстикова В.С. Атомный след на Урале. Челябинск., Рифей, 1997;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Толстикова В.С, Клепиков А.И. История 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Челябинск., НИК, 1998; Кузнецов В.Н. Закрытые города Ура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Екб., Полиграфист, 2008; Кузнецов В.Н. История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на Урале: очерки и статьи. Екб., Автограф, 2009; Кузнецов В.Н. Атомные закрыты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Урал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Ч.1-2. Екб., Бан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2015, 2016.

② Власова Е.Ю.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закрытого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центр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40-х - середина 50-х гг. XX века).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ННГАСУ, 2011.

③ Савицкий И.М. Вклад Оборон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ибири в создание ракетно-космической техни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6-1965 гг.)//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2008. №.2. С.106-110; Савицкий И.М. Создание 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для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Сибир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2010. №.1. С.72-75; Савицкий И.М. Создание сырьевой базы для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1946-1965 гг.)//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2011. №.1. С.54-58; Реут Г.А. Ведомственные населенные пункт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реднего 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я СССР в Сибири (1949-1991 гг.). Красноярск., КрасГАУ, 2014.

④ 保密城市是冷战的产物，目前俄罗斯联邦共有 45 座保密城市，它们位于 22 个政治实体内，人口约 134.5 万。其中，核工业基地 10 座、军港基地 10 座、战略火箭军基地 14 座、航空航天防御基地 3 座、生化武器研发基地 2 座，军事通讯和新武器研发基地 6 座，分别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国防部和航空部。笔者把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生产核材料和核武器、研发核武器的保密城市称之为核保密城市。目前核保密城市有 10 座，其中有 5 座分布在乌拉尔地区，位于这 5 座核保密城市内的核工厂和科研机构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См.: Нарыков Д.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созд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Закрытых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 Мир науки, культур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2. №.1. С.54-58.

⑤ Агапов А.А. Саров: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Новгород-Саров-Саранск., Тип. «Красный Октябрь», 2000; Ильяев Р.И. (гл. ред.) Ядерный центр России-Саров. М., РФЯЦ-ВНИИТФ, 2000; Кочарянц С.Г, Горин Н.Н. КБ-11(Арзамас-16): Несколько страниц истории создания атомного центра. Арзамас-16, ВНИИЭФ, 1992; Матюшкин В.Ф.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Арзамас-16.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7; Киреев А.П. (гл. ред.)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города Заречного. Заречный, Заречная город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2008; Алексеев В.В, Рыкованов Г.Н.(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е города Урала. Город Снежинс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кб., Бан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2009; Алексеев В.В, Рыкованов Г.Н.(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е города Урала. Город Лес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Екб., Банк

历史生态学，即研究核工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①得益于官方档案的解密和公布，俄罗斯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众多，但仍存在技术史叙述偏多等不足。

近年来，随着苏联核计划的相关档案文献陆续解密，国内史学界也开始以解密的档案为依据，分析核计划实施的原因、过程和影响。^②其中张泽宇于2017发表的论文梳理了1945-1953年核工业各部门的发展情况。^③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苏联时期核工业的研究力度不够，仍以介绍性为主，遗留了很多问题，为本文写作留有空间。

本文以俄罗斯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论著为文献基础，旨在阐明苏联核工业为了实现赶超型发展所采取的政治、经济、财政和人才措施，动用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而揭示核工业的运行与国家行政命令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乌拉尔地区为例，具体阐释核工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发展。在上述基础上，客观评价苏联核工业发展的得失。

一、苏联核计划的出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来说无疑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损失，数千个居民点、数以万计的工厂企业变成了废墟，丧失了约2500万人的生命，损失了苏联被占领区可再生财富的三分之二和整个苏联可再生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2012; Логинов Н.В. История города лесного: Эпоха и люди. Екб., Изд.Академ книга, 2000; Реут. Г.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г. Железногорска (Красноярск-26) закрыт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1950-1991 гг. Красноярск., КрасГАУ, 2002.

① Толстиков.В.С.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Урал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Челябинск., ЧелГУ, 1999; Толстиков В.С., Кузнецов В.Н. Яде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на Урал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ценк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Екб., Бан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2017.

② 刘玉宝、张广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始末”，《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5期；刘玉宝、张广翔：“国外核情报与苏联原子弹的研制”，《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张泽宇：“苏联核工程的决策管理系统叙论（1945-1955）”，《战略决策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张泽宇：“苏联核工业体系创建述论”，《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

财富的四分之一多，在二战中苏联损失的物质财富约占欧洲参战国全部损失的一半。^①在这种背景下，战后苏联的首要任务应是修复战争创伤，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广岛事件让斯大林见识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意识到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意义。因此，他做出了一项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全相悖的决议，即把核计划当作国家发展的一号计划，集中一切资源用于研制核武器。

（一）核计划的出台

广岛事件之后，斯大林拒绝了科学家П.Л·卡皮查（Капица）“寻找省钱的途径研制原子弹”的建议，迅速全面启动核计划。1945年8月20日，国防委员会通过第9887cc/on号决议^②，组建了一个由贝利亚领导的专门委员会，全权负责与铀问题相关的一切工作，标志着苏联核计划全面启动，也标志着苏联核工业的诞生。从此，核计划成为国家发展的“一号计划”。鉴于美国已经在核武器领域抢占先机，苏联核工业的发展担负着赶超的任务。面对这种形势，苏联国家领导人提出“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集中所有的资源，不惜一切代价，以最短的时间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研制出核武器，并为此建造了一系列配套的、庞大的、造价高昂的核工业基础设施，努力在核工业发展领域赶超美国。

在核计划全面启动之前，苏联核工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1942-1945年核计划的准备阶段，基本上完成了核工业发展初期所必需的金属铀、重水等原材料的储备。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如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导致核工业发展的资金紧张、劳动力资源和技术人才不足；核工业生产的技术几乎没有掌握，所需要的精密仪器设备缺少，苏联暂时无法克服在二战期间与美国在核科技领域形成的差距，等等。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措施，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为核工业发展创造一切必须条件。

为了摆脱核工业发展的困境，实现赶超型发展，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建

①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八版），杨焱、卿文辉、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3-524页。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1.Саров., РФЯЦ-ВНИИЭФ, 1999. С.11-14.

立一套特殊而有效的**核工业管理体制**。在核计划的准备阶段，国防委员会全面负责管理铀问题，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协助。但是这一管理体制没有取得特殊的成绩，因此，第 9887cc/on号决议决定建立跨部门的核工业管理机构，在国防委员会之下建专门委员会^①以及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第一管理总局，负责核计划的相关工作。专门委员会主席是贝利亚，他是核计划领域除了斯大林之外的一号人物，主管核情报的收集工作；Г.М·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负责党政和干部问题；Н.А·沃兹涅先斯基（Вознесенский）负责提供经济保障；Б.Л·万尼科夫（Ванников）负责核工业企业的相关问题；А.П·扎维尼亚金（Завенягин）负责核工程建设的工作；М.Г·别尔乌辛（Первухин）负责各部门的协调工作；И.В·库尔恰托夫（Курчатов）是核计划的首席学术领导。他们分别是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精英，拥有特命全权，可以从国家任何部门征用一切物力和人力资源。

为了解决核工业运行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还建立了完善的**科研机构**。根据第 9887cc/on号决议，在专门委员会之下设立技术委员会，12月10日又成立了工程技术委员会。1946年4月9日，两个委员会合并为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五个分委员会：分别负责石墨和重水反应堆、气体扩散法分离同位素铀、电磁法和离心法分离同位素铀、化学冶金和劳动保护有关的问题。政府还动员全国所有的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参与、协助攻克技术难题。成立第二实验室作为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中心，成立第 11 设计院作为核武器的设计中心。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专门委员会又批准了 20 个科研单位参与同位素分离法、核裂变材料属性和核反应堆生产工艺等问题的技术攻关。之后，不断有更多已有的和新建的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所及部委和企业下属的科研机构，参与到专项研究和设计中来。截至 1949 年 8 月 29 日，先后有 112 家科学研究机构、2100 名科学工作者参与。^②

为了保障核工业发展有足够的资金，实行了特殊的**财政制度**。根据第

① 1945 年 8 月 20 日，专门委员会隶属于国防委员会；1945 年 9 月 4 日，国防委员会被撤销，专门委员会转属于人民委员会，1946 年 3 月人民委员会更名为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隶属于部长会议。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аров., РФЯЦ-ВНИИЭФ, М., ФИЗМАТЛИТ, 2005. С.675.

9887cc/on号决议，制定了一项特殊且秘密的财政拨款制度，国家财政预算中专设“国防委员会特殊经费”一项。只有专门委员会有权确定第一管理总局所需经费拨款数额、劳动力总数以及物资技术总量。国家计划委员会须以“国防委员会特殊经费”的名义，将这部分支出列入分配收支平衡表中，无需在财政部门登记留底。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在没有国防委员会特别允许的情况下，都无权干涉第一管理总局及其下属各企事业单位所开展的各项工作。^①核工程的各项支出在国家经济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管之外，这引起其他部门的不满。部长会议下属的武装力量拨款管理局^②在1946-1947年的工作报告中，就对第一管理总局不受监督的拨款怨声连连，因为第一管理总局没有向财政部递交结算单和财务报表。为此，1948年3月财政部组建了由部长亲自领导的专项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政府划拨给第一管理总局和执行特殊作业任务部委的拨款，并监管资金支出。以核工程的基建资金为例，该项资金实报实销，无须事先批准草案和预算。在1943-1945年核计划的准备阶段，负责核工程建设的内务人民委员会^③工业建设管理总局的基建资金仅2000万卢布，而核计划全面展开之后，仅1946年就达16亿卢布。^④1946-1950年间达81.38亿卢布，其中1950年是24.16亿卢布。^⑤除了基建资金之外还有生产设备费、工资等，在财政部的协助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核工业发展所需的各项资金。

（二）核计划的总动员

1. 物力资源

为了发展核工业，可以“征用”任何资源、任何企业和任何区域。为了加速实施核计划，在既有的生产单位内，包括停工和正在施工的企业内，进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1. С.11-14.

② 该局协同第一管理总局其它部门共同对苏联科学院特别实验室进行监管。

③ 根据1946年3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大会决议，把人民委员会改为部。据此决议，内务人民委员会改组为内务部，1947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决议把内务部队从内务部中分离转属于国家安全部（КГБ）。

④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Создание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Урале . С.412.

⑤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673.

行大批量核生产作业。在核工业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用从地方当局征用大量土地的做法，将国有农场的土地征为国家储备用地，在这些地区建立保密区，将本地政治资格审查不合格的居民迁往别地。由于征用国有土地和集体农庄土地，核工程的占地面积日益扩大。为了保密，保密区周边由内务部队（自1948年4月开始是国家安全部队）警卫。

为了保障核工业发展所需的设备和仪器，解决本国**设备和仪器**严重短缺的难题，加强了精密仪器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工作。部长会议责成航空工业部、通信器材工业部、机器和仪器制造部、军械部、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等部门及其下属国防企业为核工业制造和生产设备与仪器，截至1949年8月29日，军械部92厂和运输机械制造部下属工厂共生产了1.065万台各种型号的扩散机；硬质合金公司生产了1320万个扁平滤光片、40万个滤管；第一管理总局第12厂生产了100万个滤管；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生产气体扩散机所需的专门轴承8万个；机械和仪器制造部生产了1500台化学设备和4.4万套特殊配件。各部门生产仪器共计12.47万台，其中航空工业部6.25万台、通信工业部2.12万台、机器和仪器制造部3.87万台、军械部2300台。^①

此外，苏联还从德国运回了大量精密的仪器设备。1945年5月15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从德国购买特殊设备和原料”的第8568cc号决议。^②1945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第2754-775cc号决议，委托财政人民委员会给第一管理总局拨款200万马克，用于从德国购置专用设备和仪器。^③1946年4月4日，部长会议第743-296cc号决议，为第一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提供购置仪器、实验设备和其他设备等资金50万美元。^④这些费用主要从德国的战争赔款中扣除，实际上，苏联分文未支。苏联从德国运回的仪器设备有回旋加速器、高压装置、强磁体、电子显微镜和示波器等。其中，回旋加速器3台，分别安装在第二实验室、第三实验室和A研究所；高压装置4台，分别在第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674.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38-1945. Часть 2.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ФТИ, 2002. С.309.

③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аров., РФЯЦ-ВНИИЭФ, 2000. С.59-60.

④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169-170.

11 设计院 5 号实验室、Б实验室、Г研究所和化学物理研究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苏联核工业发展之初精密仪器设备不足的缺陷。

2. 人力资源

为了保障核工业建设有充足的劳动力，必须动用特殊的**劳动力资源**。二战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导致战后整个国家出现人力资源紧张的状况。为此，政府赋予核工程的建设单位——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业建设管理总局——调配囚犯、特殊移民和战俘参与核工程建设的特权。据统计，截至 1945 年 10 月 1 日，内务人民委员会共有 64 万囚犯、223.05 万特殊移民和 200 万战俘可供调配。^①使用囚犯进行大规模的强迫劳动，是核工业部门开展工作的基础；特殊移民和德国战俘因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在核计划初期阶段也被广泛使用；由于他们大都是强迫劳动、政治上不被信任，一直存在工作效率低下、工作内容受限等问题，到 50 年代中期逐渐被禁止参与核工程建设；在囚犯被禁止参与核工程建设后，军事建设者在核工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此外，还从社会各阶层中雇佣自由劳动力。雇佣工人是核工业建设中工作效率最高的群体，70 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成为核工程建设的主力军。截至 1949 年 8 月 29 日，工业建设管理总局的建筑工人共计 23.425 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0.8 万人、囚犯 11.36 万人、军事建设者 5.13 万人、有犯罪前科的人和特殊移民 3.19 万人、警卫人员 1.35 万人。^②

为了保障核工业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人才，实行了特殊的人才培训和选拔措施。在苏联核计划初期，全国的核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只有几十人。1945-1946 年，技术委员会和工程技术委员会从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东拼西凑才选拔出了 200 多名专家。基于这种状况，政府决定采取特殊的措施，拓宽国内人才培训和选拔的途径。

一是高校培养。1946 年 1 月 28 日，人民委员会第 225-96cc 号决议，责成莫斯科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莫斯科机械学院、列宁格勒工学院、

① Кокурин А, Петров Н. МВД: Структура, функции, кадры//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6. №. 10. С.117.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аров., РФЯЦ-ВНИИЭФ; М., ФИЗМАТЛИТ, 2003. С.736.

基辅大学和哈尔科夫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在 1946-1947 年间培养工程物理学家 80 人、核物理学家 190 人和放射化学家 190 人。^①1948 年 12 月 17 日，部长会议第 4638-1815cc 号决议，规定包括上述高等教育机构在内的 17 所高校培养 3285 名专家。^②实际上，1948-1950 年间它们共培养了 4600 人。^③二是从各部门和国防企业选拔相关专业人才，由地方领导协助第一管理总局局长共同选拔，一经选中，各部门要无条件放人，然后经第一管理总局分派到各下属企业和机构。这是核工业发展初期比较常见和快捷的人才选拔途径。遗憾的是，官方出版的档案中没有公布这类人才的数量。三是借调、改派和在当地招募。借调途径相对少见，例如，第 11 设计院借调了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А.Я.阿平(Апин)、初级研究员 В.К.波波列夫(Боболев)。^④在乌拉尔地区核工厂，由这种途径选拔的人才几乎没有，但存在着把派往其他机构的人才改派到本地区的情况。在当地招募的一般是勤杂工、熟练工等非核心工作人员，这部分人员的数据比较零碎，无法统计。总体来看，截至 1949 年 8 月 29 日，核工厂和机构的工作人员有 63208 人，其中高学历囚犯 5863 人。^⑤

为了核工业的发展取得关键性的进展，苏联还迫切需要德国科学家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为此，苏联竭尽全力招募德国科学家。但美国早在 1943 年底就成立了阿尔索斯别动队，秘密任务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是苏联之前，俘获德国境内的著名科学家。自 1945 年 3 月别动队进驻德国以来，俘获的德国科学家有核计划负责人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火箭之父冯·布劳恩(Von Braun)，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瓦尔特·拉格赫(Walther Gerlac)和库尔特·迪布纳(Kurt Diebner)等专业带头人。美国把他们控制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102-105.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210-216.

③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675.

④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3.Саров., РФЯЦ-ВНИИЭФ, 2002. С.782.

⑤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674-675.

起来，使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消失在大众视野。此时，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成功在即，德国科学家对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及苏联，它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让苏联得到这些科技人才。

虽然在争夺德国顶尖科学家方面让美国抢占先机，但是苏联并没有懈怠，而是针锋相对地推出了奥萨瓦根行动，结果成果颇丰。招募到了冯·阿登（Von Ardenne）、尼古拉乌斯·里尔（Nikolaus Riehl）、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彼得·蒂森（Peter Thiessen）、海因茨·巴尔维赫（Heinz Barwich）、海因茨·博兹（Heinz Boz）、马克思·福尔默（Marx Vollmer）等知名科学家，以及一大批研究人员。虽然这批科学家的重量级与美国所俘获的相差甚远，但他们对于人才匮乏的苏联来说仍然弥足珍贵。总之，通过动用特殊的劳动力资源和采取多种人才培养和选拔措施，满足了核工业发展初期对各类人力资源的需求。

总而言之，在核工业发展担负着赶超任务、同时又面临种种发展困境的情况下，苏联通过建立一套特殊而有效的核工业管理体制，形成了一个从高到低、由“斯大林—专门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各个科研机构和核工厂”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动员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财政、军事、科技和工业等各个领域的资源，解决核工业发展初期遇到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等一系列难题，从而使苏联能在短期内把最具有科技潜力的资源和人才，集中在核工业发展领域，有效地组织核工业领域各项工作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核工业实现赶超型发展。

（三）核工业的整体布局

随着核计划的全面启动，全国各地铀矿的开采和加工、金属铀的加工、科学研究工作、核材料的生产、核武器的制造、以及核试验场地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关于**铀矿的开采和加工**，这类工厂有位于中亚地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6综合厂、第9综合厂，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11综合厂、第8矿务局等。由于苏联境内的铀矿藏量有限，其东欧卫星国也是重要的铀矿产地。关于**金属铀的生产**，莫斯科郊区的12厂、乌拉尔地

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图拉市 718 厂，以及西伯利亚地区新西伯利亚州新西伯利亚市 250 厂等，都是金属铀的加工工厂。关于**核武器的研发**，核计划初期，在莫斯科建有第二实验室，是核武器的研发和设计中心，但因莫斯科人口密集不利于保密，也不能频繁开展试爆工作，致使工作进展缓慢。1946 年 4 月，在伏尔加河地区萨罗夫市建立了第 11 设计院，它逐渐代替莫斯科发展成为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设计中心。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又在乌拉尔地区的斯涅任斯克新建了苏联第二大核武器研发中心第 1011 设计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科研机构参与了核工业技术流程的研发、零部件设计和核工厂结构设计等工作，如位于莫斯科的第 9 科学研究、镭研究所、国立稀有金属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和第 12 国家专门设计院，位于列宁格勒的第 11 国家专门设计院等。关于**核材料的生产**，生产武器级铀的工厂，有位于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州奥焦尔斯克市的 817 综合厂、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热列兹诺哥尔斯克市的 815 厂；生产高浓缩铀的工厂，有位于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新乌拉尔市的 813 综合厂、列斯诺伊城的 814 厂，位于西伯利亚地区托木斯克州谢韦尔斯克市的 816 综合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泽列诺尔斯克市的电化综合厂。关于**核武器的批量生产**，有位于伏尔加河地区萨罗夫市的 551 厂、扎列奇内市的 1134 厂、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州三山城的 933 厂。关于**核试验场**，有中亚地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北极地区的新地岛核试验场。

综上所述，中亚地区主要是铀矿开采和加工工厂，以及核试验基地；莫斯科主要负责相关科学研究工作；伏尔加河地区主要负责核武器的研发和设计，还可以批量生产核武器；西伯利亚地区是核材料的生产基地；只有乌拉尔地区不仅有金属铀的加工工厂，还有武器级核材料的生产厂，既有核武器的研发中心，也有核武器的批量生产厂，是一个集“理论研究、新式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研发、核材料的生产、核弹头的制造和储存”为一体的核武器

综合体^①。这是本文选择乌拉尔地区作为案例进行研究的原因之一，即该地区核工业部门种类发展齐全，因此可以通过这一个地区透视苏联核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原因之二**，是乌拉尔地区的核工厂是苏联的第一批核工厂，其发展之路是苏联核工业的破局之路，实现了从零到有的突破，被视为核时代发展的典范。其他地区核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施工建设方面，还是在技术生产方面，都借鉴了它的经验。此外，它占苏联军事工业生产的40%，是苏联核工业的中心地区，被誉为苏联核武器的锻造车间。**原因之三**，是苏联第一颗钚弹和铀弹研制过程中有两个最难和最关键的环节，一个是核武器的结构设计，这是在萨罗夫市第11设计院^②完成的；另一个是武器级核材料的获得，此项任务正是在乌拉尔地区的核工厂内完成的。乌拉尔地区核材料生产的重要性也可以从政府决议中看出，1945-1953年间专门委员会举行了150多次会议，其中仅关于817综合厂的建设和试运行问题就有67次。^③由此看来，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发展的确具有典型意义。

乌拉尔地区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为苏联的核工业中心，这是因为它拥有一定的地缘、自然资源、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等优势条件，蕴藏着发展核工业的巨大潜力。第一，乌拉尔地区的地缘优势。它地处内陆，离莫斯科距离适中，远离西部和南部边界；一方面，便于管理和联系；另一方面，如果发生大型核事故不会威胁首都莫斯科和中部地区的安全。第二，乌拉尔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淡水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有山地和大片的原始森林便于核工程隐蔽，保障核工业生产活动秘密进行。第三，乌拉尔地区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它一些工业中心城市大型工厂的机械设备，全部或部分转移到了乌拉尔地

① 核武器综合体（ЯОК）包括从事核武器研制、生产和使用的一系列企事业单位，目前俄罗斯核武器综合体企业包括2个核中心——全俄技术物理研究所（过去的第11设计院）和全俄工程物理研究所（过去的第1011研究院），若干国防企业，灯塔综合厂（过去的817综合厂）、乌拉尔电化综合厂（过去的813综合厂）、电化仪器综合厂（过去的814厂）、仪表、仪器制造厂（过去的933厂）等。

② 关于核武器的结构设计见：张文华、张广翔：“聚合与扩散：苏联第11设计院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第69-81页。

③ Жарков О.Ю.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м плутония на химическом комбинате «Маяк» в 1945-1990 гг. Челябинск., ЧГАКИ, 2012. С.55.

区，特别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车里雅宾斯克州。在此基础上，其采矿业、黑色冶金业以及金属加工业都得以发展。第四，乌拉尔地区拥有大批技术人才。伴随着工厂企业从西部向乌拉尔转移，数十万高素质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也来到了乌拉尔。第五，乌拉尔地区有现成的施工建设单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建筑单位在二战期间，为紧急转移到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建设厂房，有在极端条件下组织大规模施工建设的经验。

乌拉尔地区作为苏联的核工业中心发展迅速。从 1945 年核计划全面启动，到 1949 年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短短的四年内，乌拉尔地区就建成了利用不同方法制备核材料的工厂。例如，同时利用铀-石墨反应堆和铀-重水反应堆生产钚的 817 综合厂^①，利用气体扩散法生产武器级铀的 813 综合厂^②；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还新建了 718 厂，扩大金属铀的生产；933 厂负责钚和铀的装填组装作业，便于核武器的批量生产；新成立了苏联第二大核武器研发中心第 1011 研究院，负责改良核武器和研发热核武器。这些核工厂和科研机构，为后来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研制和生产核弹头。乌拉尔地区逐渐发展成为核工业部门种类发展齐全的核武器综合体。通过这种赶超型的发展模式，使苏联在短期内拥有了强大的核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到多元的突破，保障了苏联核计划的顺利实施，打破了美国对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垄断，在与美国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战略制衡的政治目标。

二、赶超型模式下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

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有 3 座核工厂，分别是车里雅宾斯克州奥焦尔斯克市克孜勒塔什湖附近的 817 综合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新乌拉尔斯克市上涅伊温斯基镇的 813 综合厂，以及列斯诺伊城的 814 厂。主要任务是为原子弹生产核裂变材料—铀-235 和钚-239。美国氢弹之父爱德

① 1945 年 12 月 1 日至 1947 年 11 月 24 日，名为 817 厂。根据 1947 年 11 月 24 日部长会议第 3909-1327cc/on 号决议，817 厂获得 817 综合厂的称呼，本文统一用 817 综合厂。

② 813 厂于 1949 年 10 月 29 日改名为 813 综合厂，1945 年 12 月 1 日至 1949 年 10 月 29 日的 813 厂是 813 综合厂的分厂 Д-1，本文统一用 813 综合厂。

华·泰勒(Edward Teller)曾说,“生产核裂变材料是研制原子弹过程中难度最大的环节,这个环节如果被攻克,那之后用几个月的时间便可以制造出原子弹。”^①因此,苏联政府高度重视核裂变材料的生产,核计划全面启动后不久,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核材料生产厂建设。

(一) 核工厂的建设

首先是选址。为了保证核生产的安全性、保密性以及有效的运行,核工厂选址时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远离城市,有山地或森林作掩护;第二,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第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第四,水源充足;第五,有电力保障。每个核工厂在选址过程中,根据自身运行的特点又各有侧重。817综合厂对建筑物的要求极高,国内首次建设此类工厂,尚无可借鉴的经验,而核反应堆运行需要大量的淡水来冷却反应堆堆芯,因此选择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但水源丰富的克什特姆市和克斯里城之间的克孜勒塔什湖南岸地区。这里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但有17平方公里的水域,水容量达8400万立方米。813综合厂对厂房的要求不高,与普通工厂相差无几,但扩散机运行对电能的消耗很大,因此选择在既有厂房基础又有电力保障的新乌拉尔斯克市上涅伊温斯基镇。这里有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未竣工的第261厂,有许多已建好的厂房。814厂对厂房的要求是根据之后设计的电磁装置而定的,对厂房的要求比较独特,因此选址下图拉市上涅伊温斯基镇,与817综合厂一样,也是在乌拉尔原始森林之中从零开始建设。

之后便开始大规模的核工程建设工作。1945年12月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设817综合厂的第3007-892cc号决议。^②同日,颁布在261厂基础上建设813综合厂的第3008-893cc号决议。^③1947年7月19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建设814厂的第2140-562cc/оп号决议。^④核工程的施工单位

① Михайлов В.Н. (Гл. ред.).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С.57.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73.

③ Там же. С.74.

④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3. С.213-214.

工业建设管理总局将 817 综合厂、813 综合厂和 814 厂的建设任务，分别交由 859 建设工程局、865 建设管理局和 1418 建设管理局负责。此后，各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施工。

核工程的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仅 1946 年第一季度，就给 859 建设管理局拨款 1000 万卢布；给 865 建设管理局，拨款 500 万卢布。^①之后基建资金的拨款不断追加，到最后完工，建设 817、813、814 等核材料生产厂，共耗资约 20.93 亿卢布。^②

核工程的建设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囚犯、军事建设者、特殊移民、雇佣工人以及部分军官都被纳入施工建设的行列。囚犯参与核工程建设有一定的条件。根据刑法第 58 条规定，参加过反苏活动的囚犯禁止参与核工程建设。即便已经参与核工程建设的囚犯仍不被信任，不能参加核心工程建设，只能在挖沟渠、采石场、木材加工厂和机械修理厂等辅助部门劳动。在工程投产之前，他们会被转移到其他工程继续从事此类辅助工作；因此，囚犯并不清楚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性质。

囚犯参与核工程建设一直存在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与士兵和自由雇佣工人相比，囚犯的工作效率平均是 89–90%，而军事建设者达 115%，自由雇佣工人则更高。为了提高囚犯的工作效率，采取了奖励和教育相结合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囚犯的日常生活条件，发放额外的衣食品，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其次是实行考评制度，根据完成的工作量相应地缩短服刑期；最后是爱国主义教育。事实证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制度实行之后，囚犯完成的任务量平均达到了 131.2%。^③

囚犯参与核工程建设是一个从少到多再到无的过程。核工程建设初期使用的囚犯相对较少，截至 1947 年 3 月，817 综合厂使用的囚犯有 8416 人，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84.

② Чубукова М.А.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ы участия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1941-1949 годы).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7. С.123.

③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Толстикова В.С, Клепиков А.И. История 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55.

813 综合厂是 6720 人。^①7 月，贝利亚视察了核工程的建设工作之后，决定给 859 建设管理局加派 1.2 万名囚犯。^②1947-1949 年间囚犯的数量逐年增多。但使用囚犯产生了一系列安全和治安问题，1949 年以后其人数逐渐减少，1953 年 2 月 18 日，部长会议颁布法令，禁止囚犯参与核工程建设。因此，囚犯参与了 817、813 和 814 厂的建设，但几乎没有参与后来的 933 厂和第 1011 研究院的建设。

与囚犯不同的是，军事建筑营可以参与核心工程的建设。1945 年 12 月，军事建筑营开始组建；1946 年 4 月，基本招募完成；1946 年初，被陆续派往施工现场。其人员构成，一是从作战部队中解散的士兵（已满 4 年服役期）中招募；二是从德国战俘营中获救的苏联红军；三是被强行劫持到德国，后又遣返回国的年轻士兵。因此，军事建筑营的士兵和军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标准”年龄（20-25 岁），第二种是老兵（26-35 岁），第三种是“被遣送回国的人”。他们主要负责修建道路、水力发电站、住宅，铺设电线，是乌拉尔地区核工程建设的中坚力量。

以德裔苏联人为主的特殊移民，也参与了核工程的建设。1946 年 7 月，约 1 万余名特殊移民参与 817 综合厂的建设。^③相对而言，特殊移民的技术水平较高。出于保密的考虑，他们也不能参与核心工程的建设，主要负责居民点、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进入核心建设阶段之后，他们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如，去中亚和东西伯利亚地区修建铁路。此外，还从社会各阶层招募了一批雇佣工人，他们是工作效率最高的群体。但核工程建设初期，其人数相对较少，70 年代中期以后，雇佣工人成为核工程建设的主要力量。

总之，在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初期阶段的核工程建设过程中，动用了囚犯、军事建设者、特殊移民和雇佣工人等一切可以动用的劳动力。截至 1949 年 8 月 29 日，817 综合厂、813 综合厂、814 厂的建设者总人数分别为 44900、27600、1940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分别为 1500、800、600 人，

①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Толстикова В.С., Клепиков А.И. История 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52.

② Там же. С.53.

③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543.

雇佣工人 1500、800、200 人，有犯罪前科的人和特殊移民 15500、4900、4900 人，军事建设者 16200、9800、11800 人，囚犯 8300、9200、11800 人，服务人员 1700、600、600 人，警卫人员 1300、1000、1100 人。^①他们基本完成了乌拉尔地区核工程建设初期基础施工和各种辅助生产设施的建设。

在 1945–1946 年间，建筑队伍的主要任务是在施工现场铺设道路、水电网，建简易住房、砍伐木材等，为大型施工建设提前做好准备工作。1946 之后的主要任务是新建和扩建核工厂，但他们的衣食住等基本的生活问题依旧没有保障，直到 1955 年之后生活才基本稳定。在艰难的条件下，组织庞大且社会构成又十分复杂的建筑队伍有效地开展工作，按时完成艰巨的建设任务，这是一项重大难题。为此，建筑单位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

第一，加强纪律监督。施工现场有内务部队的士兵站岗，并配备枪支，对于武力拒绝工作者可以不经领导批准直接使用手枪；对于消极怠工、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者，先是由建筑单位政治处工作人员进行说服教育，说服教育无效者则被强制逮捕。**第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筑单位的政治处根据工人的出身、受教育水平和个人愿望等，制定学习的内容和形式。军事建设者主要通过教科书学习，内容有苏共党史，以及苏联国家现行的国内外政策等；囚犯主要通过举办有关国家形势、犯罪问题的讲座等接受教育。此外，还组织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的话剧，如《保尔·柯察金》。**第三，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自 1946 年年中开始，建筑单位就组织大规模的劳动竞赛，分别以“团、营、连、排、班”为单位开展，每月汇总出竞赛结果，获胜者可以获得锦旗、现金、住房和饮食等奖励。

通过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建设者的工作热情。1947 年初，813 综合厂的工程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比 1945 年 12 月 21 日人民委员会第 3150-952cc 号决议规定的 1947 年 9 月^②竣工的要求提前了半年。但对于技术难度较大、仅靠建筑工人的努力无法完成施工建设工作的 817 综合厂和 814 厂来说，进展就没有那么顺利了。由于技术文件长期滞后并不断变化、高技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737.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83.

术安装人才短缺、缺少必要的设备等原因，817 综合厂的铀-石墨反应堆、放射化学厂都未能如期竣工。根据 1946 年 4 月 9 日部长会议第 802-324 cc/он 号决议，铀-石墨反应堆、放射化学厂投入使用的时间分别是 1947 年 7 月 1 日、9 月 1 日，^①而它们实际竣工的时间分别是 1948 年 5 月中旬、12 月初。814 厂亦是如此，根据 1948 年 4 月 6 日部长会议第 1128-403cc 号决议，应于 1949 年 7 月 1 日竣工，^②实际上 1950 年 12 月才开始投入使用。这已是在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物力和人力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施工建设任务，接下来的任务是在工业中生产核材料。

（二）核工厂的生产

天然铀中铀-238 占 99.3%，而铀-235 仅占 0.7%。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铀是浓度在 90%以上的铀-235，因此需要从天然铀中对铀-235 进行浓缩（或称富集）。获得浓度在 90%以上的武器级铀，最困难的是进行同位素分离。从铀同位素中分离铀-235 的方法有气体扩散法、电磁法和离心法等。而钷-239 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元素，可以在核反应堆中用中子轰击铀-238 制成。钷-239 的生产工艺有反应堆辐照、辐照冷却、分离和还原成金属等步骤。根据慢化剂的不同，反应堆可分为石墨反应堆和重水反应堆。在美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苏联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研制原子弹的时间，不惜高额成本，同时使用不同方法，生产核裂变材料。

817 综合厂

817 综合厂由 А 铀-石墨反应堆、Б 放射化学厂、В 化学冶金厂、OK-180 铀-重水反应堆组成。曾用代码车里雅宾斯克-40、车里雅宾斯克-65、859 工程、10 号基地等，现名为灯塔综合厂，位于奥焦尔斯克市。学术领导是 И.В·库尔恰托夫，厂长先后由 П.Т·贝斯特洛夫(Быстров)、Е.П·斯拉夫斯基(Славский)、Б.Г·穆兹鲁科夫(Музруков)担任。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193.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3. С.455.

817 综合厂可以同时采用石墨反应堆和重水反应堆生产武器级钚。石墨反应堆生产钚材料的工艺流程是：首先在 A 钚-石墨反应堆辐照金属铀，获得辐照铀；接下来把辐照铀送到 B 放射化学厂，B 厂通过放射化学法从辐照铀中分离出钚-239，清除裂变的衍生物和杂质；然后将钚溶液送到 B 化学冶金厂，B 厂通过化学冶金法从钚溶液中提纯金属钚，并通过机械锻造法将其加工成原子弹的部件。重水反应堆生产钚的工艺流程与石墨反应堆类似。

在核反应堆准备投入使用阶段，为了确保各项工作都万无一失，第一管理总局局长 Б.Л. 万尼科夫和学术领导 И.В. 库尔恰托夫亲临 817 综合厂。1948 年 6 月 19 日，在 И.В. 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反应堆开始投入使用，从此，苏联开始了武器级钚材料的生产历史；但在运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技术事故，直到 1948 年底才生产出第一批辐照铀溶液；真正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已是 1949 年 3 月。B 厂于 1949 年 2 月生产出第一批浓缩钚溶液。2 月 28 日，B 厂的第一批钚溶液送达 B 厂，进行提纯工作；5 个月之后，B 厂实现了实验室条件下的生产。8 月 5 日，生产出了足够量（档案并未公布具体数字）的钚材料，并加工成零部件，于 8 月 9 日通过原子弹的总设计师 Ю.Б. 哈里顿院士的验收。三周之后，即 8 月 29 日，苏联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相比之下，**铀-重水工业反应堆**的命途多舛，多亏美国的科技情报数据，它才有机会被再次重视。最初，Ю.Б. 哈里顿和 П.М. 泽利多维奇（Зельдович）经计算认为，重水反应堆的工作原理是不可行的。И.В. 库尔恰托夫分析从美国获得的反应堆数据，重新评估了重水反应堆的发展前景，并指出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情报和结论十分重要，因为重水反应堆可以使用天然铀为燃料，运行所需要的铀量是石墨反应堆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这对于战后铀短缺，需要最大限度节约核原料的苏联来说至关重要。此后，铀-重水工业反应堆才再次被重视，但相比之下进度已经落后。

1945 年 12 月 1 日，在 A 石墨反应堆已经开始施工建设的时候，人民委员会才通过第 3010-895cc 号决议，成立第三实验室，专门负责解决与铀-重水工业反应堆相关的问题，学术领导是 А.И. 阿里汉诺夫（Алиханов）。^①1948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74-75.

年4月，政府通过建设重水工业反应堆的决议，此时石墨反应堆的建设工作已经完成。1949年8月开始着手重水反应堆的设计。1949年夏，817综合厂开始OK-180的建设工作，1950年开始主反应堆的安装，同年年底А.И·阿里汉诺夫抵达施工现场，与其助手一起参与反应堆的安装和调试工作。1951年11月17日，OK-180投入使用，计划每年生产28千克铀。^①

817综合厂同时采用石墨反应堆和重水反应堆两种方式生产铀。相较于石墨反应堆，重水反应堆的优势是对铀的需求量少，OK-180重水反应堆使用的铀量是A石墨反应堆的十分之一，这对于核计划初期铀赤贫的苏联来说十分重要。但是重水反应堆在发展初期遇到的技术问题，也比石墨反应堆多。因此，最终是石墨反应堆在这场技术、时间与效率的竞赛中取得胜利，为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РДС-1提供了足够的铀材料。

817综合厂在投入运行之后，需要大批工作人员，并随着各个分厂相继投入运行，对他们的需求量急剧增加。1947年1月1日，综合厂在编人员只有110人，1948年1月1日有4560人，在1948年底有8374人，^②在反应堆开足马力全面运行之后需要的人数更多。截至1949年8月29日，共计有10118人，其中，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1979人，生产工人3361人，服务人员670人，幼儿园老师、司机等非工业工人3580人。^③

在某些职业中以女性为主。例如，反应堆的水流量观察记录员全部是女性，主要负责记录反应堆工艺管道中水的消耗，防止因缺水而导致反应堆运行停止；放射化学厂负责仪器泄漏检查工作的也以女性为主；化学冶金厂的女性占80%。^④因为女性更有耐心、责任心和更专注，可以更精确地记录水的消耗，也可以更快、更准确地检查到放化厂设备的故障。在服务行业，诸如教师、医生、餐厅服务员和商店售货员也是女性较多。虽然女性在某些行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717.

② ГФПОМ.Ф.2.Оп.3.Д.18.Л.32. 转引自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Создание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Урале. С.302.

③ 《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给出的总人数，与后面的各类职业的工作人员相差529人，笔者认为，这529人可能是职业类型不明确者。См.: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720.

④ Артёмов Е.Т, Бедель А.Э. Укрощение урана. Ек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ОО СВ-96.1999. С.62.

业占优势，但核工厂仍以男性为主，领导职务也大都由男性担任，其他核工厂的情况类似。

进入 817 综合厂工作有三种途径：一是各州的党委和大学党支部发放许可证和派遣证；二是从国防企业和其他企业调派；三是个人申请，主要是附近定居点的居民和军队建筑营的士兵。其中第二种途径选拔的人才一般须满足以下条件：至少有 5 年的工作经验，五级及以上熟练工，身体健康，苏共党员、预备党员或共青团成员。据统计，这三种途径前来综合厂工作的人数分别占 51.5%、31.6%、16.9%，^①其他核工厂的情况类似。

813 综合厂

813 综合厂最初只有 Д-1 一个工厂，曾用代码有 1865 工程、856 工程、5 号基地、城市建设总局乌拉尔地区技术装备基地、上涅伊温斯基国有机械制造厂，现名为乌拉尔电化综合厂，位于新乌拉尔斯克市。厂长是 А.И. 邱林（Чурин）、学术领导是 И.К. 基科因。

813 综合厂的主要任务是采用气体扩散法分离同位素铀，优先发展这种技术方案，是受到了美国核情报的影响。美国亨利·斯密（Henry Smith）教授编撰的《原子能的军事利用》一书中，列举了分离同位素的四种方法，对比得出气体扩散法更优越。^②这一结论对苏联的科学家来说十分意外，因为苏联科学家大都更倾向于离心法，认为扩散法不适用于重质元素的分离。

1947 年初 813 综合厂的厂房建设完工，但气体扩散装置的研发却惨遭失败。自 1947 年开始，高尔基厂专门设计局和基洛夫厂专门设计局就共同研发气体扩散机。第二实验室试用时发现，基洛夫厂设计的扩散机没有达到技术要求，因此，扩散机的研发工作交由高尔基厂负责，而气体压力器和自动调节器等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仍由基洛夫厂负责。直到 1949 年，А、Г 研究所才为 813 综合厂研制出了可以正式投入使用的气体扩散机。全面运行

① Рискос С.А.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закрытых городов Урал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1940-х-середина 1980-х годов). Екб., УрО РАН, 2004. С.92.

② Смит Г.Д.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для военных целей: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ёт о разработке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 под наблюд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ША.М.,Трансжелдориздат,1946. С.276.

后，813 综合厂共拥有 10560 台扩散机，总价值为 7.3 亿卢布。^①截至 1949 年 8 月 29 日，综合厂的工作人员共有 6335 人，其中，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 1006 人，生产工人 2956 人，服务人员 371 人，幼儿园老师、司机等非工业工人 1762 人。^②813 综合厂借鉴了 817 综合厂的经验，组建了女性团队负责气体扩散机真空系统的泄漏查寻工作。

1949 年 11 月，Д-1 厂交付了第一批产品浓度为 75%的铀-235，但直到 1950 年才真正掌握了气体扩散技术。813 综合厂获得的铀-235 浓度为 75%，而铀弹所需的浓度为 94%。因此，813 综合厂并没有彻底完成为第一颗铀弹生产武器级铀的任务，这个任务交由 814 厂继续进行。

814 厂

在采用气体扩散法获得同位素铀的同时，苏联科学家也在研发电磁法分离同位素铀的技术。814 厂曾使用代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5，位于现在的列斯诺伊城。厂长是 Д.Е.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学术领导为 Л.А. 阿尔济莫维奇教授，工厂设备总设计师是 Д.В. 叶菲莫夫（Ефремов）。

电磁法提取浓缩铀的技术，由第二实验室组织领导，各学术机构和工业企业共同参与，一起进行技术研发、设计和生产，最终设计出的电磁装置总重量为 6000 吨。要知道镭研究所回旋加速器磁体的重量只有几吨，第二实验室的重量为 75 吨，而 814 厂的重量是它们的 80 倍以上。对此，科学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资源供应条件所造成的。为了容纳磁体的垂直大小，专门建造了一座 5 层的建筑物。房间的自重 1000 吨以上，室内设计方案复杂，由昂贵的黄铜制成，确保厂房超深真空。从 1950 年春开始安装、调试和试运行，至 12 月正式投入使用。

截至 1949 年 8 月 29 日，814 厂的工作人员共有 1266 人，其中，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 10 人，生产工人 246 人，服务人员 18 人，幼儿园老师、司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649.

② 《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给出的总人数，与后面各类职业的工作人员相差 240 人，笔者认为，这 240 人可能是职业类型不明确者。См.: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720.

机等非工业工人 992 人。^①女性在同位素的化学加工车间占 63%、工程技术人员中占 50%、器械操作工中占 67%、化学分析师和检查员占 100%。^②不过，1953 年以后，她们逐渐被男性代替。

由于电磁法分离铀的生产效率低，一旦出现重大损失，铀不可回收，能源消耗大，运营成本高。因此，利用该方法获得的武器级铀十分有限，只能满足第一颗铀弹的需要。第一颗铀弹试爆以后，由于生产成本高昂，814 厂被改组成生产热核材料的 418 厂，813 综合厂则继续武器级铀的生产。尽管电磁装置存在一些缺点，妨碍了苏联首次掌握的电磁法分离同位素铀的技术在工业中推广，但正是它在苏联第一颗铀弹获得所需的高浓缩铀-235 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813 综合厂获得的浓度为 75%的铀-235，被送到 814 厂进行进一步加工，最终获得铀弹所需的浓度为 94%的铀-235，为苏联在 1951 年试爆的第一颗铀弹提供了足够的铀材料。

（三）初期阶段的整体特征

第一，采取动员型经济发展方针。动员型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核工业特有的，也不是其独创的，但其动员的范围却是空前的。苏联当时国内的各种资源和储备都被纳入到核工业发展领域，东欧卫星国和占领区东德也被纳入了动员行列，甚至不惜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抢夺”资金和人才。为了满足其对资金的需求，财政拨款可以不做预算，根据实际消费开支；为了满足其对土地的需求，从地方当局征用大片土地，将国有农场的土地征为国家备用地，将本地居民迁往别地；为了满足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使用囚犯等强迫劳动参与建设；为了满足其对生产工人的需求，同时采取高校培养、各企业和部门选拔等多种人才选拔途径；为了满足其对生产设备的需求，动用了数十家核科研机构 and 各个部门参与设计、研发和生产。

第二，实验研发与工业生产同步进行。为了节约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在核武器发展领域赶超美国，专门委员会的领导采取了一个冒险的步骤，即决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 720.

② Подсчитано по: Третий цех. Екб, 2007. С.62-78. 转引自 Мельникова Н.В. Женская занятость в советском атомном проект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7. №.6. С.161.

定在技术研发的同时开展核工业建设，换言之，就是在实验生产中研制核武器。基于这一战略，工程建设工作与核材料钚、铀的生产和技术研发工作同步进行。例如，Φ-1 实验铀-石墨反应堆尚未投入使用，生产钚的工业技术尚处于实验研究阶段，A 工业铀-石墨核反应堆就已进入建设阶段；813 综合厂的气体扩散装置和 814 厂的电磁装置也是在工业生产中不断完善的。这些核工厂一直设有学术领导一职，有数十家科研机构围绕着这些核工厂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这些核工厂也是新工艺技术的实验场。50 年代中期以后，核工业生产技术不断完善，不再具备实验性。当然，实验性并不是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个性，也是世界核工业发展共有的特点。

第三，特殊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与工业发展相结合。核工业部门只受专门委员会和第一管理总局的领导，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没有专门委员会的允许，都不能干涉与核生产相关的一切工作。核工业部门实行独特的行政命令、法规和纪律，建立了自己的“核帝国”，成了“国中之国”。其拥有自己的中央管理机构（第一管理总局，后来是中型机械制造部）和地方管理机构（以核工厂为中心的保密区，后升格为核保密城市，市内设有法院、警察局和执行委员会），不受地方政权的管辖。核工厂的建设和生产工作受到它们的严格监督，核工厂的领导要每月向专门委员报告工作进展。核工程延期竣工或工厂运行障碍时，核计划的学术领导 И.В·库尔恰托夫、第一管理总局局长 Б.Л·万尼科夫、专门委员会委员 М.Г·别尔乌辛，甚至专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等都会亲自前往现场，监督工程施工和生产工作的运行。核工厂还有贝利亚的常驻代表，可以监督包括工厂领导在内的一切人，可以单独向贝利亚汇报有关的一切情况。行政命令化的管理体制，有助于保障核工业发展所需的各项资源的供应，并监督各项计划的实施，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主义作风愈演愈烈，出现“唯领导是从，忽视科学家的意见”的现象，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核工业的发展。

第四，核情报的影响。苏联从美国获得了许多关于石墨、重水反应堆生产钚以及用扩散法、电磁法和离心法分离同位素铀的相关数据。817 综合厂的核反应堆与美国华盛顿州汉德福钚综合厂的核反应堆是同一型号，提炼钚的工艺流程也相似。生产铀的 813 综合厂和 814 厂，与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

的两座工厂相似。还效仿美国确定了优先发展扩散法分离同位素的方针。借助核情报数据重新评估了重水反应堆的发展前景。可以说，借助核情报，让苏联绕过实验阶段，直接进入了工业生产阶段，保障苏联以最可靠、最快速和最省钱的方式拥有了原子弹，为苏联追赶美国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他们在效仿美国的同时也有一些优于美国的设计。例如，A 铀-石墨反应堆的总工程师 Н.А·多列扎利(Доллежалъ)提出的反应堆工艺管道中铀棒放置的垂直方案，就比华盛顿州汉德福核反应堆采用的水平方案的性能更优。因为，反应堆的水平结构存在诸如构件容易变形等弊端，而垂直结构反应堆的效能大大增强，直到现在仍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沿用。

第五，高度保密。相较于美国核情报的大量泄露，苏联核计划一开始就被高度保密。以核工厂为中心设立了保密区，周边用铁丝网围住，沿着铁丝网设置岗哨，全天候武装警卫，士兵与服役犬不时巡视；通往工程的路途中设置通行站和岗哨，检查来往人员的身份证、通行证和随身携带物品。核工程、工厂和产品都采用掩护名称，而且掩护名称要定期更换。国家安全部对参与核工厂的主要科学家，如 И.В·库尔恰托夫、Л.А·阿尔济莫维奇和 И.К·基科因等实行重点保护。每位科学家配备 2-3 名贴身保镖，保镖的编制隶属于核工厂，他们名义上是科学家的私人秘书，主要职责是保护科学家的人身安全，限制可疑人员和犯罪分子与其接触。进入核工厂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签订保密协议，严禁向任何人泄露自己的位置信息和生产产品信息，如果破坏保密协议要追究刑事责任。

总而言之，1945-1949 年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为原子弹生产核材料。整体来看，铀-235 进展滞后于钚-239。原因之一是，苏联政府在实施核计划初期，制定了内爆式钚弹和枪击式铀弹两套方案，但核计划的学术领导 И.В·库尔恰托夫根据相关核情报对比原子弹的两套方案后指出，内爆法可以将粒子的相对速度提高到 1 万米/秒，故内爆法优于枪击法。^①因此，内爆式钚弹成为苏联实施核计划的第一要务，而枪击式铀弹的重要

^① Гончаров Г.А, Рябев Л.Д. О создании перв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Саров, ФГУП РФЯЦ-ВНИИЭФ, 2009. С.58.

性略次于它，进而生产核材料铀-235 的重要性也略次于钚-239。原因之二是，分离同位素铀的技术难度确实较大，无论是利用气体扩散法还是电磁法，都遇到了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技术难题。

这一阶段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成就显著。817 综合厂为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足够的钚材料，813 综合厂和 814 厂共同努力，为第一颗铀弹提供了足够的铀材料。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由于技术水平有限，有效利用系数较低，生产钚和铀的造价极高。1950 年 817 综合厂生产 1 千克武器级钚的造价为 1515.2 万卢布，813 综合厂生产 1 千克高浓缩铀-235 的造价为 1233.5 万卢布。^①但不可否认的是，乌拉尔地区赶超型核工业发展创造了历史奇迹。核工业部门的努力得到国家的认可。1949 年 10 月 29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授予 23 名科学家、建设者、核工厂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②同日，部长会议第 5070-1944cc/on 决议，授予 176 人斯大林 I 等、II 等和 III 等勋章。^③

三、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后续发展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949 年 10 月批准了扩大原子弹生产计划，并做出紧急研制氢弹的决定，美苏军备竞赛升级。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苏联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促进自身发展日臻完善。苏联解体之后，核工业陷入发展困境，为了走出困境，进行了转型和重组，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一）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后至苏联解体之前

① 817 综合厂在 1949 年生产武器级钚的造价更高，因为 1949 年放射化学厂和化学金属厂有效利用系数分别为 89%、84.8%，而 1950 年分别为 94.4%、92.9%。См.: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712.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1. С.563.

③ Там же. С.530-562.

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后，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转变为批量生产和储存核武器、研发新式核武器和热核武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乌拉尔地区 817、813 综合厂扩建，814 厂改组，还新建了 718 地下厂、933 厂和第 1011 研究院。

817 综合厂在完成铀材料的生产之后多次扩建，技术也不断完善。先后新建了 10 个不同类型的工业反应堆，除了上文提到的 A 铀-石墨反应堆（1987 年停止使用）和 ОК-180 铀-重水反应堆（1966 年停止使用）以外，还新建了 ИР-АИ、АВ-1、АВ-2、АВ-3 等 4 座铀-石墨反应堆，生产核材料铀和热核材料氙，它们于 1950-1952 年间相继投入使用，1987-1990 年间先后停止使用。ОК-190、ОК-190М 等 2 座重水反应堆，用于生产铀，分别于 1955、1966 年投入使用，1965、1986 年停止使用。鲁斯兰（Руслан）水-石墨反应堆，生产氙及其同位素产品，1979 年投入使用，迄今仍在工作。柳德米尔（Людмил）重水反应堆，生产氙及其同位素产品，1988 年投产，目前仍在运行。核反应堆在工作期间不断进行现代化改进，生产效率逐渐提高。Б 放射化学厂也历经了多次扩建和技术改造，还于 1952 年新建了 ДБ 放射化学厂，В 化学冶金厂也得以扩建。

扩建后的 817 综合厂生产效率极大提高，1950 年的生产效率与 1949 年相比增加了 4 倍。生产效率的提高，伴随着的是铀产量的逐年增加，1949 年铀的产量为 19 千克，1950 年计划生产 52 千克，实际生产 69.4 千克，1951 年计划生产 117 千克，实际生产 158.5 千克^①，都是超额完成任务。1952 年，随着更多反应堆投入使用，一天可以生产 1 千克铀。^②817 综合厂除了铀产量增加，生产的产品种类也增多，除了铀之外，还可以生产热核材料氙。

813 综合厂也不断扩建。随着新的扩散机问世，1950-1951 年、1952-1953 年、1954 年、1955-1957 年，陆续新建了 Д-3、Д-4、СУ-3 和 Д-5 厂。1955 年政府通过决议，813 综合厂改用离心法分离同位素铀；1964 年改名为乌拉尔电化综合厂，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离心机分离设备。1966 年综合厂进行技术调整，确立了离心技术在分离同位素中的主导地位。1988 年综合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666.

② Там же. С.671.

厂彻底停止使用气体扩散设备，只使用离心法分离同位素。

813 综合厂于 1950 年掌握了生产铀的技术，随着工厂的扩建，生产效率也得到提高。1950 年生产浓度为 75%的铀-235 达 45 千克，1951 年生产浓度为 75%的铀-235 达 56.5 千克，浓度为 2-5%的铀-235 达 5000 千克。1952 年 10 月规模扩大后的 813 综合厂，每天可以生产 1.5 千克浓度为 75%的铀-235，1954 年Д-4 厂投入使用之后，综合厂就可以独自生产出浓度为 90%的铀-235。扩建后的 813 综合厂有 15760 台扩散机，生产面积达 19 万平方米，工人达 8400 人。^①

814 厂改组成 418 厂。由于电磁法分离同位素耗资巨大，1951 年 9 月 15 日部长会议第 3506-1628cc/оп号决议，^②撤销 814 厂，其厂房、设备、人员和住房全面移交给 418 厂，厂长仍是Д.Е·瓦西里耶夫，最初负责生产热核材料锂-6，同时还借鉴了第一个批量生产核武器的 551 厂的经验，批量生产原子弹的零部件；418 厂多次更名，1966 年为电化仪器厂，1971 年为电化仪器综合厂，现名为联邦国家单一制企业电化仪器综合厂。

新建 718 厂。为了扩大金属铀的生产，降低施工建设成本，1950 年 2 月 14 日部长会议第 576-222cc/оп号决议，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图拉市伊索夫林区建设 718 地下厂，距离 418 厂 8 公里。其主要任务是利用核废料生产金属铀，厂长为М.В·普罗先科（Прошенко）。工厂建在地下 150 米，由 7 个车间、1 个实验室和 1 个库房组成。1950 年第二季度开始动工，计划 1952 年 7 月 1 日完成第一阶段的建设，1953 年 7 月 1 日完全竣工；计划生产 700 吨金属铀；基建资金为 5000 万卢布。^③1951 年 1 月 27 日部长会议通过第 243-111cc号决议^④，为工厂建设提供必要的劳动力、资金、技术和电力保障，确保施工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但进展仍然十分缓慢，投入使用的期限一再延迟，1953 年贝利亚被捕之后，718 厂被迫停止施工，包括地下建筑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С.672.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7. С.311.

③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160-161.

④ Там же. С.268-270.

在内的所有资产都移交给了 418 厂。

新建 933 厂。由于钚和铀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需要建造一个专门负责组装原子弹材料的核工厂以保障制造原子弹所用。1952 年 1 月 24 日，部长会议第 342-135cc/оп号决议，在车里雅宾斯克以西 250 公里的尤留赞镇附近建设 933 厂，内务部 247 建设管理局负责施工建设工作。^①933 厂隐蔽在三座山之间的一个深谷中，故因其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被命名为三山城，公开通信地址是兹拉托乌斯特-20、兹拉托乌斯特-36。其选址满足了隐蔽性的要求，但也造成了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没有任何道路和厂房，建筑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都十分困难，建设过程中所需的电力更是无法保障。为此，247 建设管理局组建了专门的施工单位 587 建设管理局，它一一攻克了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交通闭塞、电力不足和建材匮乏等难题，最终，工厂于 1955 年 8 月投入使用，第一任厂长是 К.А. 沃尔金 (Волгин)。

新建第 1011 设计院。1954 年 7 月 31 日，部长会议第 1561-701cc 号决议，建立第 1011 研究院。^②其建立的背景，一是 1952 年美国继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之后，又新建了第二大核武器研究中心——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为了制衡美国，苏联也要建设除第 11 设计院之外的第二大科学研发中心。二是吸取卫国战争中的教训，由于工业企业过于集中在西部，需要在战时紧急向内陆转移，于是政府决定未雨绸缪事先筹建第 11 设计院的备用机构。第 1011 研究院位于车里雅宾斯克州斯涅任斯克市，这里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邻近 817 综合厂，可以就近解决核材料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公开通讯地址是克拉斯里-2、车里雅宾斯克-50、车里雅宾斯克-70，1994 年改现名俄罗斯联邦核中心暨全俄 Е.И. 扎巴巴欣技术物理研究所（简称“全俄技术物理研究所”）。

第 1011 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第 11 设计院。根据 1955 年 3 月 24 日部长会议第 586-362cc 号决议，任命第 11 设计院的副学术领导 К.И. 晓尔金 (Щёлкин) 为学术领导和总设计师，Е.И. 扎巴巴欣 (Забабахин) 为副学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7. С.388.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III. Водород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6. Книга 2. С.224.

术领导和理论部（负责气体动力问题）主任。^①此外，还从第 11 设计院选拔了 350 名科技工作者、设计师、实验员和工人，分配到第 1011 研究院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设计部门。

最初，第 1011 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核武器的改良工作，节省核装料，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核武器的批量生产。例如，改进 1953 年试爆的第一颗氢弹 РДС-6；1954 年下半年开始，协助第 11 设计院进行新式热核武器 РДС-37 的研发；1957 年 4 月，开始自主研发核武器。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中期，乌拉尔地区核武器综合体的主体部分初具规模，形成了从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到核武器的研发、制造和生产，再到储存，一条完整的生产线。虽然此时苏联的核武器储量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它已经成为美苏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方面。50 年代中期以后，赫鲁晓夫提出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军事战略，乌拉尔地区的核工厂和科研机构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做了大量工作，为这些战略防御性武器研制和生产核弹头，为赫鲁晓夫在这一军事战略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苏联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首次占据上风。

纵观苏联时期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45 年 8 月到 1949 年 8 月是起步阶段，主要任务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生产核材料。这一阶段苏联核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破”，尽一切可能用最快的速度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拥有自己的核武器。1949 年 9 月到 1950 年代中期是完善阶段，初步发展成为核武器综合体。这一阶段苏联核工业的发展重点是“赶”，批量生产核弹头，争取在核弹头的数量上赶超美国。5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是成熟阶段，核武器综合体发展完善，成为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阶段苏联的核工业发展重点是“超”，到 70 年代中期，苏联核武器的数量基本上超过了美国。1977、1978、1979 年美苏两国的核弹头数量分别为 25342、23044 件，24424、25393 件，24142、27935 件。^②直到戈尔巴乔夫大量削减战略核武器之前，苏联的核弹头储量一直多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III. Водород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6. Книга 2. С.343-344.

② Минаев А.В.(Отв. ред.)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мощь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ева.М.,Воен. Парад, 1999. С.144, 167.

于美国。乌拉尔地区核工业正是沿着整个国家核工业的轨迹发展的，可以说，乌拉尔地区核工业是苏联核工业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成功典型，在短短的数十年间，该地区从一个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变成了国家的核工业基地和核武器库，在与美国对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苏联的核实力。

（二）苏联解体之后

苏联解体之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 80% 以上的核工业，其中包括：**第一**，核电站，有 9 座，它们都位于欧俄部分。**第二**，铀矿产区，有 4 个，分别位于外乌拉地区库尔干州、西西伯利亚地区、维季姆矿区和斯特列利佐夫矿区，这些矿区的铀矿产地分别有 3 个、8 个、5 个和 10 个。**第三**，核武器综合体企业，主要位于 10 座核保密城市内，乌拉尔地区有灯塔综合厂（过去的 817 综合厂，生产钚和氟，此外，还负责乏燃料处理）、乌拉尔电化综合厂（过去的 813 综合厂，生产铀，此外，还负责乏燃料处理）、电化仪器综合厂（过去的 418 厂，生产锂—6）、全俄技术物理研究所（过去的第 1011 研究院，负责研发）；伏尔加河地区有全俄工程物理研究所（过去的第 11 设计院，负责研发）、先锋队厂（过去的 551 厂，批量生产核武器）、奔跑公司（过去的 1134 厂，制造核武器部件）；西伯利亚地区有西伯利亚化学厂（过去的 816 综合厂，生产铀）、克拉诺亚尔斯克采化厂（过去的 815 综合厂，生产钚，此外，还负责乏燃料处理）、电化综合厂（生产铀，还负责乏燃料处理）。**第四**，核燃料循环企业，除了灯塔综合厂、乌拉尔电化综合厂、克拉诺亚尔斯克采化厂和电化综合厂之外，还有新西伯利亚化学浓缩厂、安加尔斯克电解厂。**第五**，核武器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位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第六**，反应堆释热元件的制造企业，主要有乌留平斯克冶金厂、新西伯利亚化工厂和莫斯科东部机械制造厂等。**第七**，核潜艇基地，主要位于科拉半岛的东部、堪察加半岛的南部和阿穆尔斯基半岛的南部。**第八**，核试验场，有新地岛核试验场等。

经历激烈动荡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引进西方的“休克疗法”，采取放开物价、货币和财政双紧政策、大规模私有化等措施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核工业部门的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新成

立的俄罗斯政府放弃了优先发展核武器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国防军事订货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它不处于俄罗斯联邦政府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列，又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再一方面，中央政府抛弃它，地方政府又无权管理它，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

核工业部门自身也存在致命的缺点：苏联政府在创建这些核工业时并没有考虑到国际政治局势的瞬息万变，更没有预测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因此，它们依赖大量的国防军事订货进行单一类型的军事生产，没有紧急替代性生产。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对核武器的需求量急剧下降，国防军事订货急剧减少，国家财政拨款减少，生产规模大幅缩小，而短期内替代性生产没有建立起来，大量高技术工人被闲置，核工厂需要大量裁员，失业率剧增，大批工人失业。与此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等问题。

独立后的俄罗斯核工业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1-2004年，这是俄罗斯联邦原子能部领导阶段。政治动荡和财政不稳，导致核工业部门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最初，核工业部门被动承受，1994年以后，它开始积极面对困境，通过自筹资金为企业注入活力，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政府也逐渐增加预算，加大扶持力度。第二阶段是2004-2016年，这是改革的时代。2004年3月，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原子能署取代原子能部，2007年12月又将其改制为俄罗斯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Госкорпорация «Росатом»），由政府部门改为政企合一的企业集团。

第一个阶段是核工业生存最为困难的时期。虽然国家在许多经济领域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些战略型国防企业因具有特殊重要性，私有化期限被无限推迟，但仍在生产领域初步实行了军转民的改造。截至2004年1月1日，改革前的俄罗斯联邦原子能部有165家企业机构，包括42家科研机构、41家工业机构、8所设计院和25家国有机构，就业人数约33.5万人。^①

第二个阶段也被称为В.С·基里延科^②（Кириенко）十年，这是激进改

① Фролов И.Э. Атом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Итоги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а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4. С.3.

② В.С·基里延科，2005年11月15日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原子能署署长，2007年12月12日又被任命为俄罗斯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总经理，2016年10月5日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革的时代。改革后的核企业形成了单一制、股份制和外资参股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改革后的俄罗斯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拥有 329 家企业机构，包括科研单位、核武器综合体企业和世界上唯一的核破冰船队，就业人数缩减至 25 万人。^①在国家集团公司的领导下，核工业发展的成就显著。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核电占全俄发电总量的 18.3%，出口居世界首位，在 12 个国家建设了 33 个发电机组；浓缩铀产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36%，居世界首位；核燃料生产占世界市场的 16%。^②

转型和重组后的核工业部门生产多元化，具体涉及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研发、制造、生产核武器，以及拆卸、销毁核武器。二是发展核电，在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新建核电站，满足俄罗斯对电力的需求，并出口国外。三是核燃料循环，包括从铀矿的开采到浓缩、从核电站使用核燃料到处理并掩埋核废料的全过程。四是关于“军转民”工作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该领域的产品可以大量出口。

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情况具体如下：

在企业组织形式方面，乌拉尔地区核工厂主要是联邦单一制企业，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属于俄罗斯联邦政府，经营权则完全商业组织化或私有化，仅在国防生产中保留国有经济的优势地位，收益一部分留在工厂，一部分上缴政府。只有乌拉尔电化综合厂采用的是私有化程度更高的开放式股份制公司，因此它的相关数据更公开。

在企业的生产方面，乌拉尔电化仪器综合厂仍是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重要的国防工厂，它是俄罗斯生产武器级铀的最大工厂，约占国内总量的 50% 以上。它最大的市场价值是生产低浓缩铀，满足核电站对核燃料的需求，低浓缩铀的出口占同类产品的 80% 以上。^③其实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该厂就大量出口低浓缩铀，在新的历史时期出口量继续增加，与美国、法国、英国、瑞典、瑞士、芬兰、西班牙、中国、日本、韩国、阿联酋和南非

① Итог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рпорации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Росатом» за 2016 год (публичный годовой отчёт). С.12. <http://www.rosatom.ru/about/>

② Там же. С.12, 22. <http://www.rosatom.ru/about/>

③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2017 (Уральский электрохимический комбинат). С.4-5. <http://www.ueip.ru/Pages/default.aspx>

等 12 个国家合作密切。它还是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从核反应堆中分离和提纯核燃料的最大企业之一，是核燃料循环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与此同时，该厂还尝试研发新技术产品，如机载飞船的电源、卫星通信系统的电源、耐低温电池、圆柱形密封蓄电池、高效净化过滤器和民用合成复合材料等，其研发的产品性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2015、2016 和 2017 年它的各项生产和销售的总收入分别是 213.29、229.08 和 238.81 亿卢布，纯收益分别是 58.76、64.31 和 58.61 亿卢布。^①可见，近三年来它的总收入呈上升趋势，但受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纯收益的增长有波动。

灯塔综合厂的首要任务，仍是要满足国家对核武器的需求，完成军事订货；综合厂还是俄罗斯保存裂变材料的重要仓库，可容纳 5 万个集装箱的武器材料。与此同时，还实现了生产的多元化，创造经济效益。第一，核反应堆辐照核燃料的再生产。自 1997 年始，参与俄美合作实施的《高浓缩铀-低浓缩铀计划》，化学冶金厂将从核弹头中提取的高浓缩铀稀释成低浓缩铀出口到美国，用作核电站的燃料。第二，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该厂可以生产数千种电离辐射源、光源、热源和放射化学制品，这些产品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农业、医学和科研等领域。其同位素产品的质量得到了俄罗斯国内外客户的认可。目前综合厂是电离辐射源的最大供应商之一，同位素总产量占俄罗斯市场份额的 50% 以上，其生产的同位素产品 95% 用于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20%。^②第三，仪器制造。综合厂还生产仪器设备，可以为自家工厂乃至国内外的核电厂生产复杂的机器设备、部件和配件等。第四，生态活动。可以处理企业的液体放射性废物，企业的工业用地和卫生防护区的防辐射污染，填埋固体放射性废弃物。

电化仪器综合厂的主要活动是根据国家订货生产专用设备，为各行业生产民用产品，是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最大的多元化企业之一。目前其研发和生产的有竞争力的民用产品有：第一，制造仪器和设备；制造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设备，如，气体焊接设备、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维修设备；

①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2017. С.2, 15. <http://www.ueip.ru/Pages/default.aspx>

② 灯塔综合厂官方网站和相关著作中缺乏最新数据，所以引用数据较旧。Файков Д.Ю. Закрыты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Атомные» города. Саров, ФГУП «РФЯЦ-ВНИИЭФ», 2010. С.103.

生产高压气体绝缘设备，如，焊接和气体切割设备；为地理研究所生产真空和充气中子管。第二，生产同位素产品；生产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的 29 个化学元素近 200 个稳定同位素，其生产的稳定同位素占同类产品世界市场份额的 60%。^①第三，生产医疗设备；研制的“西伯利亚-H”是新一代的放射医疗设备，可以用于诊断呼吸系统疾病、颅脑损伤等疾病，为患者提供辐射安全；研制和生产用于检查胃肠道疾病的“胶囊内镜”小型医疗仪器，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检查胃镜和肠镜不能观察到的区域。目前掌握该技术的只有 4 个国家，除俄罗斯外，还有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相较于其他国家，俄罗斯“胶囊内镜”拥有相当大的价格优势。这些产品和设备出口美国、中国、波兰、保加利亚、法国、埃及、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 9 个国家。该厂最主要的客户仍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不断接受大量的国防军事订货。目前，它仍是俄罗斯核武器综合体的龙头企业。

仪表仪器制造厂可以进行多元化和综合性的生产，生产微电子设备、电子自动化设备以及复杂的特殊设备。制造厂从事各种类型的工业品的生产和制造，包括制造冷冲压、机械加工、电力装配、焊接工具、实验室测试和计量等设备，以及真空封闭装置，还生产涂料、塑料等产品。在某些领域该厂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如独特的离子喷涂技术，许多教堂的穹宇就是采用该技术进行喷涂，例如赫拉姆教堂。在积极从事民用生产的同时，还采取措施扩大国防军事订货。目前仪表仪器制造厂仍是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重要的国防工厂，主要任务是批量生产、测试、运输和维护核武器及其部件；拆卸核武器，及对其部件再利用；生产常规武器部件。

全俄技术物理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发生变化，不再是研发新型战略和战术型核武器以增强国家的核实力，而是维持现有核武器的正常生产，新武器的研发工作实际上已经停止，特别是在缔结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在核武器生产和研发规模大幅下降的条件下，研究所的活动内容开始多样化，包括促进核能和热核能的和平利用，开展气体动力学和基础应用研究，解决高能量密度物理学问题等。2005 年以后，它开始向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

^① Кузнецов В.Н. Атомные ЗАТО Урал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Ч.2. Екб, Бан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2016. С.114.

展，发展电脑射线摄影技术、分割钻石技术、超塑性的辗压技术等。2006年，研究所研发的第一批电脑射线摄影技术，在车里雅宾斯克地区的肿瘤中心得到应用。目前，全俄技术物理研究所致力于发展核燃料循环技术、核医学等技术，它仍是俄罗斯两大核科研中心之一。

总体来看，俄罗斯联邦时期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整体上是苏联时期的延续。俄罗斯联邦政府继承并保留了苏联时期重要的核工业部门，核工业部门在乌拉尔地区集中分布，也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型和重组方案的实施。核工业部门通过生产领域的军转民、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自筹引进资金、国家扶持和国际合作等措施和手段，已经逐步摆脱困境，过渡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这些核工厂和科研机构为了生存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大量的商业化生产，但仍维持基本的军事生产，目前位于乌拉尔地区的这5座核工厂和科研机构，仍是俄罗斯联邦原子能国家集团公司核武器综合体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赶超型模式下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得失

苏联核工业发展成就斐然，然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世人对其认识产生巨大分歧：一种是从政治学视角出发，强调核工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大部分西方学者持此类观点；另一种是从历史学视角出发，强调核工业发展在国家科技、大国博弈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大部分俄罗斯学者持这种观点。这种巨大的分歧和误解，引起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重视，因此组织编辑了《苏联核计划：文献资料》。俄罗斯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也是本文写作的重要史料支撑。下文旨在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基础上，对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得失进行客观评价。

（一）乌拉尔核工业发展之得

整体而言，在赶超型发展模式下，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的成就显著，主要表现在：

第一，形成了核武器综合体。1945-1949年间建成了利用各种方法制备

核材料的工厂。在亚欧大陆上建立了第一个工业核反应堆——铀-石墨反应堆。研发出从辐照铀中分离出钚，以及放射性物质处理和长期储存的方法，为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足够的武器级钚-239。与此同时，还建设了用气体扩散法、电磁法分离同位素铀的工厂，为苏联第一颗铀弹提供了足够的武器级铀-235。第一颗原子弹实爆之后，还新建了重水反应堆、热核武器研发中心、热核材料生产厂和仪表仪器厂。可以说，没有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这些成就，苏联就不可能研制出第一颗钚弹、第一颗铀弹和第一颗氢弹。

在短短的几年间，乌拉尔地区新建了5座核保密城市，分别是车里雅宾斯克-40、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4、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5、兹拉托乌斯特-36、车里雅宾斯克-70。几乎每座核保密城市都建有备用地：车里雅宾斯克-40的备用地是托木斯克-7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4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45；兹拉托乌斯特-36的是奔萨-19；车里雅宾斯克-70则是阿尔扎马斯-16的备用地。乌拉尔地区成为苏联的核工业中心和新式核武器的锻造车间，发展成为核武器综合体。

第二，凝聚了一批高水平的核科学家，成为人才聚集地。核工业部门采用赶超型、全面动员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选拔了大批科技精英，集中了高度专业的生产人员。核保密城市的居民受过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比重较高，其职业结构中，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所占比重较大。20世纪50至60年代，乌拉尔地区核保密城市中，每100名工作人员中约有30名工程师，是全苏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①到90年代中期，乌拉尔地区核工业部门有24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8名通讯院士、670名博士和4500名相关行业的副博士。^②这些科技人才掌握了生产裂变材料的高超技术，研发出了适用于各种结构的核材料，后续在研制弹道导弹的核弹头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核工厂和科研机构所在地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4年3月17日颁布的法令，第一批核工厂所在地升格为城市，817综合厂、813综合厂、418厂和933厂所在地分别为奥焦尔斯克城、新乌拉尔斯克市、列斯诺伊城和三山城。根据其

① Мельникова Н.В. Закрытый город: население и его менталитет (1950–1960-е годы). Екб, УрО РАН, 2001. С.16.

② Михайлов В.Н.и др.(Сост.) Атомная отрасль России .М., Издат, 1998. С.228.

1957年5月的法令，第1011研究院所在地也升格为城市，名为斯涅任斯克城。核工厂和科研机构为这些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这些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的小村镇，发展成为一个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完善、福利待遇好、物质生活条件优越的现代化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的“模范城市”。

表现之一是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住房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在核工程建设初期工作人员的住房条件较差，只能住板棚、营房和杂物间，但到20世纪60年代，乌拉尔地区核保密城市的住房问题已经不再像国内其他城市那样严峻，80年代中期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人均住房面积也略高于全苏平均水平。例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4在1975年人均住房面积是全苏平均水平的105.2%、1976年是105.9%，1977年是106.4%。^①住房条件也得到改善，从营房式住房变成独立公寓。

表现之二是教育条件好。核保密城市发展初期，一直存在幼儿园和托儿所短缺的情况。自1948年以来，开始划拨专项资金建设学校，到50年代中期，教育条件明显改善，走在全苏前列。乌拉尔地区的核保密城市提前10-15年普及中等教育。此外，这些地方还以函授、夜校等形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表现之三是医疗卫生条件好。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居民的平均寿命长。就出生率而言，1950-1954年核保密城市为50.4‰，全苏是26.4‰；就死亡率而言，1950-1954年核保密城市的是6.3‰，全苏是9.4‰，乌拉尔地区则是10.0‰，1987-1991年三者分别是7.7‰、10.4‰、10.4‰；就平均寿命而言，1958-1959年核保密城市的是72.1岁，而全苏是68.6岁，1979-1980年两者分别是72.2、67.9岁。^②乌拉尔地区核保密城市出生率和人均寿命高于全苏平均水平，死亡率低于全苏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核保密城市内拥有良好的卫生条件、较高的医疗水平。

表现之四是福利待遇好、生活条件舒适。当然实现这种优越的条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由建筑单位负责粮食和工业品供应，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设者和生产工人的食物供应仍旧不足，特别是面包缺乏。于是在附近的城市建设了一批面包厂以保障供应，还采取其他方式补给食品供

① ЦДООСО. Ф.5459. Оп.18. Д.44. Л.72. 转引自 Рисков С.А.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закрытых городов Урал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1940-х-середина 1980-х годов). С.51.

② Новосёлов В.Н, Толстиков В.С. Тайны «Сороковки». С.402-403.

应。例如，建筑单位成立了由士兵和囚犯组成的专门旅，负责采摘野生水果、酸模、幼荨麻、浆果、蘑菇等。后来成立了商品粮供应处、工人生活用品供给处、综合生活服务部等食品和贸易服务机构。1948年，为保障企业工人食品供应，把附属农场的蔬菜、肉类和牛奶产量的一半分给核保密城市，到50年代，核保密城市的人均食品消费量稳步增长，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和车里雅布斯克州的2-2.5倍。汽车、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也进入核保密城市居民的家庭。除此之外，核保密城市的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市内建有剧院、电影院、图书馆、体育馆、文化宫和俱乐部等。

第四，保障了苏联在与美国的核军备竞赛中立足于不败之地。苏联发展核工业是在冷战背景下进行的，为了在核武器研制领域赶超美国，苏联不计成本地建设本国强大的核工业。40年代末50年代初苏联打破美国的核垄断，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苏联的核潜力发展最为迅猛，到70年代中期苏联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基本上赶超了美国，成为苏联与美国博弈的有效手段。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政治军事超级大国，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拥有强大的核工业和超强的核实力。

此外，核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兴产业和部门的出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局部或总体转型。如，仪表、仪器制造业获得巨大发展，电力技术迈出了重大步骤，火箭技术、空间技术、核能的和平利用等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二）乌拉尔核工业发展之失

乌拉尔地区核工业发展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国家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投入。可以说，苏联在拥有核武器使自己变为超级大国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一，核工业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乃至社会领域“争夺”了大批资金、人才和资源，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的很多资源也都用在了发展核工业上，使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和人民群众像对流血的战争一样为之倾尽全力地付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进步。核计划的参与者А.П·亚历山德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院士指出，“战后初期，我国人民所经历的那些困难，很大都程度都是因为要动员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去发

展核工业，主要目的是为了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核武器。”^①

美国在实施曼哈顿计划的过程中耗资巨大，而作为追赶方的苏联不得不在核武器的竞赛中积极追赶，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就从业人数而言，根据 1945 年美国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有 12.5 万人参与了曼哈顿计划；据 1949 年苏联的统计数据，仅参与核工程建设的劳动力就达 23.425 万人，^②其中参与乌拉尔地区核工程建设的人数达 9.19 万人^③，约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二。从事核武器研制、运输、储存的有关工作人员也有数十万之众。可见，在从业人数方面，苏联核计划远远超过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就资金投入而言，众所周知，美国曼哈顿工程花费了 20 亿美元，而苏联核计划的造价目前还没有公布，只公布了一些个别工程项目和综合厂的数据。根据历史学家 H.C·西蒙诺夫的估算，1947-1949 年间苏联核计划的开支总额约为 145 亿卢布。^④其中基建资金为 57.22 亿卢布，^⑤乌拉尔地区约为 20.93 亿卢布，^⑥几乎占一半。如果以苏联官方 1936 年公布的汇率 1 美元等于 10 卢布来计算，美国曼哈顿工程项目的花费要高于苏联核计划的拨款。但这笔支出对于国力强盛的美国和战后百废待兴的苏联而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要知道，战后苏联的经济和生产技术潜能相比美国而言仍然较低，苏联必须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和社会其他领域“争夺”资源。

为了保障核计划所需的庞大资金，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特殊的金融政策。战争结束之后，1945 年第四季度政府新增战时公债，向民众征收了 4

①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А.П. Наука - стране: Статьи 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 Наука, 1983.

②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736.

③ 笔者根据资料计算得出的数据。См.: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4. С.737-738.

④ 这是历史学家 H.C·西蒙诺夫统计的数据，其准确性有待商榷，因为苏联核计划所需资金是通过国家银行以“国防委员会特殊经费”的名义划拨，没有计划和预算，因此难以准确计算。再加上直到目前仍有很多文件尚未解密，所以这一数据还有待考证。См.: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у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 РОССПЭН, 1996. С.242.

⑤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II ,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5. С.673.

⑥ Чубукова М.А.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ы участия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1941-1949 годы). С.123.

亿卢布。^①斯大林之前承诺的降低粮食价格，非但没有兑现，反而在 1946 年 9 月粮价上涨了 1-1.5 倍。^②为了保障核计划的实施，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不得不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可以说，战后苏联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朝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进行的，而是以人民的生活条件为代价进一步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核工业的发展还需要国民经济的其他企业付出牺牲。1946 年 4 月 9 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特殊工作”的物质技术保障制度》的第 806-328cc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各部委从 1946 年第二季度开始，以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切资源为代价，为“特殊工作”提供物资、技术保障，不论这些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需求；该法令还规定，要满足“特殊工作”所需的一切金属、燃料、材料、设备、仪器、车辆、工业品等物资和设备的优先供应和运输，不管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对这些资源的需求如何迫切，都要优先满足“特殊工作”的需要。^③这一决议是当时核工业赶超型发展模式的生动体现。所有这些都表明，为发展核工业所动员的物质资源是空前的，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

第二，乌拉尔地区核工业的发展危害了数万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后果，对该地区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核工厂发展初期，许多工作都具有实验性的特征，生产流程比较陌生，再加上操之过急，以及技术的不完善，以致核工厂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最初的几年都要承受过度辐射。1944-1945 年美国核工厂的生产人员承受核辐射的允许剂量为 0.01 伦琴/天，而 1947-1948 年苏联的剂量是 0.1 伦琴/天，是美国的 10 倍。^④

尤其是 817 综合厂，污染最为严重。它在运行初期没有按照现代生态和技术要求进行操作，生产技术过程不完善，尤其在核废料的储存问题上。为了储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级放射性残渣，建立了专门储藏室（被称之为 C

① РГАЭ. Ф.1562. Оп.329. Д.2261. Л.21-22.转引自 Быстрова И.В. Советский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1930---1980-е годы).С.236.

② Зима В.Ф.Тупики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1945---1953гг.)//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 Мосгорархив, 1995. С.169-170.

③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II, Атомная бомба, 1945-1954. Книга 2. С.207-208.

④ Гровс Л.С. Теперь об этом можно рассказать: Пер. с англ. М., Атомиздат, 1964. С.93.

工程），每年可接收 1.5 万立方米的残渣。须知，仅 1 吨铀块再加工就需要 12 吨浓度为 65% 的硝酸、56 吨工业用水、2000 吨冷却设备用水和 50 吨蒸汽等。^①因此，C 工程完全不能满足储存的需要，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最终，1957 年 9 月 29 日，C 工程的一个分支发生了爆炸，这就是著名的克什特姆核事故。该事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秋明州的大部分地区和大量居民，受到核辐射污染。

为了尽快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加快核材料的生产，苏联国家最高领导层甚至批准放射性废物排放到捷恰河和卡拉恰伊湖等开放性水域。1947 年 6 月，第一管理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了 4 次会议，决定最初三四年将没有经过任何净化处理的放射性废弃物排放到开放性水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的放射化学家 Н.Е. 斯塔李科 (Старик) 和 С.З. 罗津斯基 (Рогинский) 指出，美国把放射性液体废弃物排放到水量大、水流急的哥伦比亚河之后放射性核素被稀释；苏联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将放射性核素排放到捷恰河，通过捷恰河将放射性核素的浓度稀释到可接受的水平。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捷恰河上游河底有大量的沉淀物，只有到春季泄洪和克孜勒塔什湖排水时，捷恰河的放射性沉积物才能被冲走，沿着伊谢季河、托博尔河和鄂毕河进入北冰洋。1951 年 10 月，放射性废物不再排放到捷恰河，而是排入卡拉恰伊湖，排放到卡拉恰伊湖的放射性废弃物产生的辐射剂量达 1.2 亿伦琴，几乎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 3 倍。^②

要想消除捷恰河和卡拉恰伊湖的放射性污染，需要耗费数万人力、耗费数年的时间和巨额的资金。因此，政府长期对此采取“沉默”政策，致使局面恶化，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污染。直到 1963 年 8 月 5 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之后，苏联科学家才开始着手研究减少核辐射的方法，政府引入一些限制机制和采取人口迁移等措施尽量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核工业企业都会产生核污染，933 厂、第 1011 研究院和 814 厂（后来的 418 厂），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放射性污染。

① Сохина Л.П.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радиохимического завода ПО «Маяк». Озерск, Типография ПО «Маяк», 2001. С.43-44.

② Там же. С.45-46.

（三）得不偿失，还是失有所得？

综上所述，核工业的发展有得也有失，那么应如何客观地评价核工业的发展呢？是得不偿失，还是失有所得？

众所周知，苏联启动核计划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仅在 1946–1949 年间，美国就针对苏联制定了以下核打击计划：打算在 1946 年实施“品捷狗”计划（又称“钳形攻势”），使用 50 枚核弹对苏联的 20 座城市实施轰炸；在 1948 年实施“西泽尔”计划（又称“致命的灾难”），使用 133 枚核弹对苏联的 70 座城市实施轰炸；在 1949 年实施“探空仪”计划（又称“瞬间打击”），用 300 枚核弹对苏联的 200 座城市实施轰炸。^①尽管这些计划没有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但它表明美国企图使用原子弹攻击苏联大型工业中心，以剥夺苏联在新战争中的一切反抗机会，让苏联感受到了威胁。面对美国这种真正的核威胁，苏联政府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尽一切可能，加速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这些不良后果是苏联与美国进行博弈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毋庸置疑的是，苏联政府在决定启动核计划时，已经完全做好了付出这种代价的准备，在核工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国家领导层的行事原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在付诸巨大代价的同时，苏联达到了预期战略目标。从 1950 年开始，苏联已有能力批量生产核武器并且产量逐年增加。7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拥有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数量一直领先于美国，苏联不仅可以防御美国的进攻，而且还可以对美国实施“关键性的核打击”，不仅使美国的核威慑丧失威力，而且还可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苏联不是以损害人体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核工业的唯一国家，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成功研制出核武器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的。要知道，即便是美国，在实施核计划的过程中，军事和政治目标也高于道德和生态目标，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美国学者也质疑“美国在研制核武器上的付出是否值得？”，他们试图通过计算 1940–1995 年间美国的核武器花费和收益得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但迄今仍没有得到答案。

① Михайлов В.Н. и др. (Сост.) Атомная отрасль России. С.4, 231.

【Abstract】 Stimulated by American nuclear deterrence, the Soviet Union quickly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nuclear program and adopted a catch-up development policy. Quite soon, resources and talents with the best technological potentials at that time were allocated in developing the nuclear industry. Due to its geographical,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ical talents, the Ural region has rapidly become a nuclear industrial cen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uclear industry in the Ural region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t the initial stage (from August 1945 to August 1949) the main task is to produce nuclear materials for the first atomic bomb. From September 1949 to the mid-1950s, it is the stage for improvement, the nuclear-weapon complex began to take shape. At the mature stage (from the late 1950s till the end of the 1980s), the nuclear weapon complex almost achieved its perfection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Through the catch-up development model, the Soviet nuclear industry has achieved breakthroughs in a short-term, from scratch, from weak to strong,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types, finally breaking the U.S. nuclear monopoly and gradually realizing its political goals of checks and balances while gaming with the U.S.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the nuclear industry in the Ural region has gone out of the predicament after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Although the 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 triggered negative evaluations towards the Soviet nuclear industry, yet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even when the U.S. implemented the Manhattan pla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goals are still prior to moral and ecological goals.

【Key Words】 U.S.-Soviet Relationship, the Ural Region, Soviet Nuclear Industry, Russian Nuclear Industry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д стимулом ядерного устрашения США, СССР срочно решил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тал проводить догоняющую и перегоняющую политику яде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реализацию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е время подключились все вид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труд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и финансовые средства. Уральский регион,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ему преимуществу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природным ресурсам,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базе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персоналу, быстро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ядерны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центр.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атом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а Урале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в три этапа. С августа 1945-го г. по август 1949 г. — начальный этап. Главным 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являлось созда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для успешного испытания перв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С сентября 1949-го г. до середины 1950-х гг. — этап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когда начал складываться ядерно-оружей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ЯОК). С конца 1950-х до конца 1980-х гг. — этап зрелости. ЯОК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лся и становился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ПК). В рамках модели догоняющего и перегоняю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ая атом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достигла больших прорывов за короткий срок, из слабой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сильную, от обладания одним оружием перешла к обладанию многим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рушив ядерную монополию США, 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игры с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я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цель сдержек и противовесов. В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атом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на Урале вышла из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посл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авария вызвала отрицательную оценку советской атом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днако даже в США пр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Манхэттенского плана воен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преобладали над этическими и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Американ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Уральский регион, советская атом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том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外语战略简析*

万青松 万秋波**

【内容提要】从大国成长经验来看,构建本国特色的外语战略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历来受到世界大国的重视。迄今俄罗斯已经构建起一整套外语战略体系。俄罗斯外语战略的演变历程,包括粗放型发展期、初步形成期、基本成型期和现代化升级期等四个发展时期,其累积的经验对我国从战略层面整体规划中国特色外语战略,提升国家外语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外语战略 俄罗斯外语政策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5-0143(30)

战略作为一种调动力量与资源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①,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其中也包括语言战略。有中国学者将语言战略界定为:国家对语言全局性的谋略、方案或对策。^②一般来说,语言战略主要由语言

* 本文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科研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项目“俄罗斯的外语政策及其对中国构建大国外语教育战略启示研究”(项目批准号:WYZL201606)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委托课题“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特色外语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WT13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蒲公英副教授在搜集部分俄语材料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帮助,同时感谢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万青松,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湖南省俄罗斯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特聘研究员;万秋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201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① 李少军编:《国际战略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② 戴炜栋:“立足国情,科学规划,推动我国外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外语界》,2009年第5期,第2-9页。

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等方面构成。^①语言规划通常指国家层面的宏观设计与安排；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和规定^②；语言教育则是指选择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不同语言进行专业教学与培养。在语言战略三大组成部分中，语言教育构成实施国家语言战略较为关键的一环。

根据语言的类别，可将国家语言战略具体划分为本土语言战略与外语战略。其中，外语战略越来越多地占据突出位置，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各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主要（全球性与地区性）大国纷纷制定并实施国家外语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外语能力。比如，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相继出台了《高等教育法》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9·11”事件后，美国国防部还颁布了《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和《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将外语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安全与战略高度。^③英国教育技能部先后颁布了《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语言学习》和《全民的外语：生活的外语——外语教育发展战略》等重要文件^④，致力于促进英国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拓展和交流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于2013年发布《面向未来的语言》的专业报告，列出未来十大关键语言。^⑤日本也发布重要政策文件《21世纪外语教育战略构想》，全面具体规划21世纪日本外语教育政策的改革方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亲自负责外语教育战略的调研、制定、实施和调整，通过教育审议委员会以及各都、道、府、县教育部门，切实贯彻外语教育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已经形成了从

① 蔡永良：“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外语界》，2011年第1期，第8-15页。

② 蔡永良：“论美国的语言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94-202页。

③ 季舒鸿：“美国外语教育战略演变与现状分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87-91页。

④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of Great Britain, “Languages for All: Languages for Life, A Strategy for England”, <http://arts.ulster.ac.uk/nils/admin/documents/docs/DfESLanguagesStrategy.pdf>

⑤ British Council, “Languages For The Future, Which languages the UK needs most and why”, November 2013,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languages-for-the-future-report.pdf>

上到下的合力。^①

作为中国最大邻国和重要战略协作伙伴，同时曾经也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俄罗斯，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同样重视本国外语能力的提升，深刻意识到外语在推进国家对外交流和发展、捍卫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完善，迄今俄罗斯已经构建起一整套外语战略体系。本文大体将俄罗斯近千年来的外语战略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考察，包括粗放型发展期、初步形成期、基本成型期和现代化升级期，重点涉及不同时期的外语规划、外语政策和外语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一、粗放型发展期：缺少完整意义上的外语战略

粗放型外语发展期主要涵盖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两个时期。总体而言，这两个时期内，完整意义上的外语战略还没有出现。虽然国家在政策方面给予一定支持，但尚未对外语发展进行规划，专业外语教育体系也没有构建起来，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表现出不定期的特征，比如，基辅罗斯和莫斯科公国先后开设多所外语教学机构，多数情况下由于条件所限，不得不关闭或处于停止运行状态。自15世纪开始，得益于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重视，外语教育开始为国家行政机构（波索尔院和外交衙门^②）培养翻译人才，但成效并不显著。

（一）发展外语教育

俄罗斯的外语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斯时期，主要体现在自学外语方面。古罗斯时期，真正的外语教育还没有出现，而懂外语的群体更是少之

① 沈骏：“当代东亚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战略特征与趋势”，《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9期，第64-68页。

② 波索尔院（посольская изба）是指14-15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外交事务机关。外交衙门（посольский приказ）是俄罗斯帝国外交部（Коллег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的前身，据史料记载，外交衙门作为俄国主管对外事务的中央政府机关，主要存在于1549年至1720年间。1721年，彼得一世加冕为沙皇后，改称为外交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又少，主要包括古罗斯的大公、教会代表和商人，尤其是很多大公常年外出征战、兼并土地，亲自参与边界领土争端调解、处理贸易问题和签署相关协议，并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北欧国家的公主通婚。这些经历使得他们及其子孙能够自学、并迅速掌握斯堪的纳维亚及其周边地区国家的语言。

基辅罗斯时期，外语教育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外语学习者主要是王公贵族、教会人士、藏书家、商人、手工业者等从事对外事务的代表，最主要的外语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对外语语种的选择主要受到地缘、历史和经贸因素的影响。比如，生活在基辅罗斯南部地区的大公更愿意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则主要用于与东部和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流、谈判。这一时期，大部分正式的对外官方文件都是用这两种语言撰写的，比如，公元 911 年，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签署的第一个条约就是用俄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撰写的。^①外语学习方式主要以家庭教育、学校和修道院教授为主。此外，官方还设立专业的翻译学校，同时派遣学生出国开展语言实践，主要是前往拜占庭帝国进行外语学习和实践。

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征服克里米亚和利沃尼亚以后，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联姻，宣布接受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洗礼”之后不久，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办宫廷学校，主要招收大贵族、大地主家的孩子学习中世纪艺术和科学，其中也包括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据史料记载，这所学校存在的 49 年里，培养了近千名高水平的青年人才，同时，还对本国的国家公务员进行外语培训，^②使得基辅罗斯的外语教育和外语学习逐渐发展并推广起来。随后，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也创办了一所翻译学校，毕业于其父亲创办的宫廷学校的学生成为教师，除教学之外，他们还从事中世纪小说和历史书籍的翻译。^③史料显示，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谢沃洛德（Всеволод Ярославич）掌握五门外语，有力地帮助他拓展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公元 11-13 世纪，基辅罗斯还开办女子学堂，也开设外语教授课程，培养涉

① Сахаров А.Н. Дипломатия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IX –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 в. М., 1980. С.152.

② Антология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и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XIV-XVII веков. / Редколлегия тома: С.Ф. Егоров, Л.Н. Пушкарев, Я.Н. Щапов. М., 1985. С.112.

③ Там же. С.108-110.

外型人才。此外，教会人士在推广外语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随着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联系越来越多，外语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教会人士之间的交流。大批基辅教会人士前往君士坦丁堡学习，不仅要求他们熟练掌握希腊语，还需要学会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这些经过系统学习的教会人士回到基辅罗斯后，多数人从事抄写和翻译所掌握语言对象国的书籍和材料，满足国内民众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迫切需求。^①

这一时期，教授外语的人员主要是熟练掌握外语的人士，包括学员的父母、亲戚朋友、教会人士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知名学士（大贵族、收藏爱好者），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圣经和希腊语、拉丁语书籍。外语的学习形式也相对简单，主要通过阅读背诵+翻译文本的形式来了解句子的语法结构和含义。这种教学模式主要受到 10-13 世纪流行的“自由翻译”的影响，亦即翻译者不必严格遵守原义，只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意译出来即可。^②此外，这一时期，懂外语被视为受过良好教育、有学问，且饱学多识的标志，而会外语的人在国内外同样也受到尊重。可以说，基辅罗斯时期，俄国的外语教育和学习开始发展起来，以它作为纽带，既促进了基辅罗斯与外界的交往联系，同时也使得国家的教育水平得到一定提升。

公元 1237 年，蒙古军队侵入基辅罗斯东北部及其周边地区，随后占领基辅，使得原有的教育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外语教育和外语学习也遭受影响。在此后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期间，外语教育和学习处于中断或者停滞状态。此外，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王公贵族和民众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兴趣逐渐减少，这两门外语教学也主要在少数修道院得以维系。^③

（二）国家层面培养外语翻译人才

15 世纪开始，外语教育得到恢复和重新发展，这主要得益于莫斯科公

① Воевода Е.В. 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на Руси// Средне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08. №.2. С.73-75.

② Сусов И.П. История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М., 2006. С.118.

③ Воевода Е.В.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 XIV-XVI веках//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ласт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Педагогика". 2009. №.2. С.16-21.

国的崛起。随着实力不断壮大，对外交往、贸易联系和跨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莫斯科公国对外语教育与学习的需求也自然增多。比如，与西部国家进行各领域的谈判，迫切需要懂拉丁语（外交通用语）、德语、丹麦语、瑞典语、立陶宛语、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的人才；与东部国家交往的人员则需要掌握突厥语、诺盖语、土耳其语、布哈拉埃米尔语和波斯语。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公国的外交事务机关需要大量的口译（толмач）和笔译（переводчик）人员，其中口译主要负责谈判和交流，笔译则重点翻译谈判文件，并用外语起草条约文件等。这一时期，除少数人掌握外语，能够胜任国家对外交流工作之外，外语人才依然比较紧缺，特别是服务于国家外事活动层面的“翻译官”（драгоман）人数很少。

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雷帝不满这样的现状。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他亲自抓外语人才的培养，要求在莫斯科开设拉丁语和德语学校。遗憾的是，这一倡议最终未能实现。此外，伊凡雷帝还多次派出年轻王公贵族子弟前往国外学习外语，比如，派人到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语，到瑞典学习瑞典语，到利沃尼亚学习德语等，但多数人出国后音讯全无，最后只有少数人能够学成归国。归国者多数从事翻译工作，仅有少数人被委以重任。^①此外，16世纪上半叶，莫斯科公国将外交事务机关“波索尔院”改组为“外交衙门”，该机构有权招纳懂外语的优秀人才为国家服务，旨在满足国家对高级外语翻译人才的需求。到16世纪下半叶，俄国民众对外语的学习兴趣开始呈现增长态势。

17世纪是俄国教育发展取得突破的时代，其中也包括外语教育。随着俄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紧密，外语的实用性越来越强，外语的学习途径也日趋多元化：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在国内创办的学校学习外语。据史料记载，1601-1603年，当时的鲍里斯·戈多诺夫政府派出15-18名贵族子弟前往英国、法国和德国学习外语和其他学科。^②这一时期，

① Савва В. Несколько случаев из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русскими людьм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 в. Харьков, 1913. Похлебкин В.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ус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за 1000 лет в именах, датах и фактах. Справочник. Выпуск I. М., 1995.

② Арсеньев А.В. История посылки первых рус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за границу при Борисе Годунове. СПб., 1887.

莫斯科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是来自波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语、拉丁语教师，他们中有的被富人家聘请为家庭教师，专门给贵族子女教授外语。此外，莫斯科的修道院也开始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和翻译课程，政府也开始设立专业的外语培训机构，希望为本国培养大批翻译人才。1668年，在莫斯科教会人士的请求下，政府还开设新学校，主要教授斯拉夫语、希腊语和拉丁语。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由政府部门设立的外语学习机构主要根据外语学习的时长和需要达到的学习目标而定，一旦完成既定学习目标，学校就被关闭，办学具有非连续性特征。

据统计，1645到1682年间，有约270名翻译（185位口译+84位笔译）在俄国外交衙门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从事笔译的人员需要通过相关的外语考试，从事口译的人员则要求至少掌握两门外语，并通过一门外语笔试。到17世纪下半叶，外交衙门已经汇聚了21种外语的翻译专家，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古希腊语、英语、德语、南德语、法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突厥语、格鲁吉亚语、卡尔梅克语、土耳其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蒙古语、瓦拉斯语（*валашский язык*）。^①在这些语言中，比较受欢迎的是拉丁语、波兰语和德语，其中，拉丁语依然是外交通用的国际语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俄国国内还无法教授东方国家的语言。

彼得一世上台执政和俄国“全盘欧化”改革的推进，使得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继续呈现增长态势，政府不得不加大外语人才的培养力度。1681年，在莫斯科印刷厂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印刷学校（*Типографская школа*），这是俄国近代第一所非等级制的中学，主要教授希腊语，专门为印刷厂和外交衙门培养翻译人才。1687年，在印刷学校基础上筹建了俄国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Славяно-греко-латин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并向社会大众开放，且没有年龄限制。该校的教师是希腊人，同时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希腊语语法、逻辑学、语言艺术和物理等课程。语言学习教程主要由希腊人编写，包括《简明希腊语语法》（*Краткая*

^① Беляков А.В. Служащие Посоль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второй трети XVII века.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 к.и.н., М., 2001. С.10.

гре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希腊语语法详解》(上下两册)(Пространная гре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拉丁语语法》(三册)(Латин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和斯拉夫语版《简明希腊语语法》等。这些教材不仅有助于学生在三年内提升听说读写外语能力,还可以将希腊语、拉丁语材料翻译成俄语。毕业生常常被招录到外交衙门从事翻译工作。这一时期,俄国的年轻人也自发前往基辅、波兰、法国、意大利、荷兰、柏林、普鲁士、萨克森等国家和大城市学习外语,且规模愈来愈大,其中不少人也获得国家的学费资助。^①

由此可见,莫斯科公国初期,宗教在延续外语学习方面起了较大作用。这一时期由于设立专门的外语教学机构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从15世纪开始,莫斯科公国更多地选派年轻人出国学习外语,学成之后回国为国家服务,这也说明外语教育开始受到国家重视。到17世纪,俄国外语教育上升到国家层面,表现在政府出资,选派优秀年轻学员前往国外学习外语,主要出发点是外交衙门培养翻译人才,同时也对其他涉外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外语培养和训练。由于初期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到17世纪中后期,政府又开始大力推动在莫斯科创办专业的外语学校,招募外国人和本国的外语优秀人才作为专业教师。这些学校也由最初仅面向宦官、商人子弟,逐渐开始向广大民众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国外语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二、初步形成期:构建以外语教育双级体系为核心的外语战略

俄罗斯外语战略的初步形成期主要是在俄罗斯帝国时期,大体涵盖1721年彼得一世加冕为沙皇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为止的这段时期。这一时期是俄罗斯外语战略初步形成并逐渐完善的阶段。一方面,国家开始从宏观层面对外语教育发展进行设计与制度安排,并根据国家对外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扩大教授外语语种的数量,提升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

^① Савич Н.Г. 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русскими в XVII веке// Сб. стате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82. АН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Галкин А. Академия в Москве в XVII столетии. М., 1913. Кессельбрэннер Г.Л. Известные дипломаты России: От Посольской избы до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 450-лети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лужбы России /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А.В. Торкунова. М., 1999.

以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专业教育为主的双级外语教育体系被构建起来，主要任务是为沙皇国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培养高级翻译人才。在中等外语教育方面，政府不仅在国内主要大城市开设长期制的中学外语专业，同时也在驻外使团或传教团设立中等外语教育学校，培养青年外语翻译人才；在高等外语教育方面，俄罗斯帝国在其外交部建立起第一所直属的高等专业学府，培养高层次的外语翻译人才和研究型专家。此外，除外交部直属的东方语言教学部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外，其他学校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必须通过高级外语口试和笔试之后，才能被招录到外事部门工作。

（一）重视中等外语专业教育，扩大外语语种数量

通常而言，外语发展与国家对外交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密切关系。18世纪的国际关系变化为俄罗斯帝国外语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时期，俄国向里海、黑海、乌拉尔地区进行对外扩张，与位于本国西部和西南方向的奥斯曼帝国、东南方向的波斯等帝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同时与周边邻国的政治、经贸、人文交流也非常密切，这些因素使得外语教育在沙皇俄国受到格外的重视。由于包括对外经贸合作在内的所有对外联系，都由俄罗斯帝国外交部^①掌控，因此，外语人才和专家的培养也属于外交部的管辖和工作范畴。年轻人既可以直接在外交部所属的专业学校进行外语学习，也可以在驻外使团或传教团开设的学校学习外语。国内创办学校的外语教师一般由外交部资深翻译直接担任或聘请其他知名教师授课，教学与实践材料主要是外交部非涉密的官方文件。

这一时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前往国外学习外语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和商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掌握外语对于今后的职业发展尤为重要。俄罗斯帝国也开始选派年轻贵族子弟前往欧洲国家学习外语，学成之后在外交部被委以重任，并派往欧洲国家担当驻外使团的领导职务。这就对外语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不仅仅掌握语言，还要掌握语言学习对象国的基本国情知识，同时具备跨文

^① КИД（Коллег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是俄国外交部18世纪的俄语名称，19世纪初改为现在的俄语名称 МИД（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化交际能力。^①如果学员无法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将被解职。1717年，俄国向东普鲁士派出33人组成的学生团，主要学习德语、法语和拉丁语。1765-1767年间，沙皇先后向英国牛津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和德国的大学派出13名大学生，前往对象国学习语言、哲学、历史、地理、数学、神学等课程，随同前往的还有学监（инспектор），旨在监督这些学生的学业和生活情况，随时向外交部汇报，同时就这些学生的学习情况提出具体的应对政策建议。^②这种监督管理体系的构建，显示出沙皇俄国对派出学生学习外语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奥地利结成同盟，让德语在俄国民众中流行起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接下来的拿破仑战争又使得民众对法语的学习兴趣大增。彼得堡开设了专门的法语和德语学校，大学也开始设立法语和德语课程。到19世纪初，法语甚至成为欧洲国家的外交语言。

从18世纪起，俄国加大了对东方国家的关注力度，其中包括与清朝政府的交往。沙皇外交部开始选派本国大学生跟随驻外使团或传教团开设的学校学习东方语言，比如，俄国使团在君士坦丁堡设立学校，在北京也有供传教团活动的俄罗斯馆（1694年由康熙皇帝设立），旨在满足国家对东方语言（汉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人才的迫切需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所开展的教育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俄两国早期关系发展与文化交流，同时也对俄国初期的汉语、满语和蒙古语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俄罗斯第一批汉学家即诞生于此，它甚至被誉为“俄国汉学家的摇篮”。^③早在17世纪中后期，随着俄国不断东扩，中俄之间围绕边界等问题的谈判接触越来越多，由于语言不通，通常以国际通用的拉丁语作为交流语言，中俄签署的首个官方文件《尼布楚条约》就是拉丁

① Воевода Е.В. Иноязычн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ов в XVIII веке// Вестни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управления). 2009. №32. С.28-30.

② Воевода Е.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языкового обуч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для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Языковой дискурс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рактике.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Тверь, 2009. С.46-51.

③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代表性的著作可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阎国栋：《俄国汉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2008年；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俄]阿夫拉阿米神父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柳若梅（译），郑州：大象出版社出版，2016年。

文本。为此，俄国政府决心派人学习满语和汉语。1700年，彼得一世下令让基辅都主教挑选一名托博尔斯克都主教，同时带上两三名善于学习的年轻修士学习汉语和蒙古语，熟悉中国文化。^①这是官方在学习汉语、蒙古语方面的最早尝试。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中俄之间无战事，总体上保持和平共处，但边界纠纷、蒙古逃人、商贸谈判等问题长期不断累积，到康熙朝后期，已经成为两国需要谈判和解决的问题。^②公元1728年（清雍正六年），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的指令下，俄国与清朝政府正式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不仅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蒙古北部），开恰克图为贸易口岸，同时还准许俄国人在北京设立教堂和学堂，派遣教士和学生来华留学，主要学习中文、满文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考察国情、社情。据此协定，俄方选派6名14-18岁懂拉丁语的学生来华学习汉语、满语，通常学习年限为8-10年，所使用的教材是中国教师或俄国人自己编写的汉俄、满俄语言材料。这些先后前来北京俄罗斯馆学习的学生，期间有因生病、生活、天气原因中途退学或者去世的，也有因学习能力问题申请放弃学业的，还有因性格顽劣、惹是生非到最后辍学的，剩下的学生学成回国后，要么在外交部从事翻译工作，要么在大学担任教师，要么在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从事翻译和学术研究工作，要么从事中俄商贸活动，要么在边境地区国家机构供职，更有优秀者成为沙皇帝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据统计，从1727年到1860年签署《中俄北京条约》的一百三十多年间，沙皇俄国总共向中国派出14批留学生，每次3-6名不等，与每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随行，并接受他们的领导和管理。沙皇此举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通晓这两门语言的翻译人才和汉学家，同时具备较高的听说读写译语言能力，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基本国情。之后的历史证明，俄国此举造就了首批出色的满语、汉语翻译人才和高水平的汉学家，俄国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开始

① 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第130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里面有相关的记载，参见马长泉：“康熙、雍正两朝中俄划界原则探析——以《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0-148页。

诞生，并逐渐在世界上占得一席之地。^①

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也开始尝试在本土培养通晓东方国家语言的外语人才。1725年，俄国在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开办第一所蒙古语学校，旨在促进布里亚特人和其他蒙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商贸联系。1739年开办了俄国历史上最早的满语、汉语学校，教师是一位叫周戈的中国人。^②这是沙俄帝国时期最早的两次本土办学尝试。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加上存在的时间很短（后者仅存在2年），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和质量都不高，难以培养出优秀的翻译家和专家。正是意识到这样的局限性，俄国政府决定在科学院、外交部和其他重要政府部门开办专业的东方语言学校。1741年3月，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成立满语、汉语学校，聘请知名的汉学家伊拉利昂·罗索欣（И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оссохин，1717-1761）从事汉语、满语的教学和翻译工作。罗索欣此前是俄国第三届驻北京传教团的随行学员，在学期间同时担任清政府理藩院的译员和俄文教习。^③随后，沙皇俄国枢密院发布命令，确定教学内容，包括教授中国文字和口语、讲述中国礼仪等，使用的教材既有从北京传教团带回的材料，也有授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学材料，同时采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遗憾的是，该校在十年之后（1751年）停办，并未实现预期的教学和人才培养目标。此后，俄国外交部也两次开办满语、汉语学校，但都因各种原因，开办时间不长便陷入停办状态。^④

1747年，沙皇俄国枢密院还通过在阿斯特拉罕和基兹利亚尔两城市创办东方语言学校，专门为国家培养掌握卡尔梅克语、突厥语、土耳其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的人才。^⑤1880年，在喀山中学设立了突厥语专业班，此后在奥伦堡和托博尔斯克的主要教学机构也设立突厥语专业班，甚至还在伊尔库茨克中学开设了日语专业班。此外，远东地区形势的发展迫使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再次开办两所学堂，专门培养汉语、蒙古语和满语翻译人才，满足

① 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第129-139页。

② [俄]阿夫拉阿米神父辑：《历史上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柳若梅（译），序言部分，第7页。

③ 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序言部分，第6-7页。

④ 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第140-142页。

⑤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ИД России (АВПРИ). Ф. №.77.оп. 77/1. г. 1752. д. №.6.

各地区边境部门和对外贸易的需要，甚至为可能的战争储备军事人才。这两所学堂招收 16 岁以上的中学生学习东方语言，学制为 5 年。据统计，自 1864 至 1914 年间，在库伦（现乌兰巴托）中学毕业的 85 人中，有 84 人毕业于外语专业。^①到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俄国已经培养起一大批外语翻译人才，既有欧洲国家的语言，也有东方国家的语言，大体上能够满足俄罗斯帝国对外交往的需要。

（二）构建高等外语专业教育体系，提升外语翻译人才培养质量

19 世纪初的国际与地区形势发展迫使俄罗斯帝国改组外交部，于 1819 年正式设立该部直属的第一个二级行政机构——亚洲司（Азиат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以满足与东方国家之间关系快速发展的需要。当然，对东方语言翻译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继续大规模地培养东方语言翻译人才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1823 年 5 月 29 日，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指令，外交部亚洲司正式创建新的教学机构——东方语言教学部（Учеб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旨在为帝国外交部和驻东方国家使馆或使团培养青年翻译人才。这些高水平专家不仅要掌握语言和当地文化，还需要具备进行各种谈判的能力，以便更好地维护俄罗斯帝国的利益。东方语言教学部聘请知名教授担任专任教师，重点培养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现代希腊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突厥语等语言的翻译人才，同时教授《国家法律》、《钱币学》等课程。每位学生都必须学习 5 门语言。1835 年，东方语言教学部被正式确定为俄国外交部有史以来直属第一所高等专业教育学府。此外，该部还与沙皇军部（Военно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合作，开展军事外语人才的联合培养。1885 年，军部与外交部正式签署协议，在东方语言教学部为高加索和亚洲各军区的所有军种的军官开设东方语言课程，重点学习东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军官学员

^① Воевода Е.В.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а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МИД как отражени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динамика Евразии: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атериалы II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рума (1-3 июля 2009 г.) в 2 томах: том I / Под ред. Б.М. Ягудина. Казань: «Intelpress+», 2010. С.138-144.

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最终学员名单由总参谋部（генеральный штаб）确定，每届学员人数不超过 5 人。根据学员的入学考试成绩，划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如果初级班学员申请进入更高水平的班级学习，需要再次通过考试选拔，基本学制为 3 年。到 20 世纪初，军官们学习的语言变为汉语、日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1910 年，该外语培训项目最后终止。据统计，在 29 年里，这一合作项目总共培养了约 130 名掌握东方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军官，在俄罗斯帝国外语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①

在高校系统，1804 年喀山大学正式成立后不久（1807 年）就设立了东方系，开始为外交部定向培养突厥语、波斯语、亚美尼亚语、鞑靼语等东方语言翻译人才。在校长的积极支持下，喀山大学还组建了全俄东方学研究中心，致力于东方国家的研究。1833 年，喀山大学成立了俄国乃至全欧洲第一个蒙古语教研室，1837 年又创办了俄国史上第一个汉语教研室，1844 年又增设满语教研室。由此，俄国本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高水平汉学人才。该校的汉语、满语、蒙古语师资正是来自北京传教团学成归国的优秀学生，后来成为俄国满语、汉语和蒙古语的知名专家和教授。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后，喀山大学东方语言专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学生人数逐年减少，主要原因在于就业比较困难，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工作，汉语翻译的工资报酬也偏低等。在这种情况下，1854 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除喀山大学保留鞑靼语专业外，将俄国其他东方语言教学机构进行合并，成立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至此，喀山大学的蒙古语、汉语教学不复存在，其教师、学生和部分图书馆藏书也转入彼得堡大学。1855 年，尼古拉一世下令在彼得堡大学正式设立东方学系。^②自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东方学系成为俄国专门培养东方语言专家和研究型人才的基地，以及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多数俄国汉学家和其他东方学家均出自于此，该系享誉欧洲乃至全世界。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1827 年，由 1815 年亚美尼亚拉扎里耶夫学校（Армянское Лазаревых училище）改组而来的拉扎里耶夫东方语言学院（Лазаре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主要教授

① Воевода Е.В. Офицерский курс при Учебном отделении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МИ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10. №.4. С.21-24.

② 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第 150-142 页。

亚美尼亚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这是除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之外，俄国培养东方语言专家和高水平外语人才的又一重点教学机构。此后，1898年7月9日，在俄国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汉学中心，即东方学院，重点培养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国家语言的翻译人才和研究专家。据统计，从1898年到1916年，该院总共培养了300多名学生和200多名军官，主要在行政和商业领域从事翻译和教学方面的工作。^①

由此可见，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外语教育发展趋势较为积极，语种的数量不断拓展，特别是东方国家的语言，同时注重外语人才综合能力的培养，也即培养既通晓对象国语言、又掌握对象国基本国情，同时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这一认识一直贯穿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资深外交官认为，专业外语的学习，除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学习语言对象国的文化、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所在区域的总体概况。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构建起了中等和高等两级外语专业教育体系，有力地保障了外语教育的质量和外语翻译人才的培养水平，成为俄国外语教育的新特色。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外语人才培养已经出现新的趋势，产生了新的分工——大学更多地培养掌握语言理论与历史、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型人才，外交部则倾向于重点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突出语言运用和跨文化实践能力。

三、基本成型期： 以构建外语教育三级体系和“走出去”为核心的外语战略

俄罗斯外语战略的成型期主要涵盖1922年苏联成立前后至1991苏联解体这段时期。这一时期，国家层面的外语规划继续延续沙俄时期的传统，随着国家军事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外语政策的制定具有鲜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以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和外语继续教育（高级进修）为主的三级外语教育体系被构建起来，并逐渐成形，主要任务是培养国际关系领域

^① 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第79页。

的外交官、外交翻译人才和其他外交工作人员。对外语人才的培养分工更加明确，中等外语教育重点培养外交部门的办事员（比如，专业的打字员、速记员、文秘等），通常以苏联外交学院为主要培养基地；高等外语教育重点培养职业外交官（新的复合型外事人才），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为主要培养基地；继续教育（高级进修）则重点培养外交队伍的领导型干部，也以苏联外交学院为主要培养基地。与沙俄时期类似，除外交部直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的毕业生可直接进入外交部工作外，其他学校外语专业的学员必须通过高级外语口试和笔试之后，才能被选拔到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工作。

（一）构建三级外语教育体系，培养高层次外语复合型人才

虽然十月革命及之后的内战使得沙俄时期大多数教学机构遭到破坏，但随后的国际形势发展和东方国家内部的一系列变化，比如，日本的现代化、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亚洲国家（中国、印度、伊朗、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促使俄国苏维埃政府采取措施恢复东方国家语言教育和研究，同时为外交官开设专业外语课程，并从大学里选拔年轻专家。

恢复外语培训机构和重组东方语言教学、研究机构成为俄国苏维埃政府在这方面的重要举措。早在十月革命后的 1919 年 11 月，当时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恢复沙俄时期的外语培训传统，开始为新成立的共和国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СФСР）的外交工作人员开设外语培训课程，教授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和波兰语，两年之后，新增丹麦语、罗马尼亚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到 1930 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①要求所有外交领域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外语课程的培训。到 1945 年，外语培训课程的语种数量已经达到 19 种。1962 年，改称为高级外语课程（Высшие курсы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继续为外交工作人员培训外语，提升他们的外语和

^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是 1923–1946 年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1946 年改称为苏联外交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跨文化交流能力。

传统上，俄国大部分的东方学家主要集中在彼得堡大学、拉扎里耶夫东方语言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在外交部下属的东方语言教学部和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也有少量高水平专家。其中，重点教授和研究中东地区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拉扎里耶夫东方语言学院受到特别的重视。1921年，在拉扎里耶夫东方语言学院和其他高校东方语言院系基础上，重新组建起莫斯科东方学学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聘请世界知名的教授团队授课，不仅开设中东地区国家语言课程，还开设汉语、印地语、印尼语和日语课程，同时新增社会、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等课程，重点培养高层次外语复合型人才。除东方语言外，20世纪30年代，德语在苏联开始流行起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语成为苏联最受欢迎的外语。这一趋势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受当时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关系发展的影响。从30年代初开始，苏联先后与西班牙、美国、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等欧美、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迫切需要更多懂这些国家语言的外交官、翻译专家和其他外交工作人才。在此背景下，1934年，苏联正式设立直属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外交与领事工作人员培训学院^①，重点培养苏联外交全权代表（驻外大使）、副领事、武官、顾问等高级外交官的秘书和文员，基本学制为两年。1939年，该院改名为高级外交学校（Высша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并设立西方语言和东方语言两个培训分部，学制分别为2年和3年。二战之前，该校不断拓宽外语培训语种，总共开设23种外语的专业培训班。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苏联的外语教学事业遭受严重考验。战争期间，大部分学校的外语教学被迫中断，直到战后才逐渐恢复起来，并开始完善外语政策和外语教育。1944年，莫斯科大学国际系被改建为独立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简称“莫关院”），首批招收200名学生。两年之后，学院招收第一批外国学生，《对外俄语》^②成为留学生的必修课程。1954年，拉扎里耶夫东方学学院并入莫关院，组建新的教学机构——东方学系，该系教授的

① Институт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консульск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②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ый

东方语言达到 24 种。按照新的学习标准，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两门外语：一门东方语言和一门欧洲语言。^①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苏联对外交往的扩大，包括与几十个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亚非语言专家的需求越来越多，莫关院也开始开设非洲国家的语言课程。整个苏联时期，莫关院总共教授 40 多门外语，并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两门外语，学生还可以选择其他小语种学习，其中东方国家语言受到追捧。此外，在各大中学校也为学生开设课外外语学习课程，可以选择一门东方语言和一门欧洲语言进行学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改称为苏联外交部之后的第二年，即 1947 年，外交部直属高级外交学校开始为苏联驻外机构领导干部开设定期的高级培训课程，每年招收 30 人，学习期限为 9 个月。1950 年，该校转向培养高级外交官（秘书、领事和顾问）。1964 年开始招收国外学员，并开设《对外俄语》课程。1974 年，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该校改组为苏联外交学院（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МИД СССР），进一步培养国际关系领域的高级外交官和外事工作人才，为苏联外交和对外活动的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苏联人民对外语的学习兴趣开始增长，这主要得益于苏联开始对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实行长期的援助项目，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支持这项工作的展开。为此，苏联政府开始设立专业的高级外语学校，主要教授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汉语。

由此可见，苏联时期以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和外语继续教育（高级进修）为主的三级外语教育体系已经被构建起来，这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语教育和外语政策取得了长足发展，并逐步成型。

（二）外语战略与“走出去”相结合

在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外语战略方面，苏联政府还实行“走出去”的对外交流方针，将外语战略进一步置于对外交流实践中，提升国家外语能力。苏联成立初期，在国家层面迫切需要恢复、拓展对外交往。1925 年，苏联中

^① Главы из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Лазаре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 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 МГИМО. Под общ. ред. Академика РАН А.В. Торкунова.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14.

央执行委员会与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专项决议，决定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全苏职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等机构联合组建一个苏联社会组织——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①，其宗旨是通过与国外相关机构、社会组织和科学文化工作者建立并发展科学文化关系，把苏联优秀文化向国外推广，同时将国外先进文化介绍到苏联国内，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最终促进苏联与其他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加深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是苏联首次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对外人文交流机构。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经常性地举办一系列国际展览会，包括国外不同语种的书展，同时组织苏联的艺术团体参加国外的展会与文化艺术节，并邀请国外友好协会和文化团体以及知名的文化活动家到苏联参观访问，比如，苏联知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其著名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就是通过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传播到英国的，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爱森斯坦、艾伦堡等知名人物也都与该协会有过合作关系。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对外交往水平，该协会用英语、法语、德语三种语言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定期发行期刊《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公报》（«Бюллетень ВОКС»），这可以视为早期苏联政府推进外语战略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在积极的外语战略支撑下，苏联先后同新西兰、叙利亚、智利、印度、墨西哥、瑞士、马达加斯加、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多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民间友好协会，到1957年，友好协会数量达到47个，其中包括1949年10月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③1958年，赫鲁晓夫上台执政以后，决定将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改名为“苏联友好协会联盟”^④。该联盟联合了各加盟共和国的对外文化联系协会，以及苏联文化、科技各领域的协会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了解国外的历史、经济、文化、科学、生活方式，密切与国外人民群众的相互联系，加深苏联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互信和相互理解。^⑤之后，该联盟开始频繁地与国外的各个协会开展丰富多彩交流活动。据

① 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ой связи с заграницей

② 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ой связи с заграницей. <https://ru.wikipedia.org>

③ История РЦНК в Париже. <http://www.russiefrance.org/ru/nous/historique.html>

④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обществ дружбы

⑤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публич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http://85let.rs.gov.ru/node/198>

统计，在 1959 至 1975 年间，苏联在海外共开设了 21 家文化中心，分布在波兰、摩洛哥、印度、保加利亚等国家，在 1975 至 1987 年间又新设了 17 家文化中心，其中包括在奥地利、叙利亚、尼泊尔、阿根廷等国。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正是得益于苏联制定的外语战略和长期开展的国际教育政策，其中也包括外语教育政策。

为打造一个覆盖到社会各层次的国际教育网络，苏联专门制定出台了国际教育政策。具体而言，由苏共中央科学与高教部^①、苏联高等教育部、苏联外交部、苏联驻海外大使馆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负责国际教育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苏联外交部和大使馆负责参加国际教育项目的外国人挑选工作，扩大苏联同海外的教育交往，收集资本主义国家在该领域的信息情报。苏联教育部则负责对外国学生和专家的教育及培训工作，同时还直接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秘密收集美国政府在国际教育中的情报信息，以及针对在国际教育领域的竞争做出回应措施。^②在具体实施苏联国际教育政策方面，迄今仍然被外界所熟知的苏联人民友谊大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苏联通过招收来自广大亚非拉地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旨在为这些地区的国家培养更多的能够掌握两门及以上语言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据统计，仅在冷战期间，苏联总共接收了来自 141 个国家的公民参与到其国际教育项目中，其中不乏来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精英。这些精英在之后的对苏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苏联的外语战略还运用到官方的对外宣传体系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25 年成立的苏联通讯社^④，即塔斯社，就是对外宣传的核心机构。除俄语外，该通讯社还使用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五种外国语言，负责对世界 115 个国家发布苏联官方的信息，同时对国外媒体针对苏

① Отдел науки и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ЦК КПСС

② Цветкова Н.А. Оценка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и СШ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200 лет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ука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Чубарьяна А.О. и Рубля Б.А. М.: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07. С.378-380.

③ Филимонов Г.Ю. «Мягкая сила» 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США. М.:РУДН, 2010. С.183.

④ Телеграф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联的虚假或歪曲报道予以驳斥。据统计，通讯社每天向国外发送的通信信息多达三百余条，有力地传达了苏联国内政策信息，满足了苏联当局对外传播的需要。^①

1941年成立的苏联信息局（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也是苏联进行对外宣传的关键部门之一，该部门负责管理在期刊和广播中发布国际、军事以及苏联国内的相关信息。1944年，该局设立了专门负责在境外进行信息宣传工作的职能部门。二战结束后，经过苏联信息局处理的信息，使用不同的对象国语言，通过世界23个国家的1171家报纸、523家杂志、18家电台以及苏联各驻外使馆和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广泛传播。^②通过苏联信息局传递的信息，世界范围的听众和读者知悉了苏联人民抵抗德国纳粹的事迹，也了解到苏联内政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1961年，苏联信息局正式更名为“新闻出版社”（Агентство печати «Новости»），其宗旨是为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做贡献，通过挂靠各类社会组织，“新闻出版社”通过商业模式直接与国外的各类媒体开展信息传播与交换。据统计，苏联时期，“新闻出版社”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设有代表处，并在国外使用45种外国语言发行近两百万份报刊。^③实践证明，苏联外语战略的实施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显著效果，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不仅很好地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国际形象。

四、现代化升级期：多举措着力提升国家整体外语能力

俄罗斯外语战略的现代化升级期主要涵盖苏联解体至今的这段时期。俄罗斯联邦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其外语战略同时也继承和吸取了苏联时期的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当代俄罗斯致力于对其外语战略进行现代化升级，以便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和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不仅重视外语

① Махонина С.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4. С.368.

② Кузнецов И. В.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1917-2000). М.: Флинта: Наука, 2002. С.197.

③ Махонина С.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С.368.

教育与战略规划工作，还制定了外语教育政策、法规和方案，致力于提高公民外语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同时将其视为捍卫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提高软实力和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当代俄罗斯的外语教育在延续苏联时期三级培养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现代化升级，使之与时俱进，特别是与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①接轨，同时更加注重外语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中等职业外语教育方面，为培养外交部门的办事员，开始将外交部直属的中等技术学校作为主要的培养基地；高等外语教育方面，除了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主要培养基地外，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高等院校也加入了培养外交官的行列，包括地方性大学都纷纷组建国际关系专业院系，外交官的培养更趋多样化，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更加多元化。通过继续教育（高级进修）培养外交队伍的领导型干部，除外交学院外，俄罗斯外交部也改组高级外语研修班（ВКИЯ），同时对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生也不再特殊优待，所有申请进入外交部工作的候选人都必须通过高级外语口试和笔试，才能被招录到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工作。

（一）外语战略的顶层设计

其一，当代俄罗斯建立起高层决策与外语政策协调统一机制和垂直领导体系，国家为外语政策与外语教育发展提供正确的理念与方向指导。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日趋多极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比较注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制定外语战略和政策文件。目前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主管制定外语政策与规划工作，具体事项由该部直属的普通教育大纲和标准局负责。教育与科学部制定外语教育大纲，确定外语教育规划和发展方向、教材使用等重大事项。联邦主体（直辖市、州和自治共和国）的相应机

① 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是 29 个欧洲国家于 1999 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提出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教资源，打通教育体制。“博洛尼亚进程”的发起者和参与国家希望，到 2010 年，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大学毕业生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出贡献。参见尹毓婷：“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博洛尼亚进程浅析”，《东岳论丛》，2009 年第 8 期，第 172-175 页。

构制定和实施当地的外语教育规划，并可获得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经费支持。俄罗斯联邦设有直属中央政府的语言工作协调机构——联邦语言委员会，委员会由各部部长、语言专家和大学校长组成，主要负责人由政府总理任命。该委员会负责协调管理语言工作，也包括外语教育规范、推广以及应对外来语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各联邦主体设有分委员会和专门从事外语教学推广、运用和学术研究的机构。在外语教育方面，政府提出多语种外语发展理念和开放外语教育政策，包括外语教学语种多元化、教学模式多样化、教学过程个性化，最终目标是克服语言多样化给人际交往带来的障碍，使多样化的语言转化为各语言间互相理解和相互补充的工具。

其二，当代俄罗斯注重对本国外语政策进行长远战略规划，及时制定并完善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为国家外语战略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俄罗斯作为传统世界强国，其战略意识比较强烈，政府更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高度重视语言战略的规划与制定工作，迄今已经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国家外语政策的官方文件，如 2002 年颁布的《2010 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①、2008 年颁布的《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构想》^②以及 2010 年批准的国家教育倡议《我们的新学校》^③等。俄联邦教育与科学部也早在 1994 年就发布了《关于向普通教育机构提供外语学习的公函》，2000 年再次发布《关于普通教育机构外语学习的公函》，2004 年发布《国家普通教育标准——基础教育外语课程标准》，2007 年发布《关于普通教育机构小语种学习的公函》等。这些文件已经成为指引俄罗斯外语教育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对外语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指向和推动作用，提高了全社会对外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明晰了俄罗斯外语教育的理念和改革创新的方向。

俄罗斯外语战略由政府与社会共同制定，政策中规定了外语战略的目标、原则、方向、任务以及实现方式。具体来说，外语战略的总体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巩固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权威，把俄罗斯建成民主自

① О Концепц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docs/2002/04/57884.shtml>

② Концепция развит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Ф до 2020 г. http://edu.mari.ru/ou_respub/sh14/commondocs/

③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Наша новая школа». <http://old.mon.gov.ru/dok/akt/6591/>

由的国家；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俄罗斯作为大国置身于国际社会，享有充分权利。具体目标是：为国家教育体系稳定发展构建长效机制，为本国公民提供公正、平等的教育机会，确保与国家、社会及个人需求相适应的高品质现代化教育，同时确保推行多语种外语发展理念和实行开放外语教育政策。实施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活动严格建立在国内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忠实于俄罗斯宪法的宗旨和原则；外语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以敌友国家作为区分标准；以外语为媒介，遵循同所有国家建立最为友好互利交往关系的原则；在国际舞台上行使俄罗斯的权利和义务。方向与优先任务：俄罗斯教育政策应关注影响教育系统发生重大变革的国际发展趋势，教育现代化不仅要面向学生知识的掌握，而且要面向学生个性、认知和创新能力的發展。应加强和保障促进学生社会化课程（经济、历史、法律、俄语、本族語和外语）的建设，保障中小學生最少学习一门外语，在中学推行外语课程强制性考试。^①

政策制定和落实：联邦政府根据宪法所赋予的权限，领导、制定、落实国家的外语政策，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在宪法权限范围内开展确保外语政策方针的立法工作，各联邦主体采取措施实施国家的外语政策，包括分析研究本国外语政策的发展状况，向联邦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议，并负责直接落实本政策确定的具体优先任务。此外，外语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还有赖于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通过利用联邦预算，同时也要在自愿基础上吸收来自政府以外的其他预算外资金，确保国家外语政策方针的最终实现。

此外，联邦政府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周期性（最新颁布的联邦法律规定以6年为一个周期）地调整战略规划，不断完善有关外语战略的相关配套政策、法规、规划、体制、机制、力量等，确保国家外语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政府出台的這些外语教育政策多为指导性政策，而非强制性立法，这种做法既从制度上保证了外语教育的连贯性和持续性，也给教育机构提供了很大的自主空间。

① 王森：“俄罗斯外语教育政策与外语教学变革”，《比较教育研究》，2013年第10期，第86-87页。

（二）外语人才培养体系多元化、国际化

当代俄罗斯将重点放在改革苏联时期的三级外语培养体系，使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同时重视培养掌握多门外语的综合性高级人才，外语教育体系更加成熟、多元化，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进艰难的转型进程，包括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西化”改革，寄希望于尽快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在此背景下，外语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也开始流行起来，再次燃起民众对外语学习的浓厚兴趣。许多俄罗斯人开始走出国门，经商、留学、跨国婚姻、旅游等，外语（主要是西欧国家的语言）学习成为民众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跨国交流的不断增多，当代俄罗斯对更高水平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为此，联邦政府重点对苏联时期三级外语教育培养体系进行现代化升级，对原有的专业教学机构进行改革，使之尽快走上国际化路线，更加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中等职业外语教育方面，以培养外交部门的办事员为例，俄罗斯联邦政府在 1932 年苏联外交部为外交秘书开设的速记、打字课程培训班的基础上，于 1993 年成立外交部直属中等技术学校（Колледж МИД России），作为俄罗斯文件撰写与档案管理领域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迄今为止，该校已经为俄罗斯外交各部门和驻外机构、国际组织、大型的国有企业、银行和外企培养了 1000 余名高水平专家。

在培养高水平复合型外语人才方面，除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为主要高级外交官和国际关系专家培养基地之外，越来越多的综合性高校加入到培养外交官和涉外型人才的高等学府行列之中，一些地方性大学也开设了国际关系院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更趋多样化。俄罗斯许多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生将外语与具体的专业或研究方向结合起来进行学习。比如，作为俄罗斯外语教学与研究重镇的莫斯科国立大学，实力十分雄厚，该校语言学与当代语言学学科同时进入 2015 年 QS 全球学科排名前 50 名，^①在 2018 年最新 QS 全球学

^① МГУ занял сразу 20 мест в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http://www.vedomosti.ru/management/articles/2015/04/29/mgu-zanyal-srazu-20-mest-v-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by-subject>

科排名中，则分别跃升至第 18 位和 26 位。^①在外语教育领域比较有特色的是莫斯科大学外语及区域学系和亚非学院，两系学生除掌握英语之外，还要再学一门以上的欧洲、亚洲、非洲语言，同时把区域学（北美、欧洲、亚非研究）作为自己的学习或研究方向。^②再以另外一所俄罗斯著名学府——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为例，该校虽是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教育机构，但从办学之初就制定出完善的外语发展战略与复合型人才培养政策，迄今拥有俄罗斯高教领域独树一帜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派，学院开设的外语语种达 54 种（截至 2016 年），创下世界所有高校开设外语语种数量最多的“吉尼斯纪录”。该校所有专业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建校 70 余年来已经为俄外交部与其他涉外部门培养了大批学者、高级外交家与翻译人才。^③

除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之外，在外语教育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综合性 and 地方性高校开始加入培养外交官和涉外型人才的行列。比如，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系和国际关系学系、喀山大学的东方学研究所、远东联邦大学东方所和亚太国际关系所、莫斯科语言大学的国际关系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等。这些机构的出现，使得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更趋多样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俄罗斯外交官和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

在外语继续教育和高级进修方面，俄罗斯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的重点任务仍然是培养外交队伍的领导型干部，同时注重多学科、多领域知识的培养。随着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的不断拓展，1999 年，外交学院设立了世界经济系，旨在培养从事对外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才，除对其进行补充专业教育外，还与国外知名机构进行联合培养，进一步推进了外语教育的国际化。据统计，迄今为止，外交学院为俄罗斯外交战线培养了 7000 多名高级职业外交官，其中 500 多人获任特命全权大使。^④

①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subject-rankings/2018>

② Факульте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МГУ имени М.В. Ломоносова. <http://www.ffl.msu.ru/>

③ Языковые школы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http://www.mgimo.ru/study/languages/list/index.phtml>

④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МИД России. <http://www.dipacademy.ru/about/history/>

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也改组了高级外语研修班。1992年，由于苏联解体，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成为独立国家，为应对形势的变化，外交部开设了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语言的高级研修班，同时对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语言培训体系进行了改革，制定出台了多层次语言培训构想，两年之后全面实施。同时，为适应国家对外交流的需要，不断拓展外语培训的语种数量。到1998年，共开设57种外语培训课程（28种欧洲语言和29种亚非语言），而到2001年，已经增加到60种外语，同时还设立口译教研室，有针对性地对外语口译人才进行高级培训。

在教育全球化和欧洲教育一体化背景下，俄罗斯联邦政府于2003年正式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同时确立了以本国教育系统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为目标的新发展战略，其中，外语教学活动更是严格根据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开展。根据博洛尼亚计划，2010年后，俄罗斯的大学生可以在博洛尼亚任何一个成员国工作和学习。据俄教育与科学部的数据，目前，俄罗斯已经与世界70多个国家达成了关于教育学位、学历的互认协议，同时与31个国家的学位、学历互认协议正在谈判之中。^①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外语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国内各级学校快速发展和多语种外语教学的普及。比如，莫斯科市各中小学开设的外语课程就达30余个语种。

（三）以外语为媒介提升国家软实力

近几年，俄罗斯为扩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继续将外语战略与对外文化交流实践相结合，积极拓展本国的软实力。以外语为沟通媒介，与世界各国举办多种形式的交流年、艺术交流季、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成为是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发挥文化影响力、强化在世界人文空间存在的重要手段。比如，2009年在中国举办“俄语年”，2013至2015年是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文化交流季，2013年和2014年是俄罗斯和法国的剧院、电影和舞蹈艺术季，2014年和2015年是俄罗斯与德国的语言文学交流年，2014年和2015年是俄罗斯和韩国的相互访问年，2015年是摩纳哥的俄罗斯年，2015年和2016年是

^① Доклад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и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16-2018 годы. 2015. <http://минобрнауки.рф/documents/5401>

俄罗斯与西班牙的语言文学交流年。^①

当代俄罗斯外语战略还有一项重要目标就是改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服务于国家稳定发展的长远利益需要。2005年，俄政府创办“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英语频道，它是俄罗斯第一家英语国际新闻频道，也是第一家全数字化的俄罗斯电视频道，由国有的俄罗斯新闻社所拥有，思想开放的“80后”西莫尼扬任总编辑，旨在向西方观众阐释俄罗斯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官方立场和俄罗斯国内新闻事件，塑造“没有偏见的俄罗斯形象”。目前“今日俄罗斯”已经开设英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法语等5个语种的外语频道，开播至今已经在欧美国家掌握了部分媒体话语权。2007年，俄政府的官方报纸“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启动了名为“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RBTH）的国际出版项目。该项目借助多语种提供信息，包括与俄罗斯文化、政治、商业、科技和社会生活有关的消息、评论、观点和分析等内容。RBTH项目特刊随同26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纸，用14种语言，在21个国家发行。RBTH项目旗下还开通了19家网站，用16种语言进行信息传播。^②2010年2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成立国际事务委员会^③，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俄罗斯公众同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该机构发布包括中文在内的不同外语语种的研究报告，受到国外研究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12月9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新闻社（РИА Новости）和“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Голос России）并入2005年成立的“今日俄罗斯”多语种电视台，重新组建了“今日俄罗斯”国际信息通讯社（МИА «Россия Сегодня»），确定其主要工作方向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和国内社会生活。重组前的“今日俄罗斯”多语种电视台就以独特的视角和鲜明的立场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地区取得收视佳绩，不仅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媒体市场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渐成为国际传播格局中的重要参与者。在乌克兰危机中，“今日俄罗斯”多语种电视台更是成功打破了西

① Доклад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и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2014 год и задачах на 2015 год. 2015. <http://mkrf.ru/>

② “透视俄罗斯”，<http://tsrus.cn/about>

③ “Th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http://russiancouncil.ru/en/about-us/what_is_riac/

方媒体对全球新闻议程高度控制的局面，显示出国际一流媒体的实力。^①该社还推出新式多媒体“卫星”（Спутник）项目，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建立起拥有广播电台、网站、新闻通讯社和新闻中心的多媒体运营中心，工作语言超过30余种。^②2013年，《俄罗斯报》又建立了英文网站Russia Direct^③，通过发布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专家的英文评论及文章，帮助读者理解俄罗斯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上述的各项实践表明，当代俄罗斯以积极的外语战略为抓手，致力于稳步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结 语

从大国成长经验来看，构建本国特色外语战略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历来受到大国的重视。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完善，俄罗斯迄今已经构建起一整套外语战略体系。

在粗放型发展期，俄罗斯外语战略的重点任务从普及外语学习、发展外语教育，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外语翻译人才培养，同时开始对国家其他涉外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外语培养和训练，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所限，初期效果并不显著。在初步形成期，一方面，俄罗斯开始从宏观层面对外语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并根据国家对外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扩大外语语种数量，提升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以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专业教育为主的双级外语教育体系被构建起来，重点为沙皇帝国外交部和其他涉外部门培养高级翻译人才。在基本成型期，以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业教育和外语继续教育为主的三级外语教育体系被构建起来，并逐渐成形，对外语人才的培养分工和定位也更加明确，重点培养国际关系领域的外交官、外交翻译人才和其他涉外工作人员，同时注重将“走出去”与外语战略

① 许华：“‘今日俄罗斯’因何异军突起”，《对外传播》，2014年第8期，第58-60页。

② 包括俄语、阿布哈兹语、阿塞拜疆语、英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波斯语、西班牙语、哈萨克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吉尔吉斯语、汉语、库尔德语、拉脱维亚语、摩尔多瓦语、德语、塔吉克语、波兰语、葡萄牙语、普什图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乌克兰语、芬兰语、法语、印地语、爱沙尼亚语、日语、白俄罗斯语等。

③ “Russia Direct”，<http://www.russia-direct.org>

相结合，着力提升国家外语实践能力。在现代化升级期，俄罗斯更加注重外语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层面的制度保障，同时推进外语人才培养体系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强化外语作为主要工具在捍卫国家安全、扩大国际影响、提高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致力于提升国家整体外语能力。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ajor country's growth experience, a major country has always valuing constructing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ies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o achieve its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So far, Russia has already built a complete set of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system.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extensive development period, initial formation period, basic formation period and modernization period. Its accumulated experience h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plan our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trategic level and to improve our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

【Key Words】 Russian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Russian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Russian Diplomacy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пыта рост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создание страт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с её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целей всегда ценилось ведущ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мир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выработала полный набор систем страт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Э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четыре периода: обширный период развития, начальный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базовый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период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Накопленный Россией опыт полезен для Кита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страт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и улучш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语言政策及其对格鲁吉亚族际关系的影响

赵静*

【内容提要】由于独特的历史渊源，格鲁吉亚的语言政策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政府“各民族语言平等”思想的倡导下，格政府通过立法保障民族语言的平等权利，民族语言教学获得发展与繁荣。自20世纪30年代末起，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明显偏重俄语，致使格政府不断加大俄语的推广力度，造成格国内的“去俄罗斯化”趋势的产生与发展。与此同时，在有关语言政策中，格政府也加强了格语的普及工作，引发了非主体民族，特别是南奥塞梯人与阿布哈兹人对被同化的担忧。“去俄罗斯化”倾向与自治地方居民对被同化的担忧，成为格国内族际关系紧张的潜在危险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格政府开始推行国语化改革，主体民族格鲁吉亚人与非主体民族——特别是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之间语言利益逐渐出现差别与对立，恶化了格族际关系，至今仍然紧张。语言政策对格国内族际关系的调整与缓和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苏联语言政策 格鲁吉亚语言政策 去俄罗斯化 阿布哈兹语 奥塞梯语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5-0173-(25)

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语言同化政策，俄语逐渐成为格鲁吉亚的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19世纪上半叶，格鲁吉亚公文事务及教育领域只能使用俄语，不能发行任何格鲁吉亚文出版物。为了加强管理，同时削弱格鲁吉亚语（以下简称“格语”）在教会、教育及文化中的重

* 赵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要地位，沙俄政府着手制定了奥塞梯语文字与阿布哈兹语文字。1844年，俄国语言学家绍格连（А.М. Шегрен）在基里尔（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奥塞梯语文字。1862年，俄国语言学家乌斯拉尔（П.К. Услар）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阿布哈兹语文字。沙俄政府的语言政策致使格语的生存与发展严重受限。19世纪下半叶，在恰夫恰瓦泽（И.Г. Чавчавадзе）、采列捷利（А.Р. Церетели）、戈盖巴什维利（Я.С. Гогобашвили）等格鲁吉亚著名作家及社会活动家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以大力发展格语为首要任务的社会团体。格鲁吉亚民族知识分子的努力，并未改变沙俄政府既定的同化政策。19世纪末至20世纪之交，为了加快格鲁吉亚居民的“俄罗斯化”进程，沙俄政府多次禁止使用民族语言授课，甚至关闭了上百所学校，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和抗议。

十月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格鲁吉亚的语言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20世纪20年代，格语成为国语，民族语言教学获得长足发展。自30年代末起，语言政策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对格国内族际关系的影响逐渐凸显。20世纪80年代末，语言改革导致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尤其是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居民之间的语言利益的差别与对立，族际关系的紧张达到顶点。20世纪90年代至今，语言政策的不同定位及对语言问题的持续争论，仍在影响格国内族际关系的调整。本文将着重梳理格鲁吉亚语言政策及其影响的大致脉络，同时兼叙学者们对语言问题的讨论，进而分析语言政策对格鲁吉亚族际关系的影响。

一、语言立法与民族语教学的繁荣 (1921-1937年)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经成立，就将格语确立为唯一国语，俄语随即丧失了沙俄统治时期的地位。1922年3月2日颁布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6条规定，格语为国语，保障少数民族在当

地的民族文化及国家机构中自由发展及使用母语的权利。^①1922年3月12日，格鲁吉亚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于同年12月作为该联邦成员加入苏联。1927年4月3日颁布的《格鲁吉亚宪法》第10条重申了关于格语作为国语地位的相关规定。^②1936年12月5日格鲁吉亚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1937年2月13日颁布的《格鲁吉亚宪法》第156条再次重申了格语的国语地位。^③

在苏联政府“各民族语言平等”思想的倡导下，自治共和国的民族语言也得到立法保障。1921年12月，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格鲁吉亚。1925年4月1日，《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④通过。该法第6条规定，俄语为国家机关用语（язы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同时保障阿布哈兹所有民族自由使用及发展母语的权利。^⑤在1927年3月7日颁布的《阿布哈兹宪法》第8条中，除俄语外，格语与阿布哈兹语同时被增列为国家机关用语。^⑥1931年，阿布哈兹成为自治共和

①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1. Первые советские республики, 1918-1922 гг.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5. С.82.

②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СССР, 1922-1936 гг. С.218.

③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3. СССР, 1936-1977 гг. С.278.

④ 由于1925年版《阿布哈兹宪法》中某些条款（如第4条与第5条）自相矛盾，且与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及苏联宪法相抵触，故该版宪法未真正生效。随后，1927年版《阿布哈兹宪法》颁布。参见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билиси: Интелекти, 2009. С.497- 498. 1927年版宪法原则上不同于1925年版宪法。1927年版宪法第一章写道：“阿布哈兹共和国是工人与劳动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特别条约加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通过格鲁吉亚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1925年版宪法的表述为“……阿布哈兹工人、农民和红军建立了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确立主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参见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СССР, 1922-1936 гг. С.228, 235.

⑤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СССР, 1922-1936 гг. С.229.

⑥ Там же. С.236.

国。^①1935年1月7日，阿布哈兹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该法第8条重申了阿布哈兹语、格语和俄语为国家机关用语的规定。^②虽然阿布哈兹语的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立，但在实际生活中其使用功能时而被忽视。在此次大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拉科巴（Н.А. Лакоба）做报告，指出上述宪法准则实际执行不力的情况。因此，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将乡村的公文事务转译为阿布哈兹语^③。

除民族语言立法外，苏联政府还实行文字改革，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与繁荣。20世纪20年代，考虑到部分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虽有文字但文字书写形式过于复杂难学，苏联政府着手进行文字改革。1923年，奥塞梯语（南奥塞梯）书写方式改为拉丁字母。1926年，阿布哈兹语书写方式也改为拉丁字母。在苏联政府倡导的“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政策下，格鲁吉亚民族语教学工作呈现繁荣景象。例如，“1926-1927学年，格鲁吉亚的绝大多数学校使用本族语教学，此外还有359所使用其他语言教学的学

① 事实上，关于1921-1931年间阿布哈兹地位的争论时有发生。争论的焦点是阿布哈兹是否曾是独立主权国家，是否有权脱离格鲁吉亚独立。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认为，1921-1931年间阿布哈兹是独立的主权共和国。1931年阿布哈兹丧失主权，降格成为格境内的自治共和国。因此，20世纪70、80年代，当阿布哈兹方面与格政府出现摩擦时，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提出了恢复阿布哈兹政治、经济、文化主权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阿布哈兹也以此宣布独立。格鲁吉亚学者帕帕斯基里（З. Папаскири）专门撰文反驳此类观点。他指出，1921年阿布哈兹加入格鲁吉亚时，暂时保留了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称。此举是为了稳定苏维埃政权在阿布哈兹的统治，给予“阿布哈兹兄弟民族”更多的自由。但此时阿布哈兹事实上已成为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单元，而非主权国家。1922年版《格鲁吉亚宪法》写道：“……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章第1条）。1924年版《苏联宪法》已将阿布哈兹归入自治共和国之列（第二章第15条）。基于此，帕帕斯基里认为，1921-1931年间阿布哈兹不是主权国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只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单元。他认为，有关阿布哈兹于1931年被迫丧失主权的说法，是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对格政府的诽谤。其目的是在阿布哈兹居民中煽动反格鲁吉亚情绪。参见 Папаскири З. Еще раз об одном ложном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постулате абхазской сепаратист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татусе Абхазии в 1921-1931 годах// Кавказ 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2012. Т. 6. № 2. С.191-204; Папаскири З. Абхазия и абхазы в общегрузинско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Часть II// Кавказ 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2008. Т. 2. № 4. С.107-122.

②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СССР, 1922-1936 гг. С.245.

③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08.

校：128 所亚美尼亚语学校、87 所阿塞拜疆语学校、63 所俄语学校、36 所希腊语学校、27 所奥塞梯语学校、11 所德语学校、3 所犹太语学校、2 所艾索尔语学校、1 所波兰语学校和 1 所科尔德语学校”^①。

二、文字改革与学校改革 (1937-1954 年)

自 20 世纪 30 年代末起，在苏联政府有关语言问题的政策中，出现了明显偏重于俄语的倾向：一是要求改变新创或改制的拉丁文字书写方式，转为基里尔字母，二是明确要求提高学生的俄语水平。在苏联政府语言政策的引导下，格政府着手实行文字改革和学校改革。

(一) 更改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

20 世纪 30 年代下半期，鉴于“民族语言书写方式拉丁化人为阻碍了苏联各民族的族际交往”^②，“不能满足各民族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让俄语在文化教育中发挥主要作用。为此，苏联政府有意将各民族语言的书写方式转为基里尔字母，以此减轻各民族学习俄语的压力。”^③在苏联政府的语言政策指导下，格政府于 1937 年开始着手更改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1938 年，阿布哈兹语的书写方式由拉丁字母改为格语字母。1939 年，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由拉丁字母改为格语字母。

当时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使用了基里尔字母，而格鲁吉亚使用了格语字母。针对这一情况，格鲁吉亚学者与阿布哈兹学者各执一词。以加马尔哈里亚为代表的格鲁吉亚学者表示，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苏联政府做出决定，

① 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 82 页。

② Янускина В.В. 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Южном макрорегион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Этносоциум и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2016. № 2(92). С.106.

③ Доровских Е.М. К 100-летию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развит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о культурно-язык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17. Т. 12. № 5. С.101.

将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实体的主体少数民族语言的书写方式，转为相应加盟共和国国语的书写方式。^①按照苏联政府的规定，阿布哈兹语的书写方式应转为格国语的书写方式，即格语字母。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使用基里尔字母的原因，加马尔哈里亚为代表的格鲁吉亚学者作了如下解释：当时在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中，仅俄罗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下设自治共和国，^②且前三者的国语（或主体民族语言）书写方式均为（或转为）基里尔字母^③，而格鲁吉亚的国语—格语属高加索语系，具有不同于基里尔字母的书写方式，且其书写方式从未变更。加马尔哈里亚进一步指出，“格国语书写方式此前未发生变更，是由其独特的语言历史状况决定的。苏联政府也是考虑到格语的独特性，并未在此次文字改革中着手更改格语的书写方式”^④。为了证明阿布哈兹语书写方式转为格语字母的正当性，

①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11.

② 根据笔者的统计，截止 1940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有 17 个自治共和国，分别是巴什基尔（1919 年成立）、布里亚特蒙古（1923 年成立）、达吉斯坦（1921 年成立）、卡巴尔达-巴尔卡尔（1936 年成立）、卡尔梅克（1935 年成立）、卡累利阿（1936 年成立）、科米（1936 年成立）、克里米亚（1921 年成立）、马里（1936 年成立）、莫尔多维亚（1936 年成立）、北奥塞梯（1936 年成立）、鞑靼（1920 年成立）、乌德穆尔特（1934 年成立）、车臣-印古什（1936 年成立）、楚瓦什（1925 年成立）、雅库特（1922 年成立）、伏尔加德意志人（1923 年成立）；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 1 个自治共和国，即纳希切万（1936 年成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 1 个自治共和国，即卡拉卡尔帕克（1937 年成立）；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 2 个自治共和国，即阿布哈兹（1931 年成立）和阿扎尔（1921 年成立，该地的主体居民是阿扎尔人，讲格鲁吉亚语）。

③ 据 1937 年版《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并未确立国语，其主体民族语言是俄语。1937 年通过的《阿塞拜疆宪法》第 151 条规定，阿塞拜疆语是阿塞拜疆的国语。1929 年以前，阿塞拜疆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1929 年-1939 年间使用拉丁字母书写，1939 年改为基里尔字母书写。1937 年颁布的《乌兹别克宪法》并未对国语作出规定，其主体民族语言为乌兹别克语。1928 年以前，乌兹别克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1928-1940 年间使用拉丁字母书写，1940 年改用基里尔字母书写。根据 1937 年版《格鲁吉亚宪法》第 156 条的规定，其主体民族语言格鲁吉亚语为国语。（1937 年版《亚美尼亚宪法》第 119 条确立了亚美尼亚语的国语地位。不同于其他加盟共和国，外高加索三国在 1937 年版宪法中都将其主体民族语言确立为国语。）在其他加盟共和国（除亚美尼亚外）的国语或主体民族语言书写方式相继改为拉丁字母和基里尔字母时，格语的书写方式未发生变化。格鲁吉亚学者加马尔哈里亚意在表示，在格语书写方式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转为格语字母是合乎情理的。

④ 参见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12.

加马尔哈里亚还指出，当时阿布哈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并未对此提出反对。阿布哈兹学者布加日巴（Х. Бгажба）甚至表示，“格语字母以最完整的方式展现了阿布哈兹语标准语的语音体系”^①。基于此，格鲁吉亚学者意在表明，格政府并未利用文字改革，强制同化阿布哈兹族人。对于格鲁吉亚学者的老调重弹，阿布哈兹著名记者阿赫拉·斯梅尔（Ахра Смыр）表示反感。他写道：“目前仍有一些格鲁吉亚学者援引俄国语言学家乌斯拉尔的论点^②，认为相较于俄文字母和拉丁字母，格语字母更适合高加索语言文字，并以此作为阿布哈兹语书写方式转为格语字母的有力论据”^③。他认为，格政府未考虑阿布哈兹人的感受，也未关注新书写方式的实际掌握问题。对于那些早已习惯拉丁字母书写方式的师生们而言，新书写方式难以掌握。阿布哈兹学者布加日巴也表示，主要是年轻的文学家，以及在大清洗中幸存的部分阿布哈兹族知识分子，逐渐开始使用新书写方式。

格政府在南奥塞梯自治州也实行了文字改革。但南奥塞梯的情形较为复杂，一方面，奥塞梯语的几个发音在格语字母中没有对应的替代符号，另一方面，此时在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由拉丁字母改回了基里尔字母。^④因此，文字改革不仅使奥塞梯语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而且由此造成的奥塞梯语的两种书写方式，也给南北奥塞梯居民的交往带来了诸多问题。俄罗斯学者萨纳科耶夫（И.Б. Санакоев）、科伊巴耶夫（Б.Г. Койбаев）指出，“正是由于1939–1954年间奥塞梯语的

① 转引自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13.

② 格鲁吉亚学者加马尔哈里亚和帕帕斯基里指出，阿布哈兹语文字的创制者、俄国语言学家乌斯拉尔曾表示，格语字母体系可以作为所有高加索语言字母的基础。选择基里尔字母作为阿布哈兹语文字的创制基础，主要是为了使当地居民快速掌握俄语，推动当地的“俄罗斯化”。帕帕斯基里在其文章中写道：“俄国社会活动家魏登包姆（Е.Г. Вейденбаум）也曾公开表示，创制阿布哈兹语文字是为了取代格语在宗教和教育中的作用”。参见 Папаскири З. Абхазия и абхазы в общегрузинско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Часть II. С.113;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13.

③ Ахра Смыр. Абхаз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 сюжеты развития. <https://anyha.org/smyr-alas-harbage-2-1/>

④ 南北奥塞梯族人同族同源，历史上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南北奥塞梯语语言差别较小，仅在方言上有所不同。多年的互相移民促进了该地区民族认同的形成。参见 Сагцаев Э.Б.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этнически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Вестник Владикавказ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2010. Т. 10. № 4. С.8.

两种书写方式，加入俄罗斯联邦，并与北奥塞梯合并的社会情绪，在南奥塞梯逐渐成熟起来”^①。

（二）取消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民族语授课

1938年1月2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发布决议，规定将各自治共和国民族语学校的授课语言，转为相应共和国的语言或者俄语。^②1938年3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第324号《关于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学校必修俄语》的决议，规定各民族学校自1938年9月1日起开设俄语必修课，要求中小学生在口头和书面上能自由运用俄语，独立阅读俄文报刊和书籍，掌握俄语语法和句法，通过某些作品熟悉俄罗斯文学等。在该决议的最后，苏联中央强调了母语授课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苏联人民委员会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强调，母语是民族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州学校授课的基础。在俄罗斯联邦的部分自治共和国，关于母语授课的规定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任何将俄语由必修课转为授课语言、限制母语的倾向，都是有害且错误的。”^③随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通过类似决议。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于4月13日通过了第256/444号《关于完善非俄语学校俄语教学》的决议。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的是，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还于6月22号通过了《关于非格语学校教授格语》的决议^④。这表明，在格政府的语言规划中，出现了偏重格语的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格政府开始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落实上述文件。1944年8月起，南奥塞梯中学及八年制普通教育学校的授课语言改为俄语和格语，奥塞梯语作为小学课程讲授，不再作为授课语言使用。随后，

① 转引自Санакоев И.Б., Койбаев Б.Г.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и обретения грузинск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о-Осет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Коста Левановича Хетагурова. 2013. № 2. С.66.

②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15.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НК СССР, ЦК ВКП(б) от 13.03.1938 № 324 «Об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из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школ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и областей». <https://ipravo.info/sssrl/laws55/686.htm>

④ Доровских Е.М. К 100-летию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развит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о культурно-язык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102.

学校改革继续深化，从 1949–1950 学年起，南奥塞梯所有学校的教学工作转为格语和俄语，取消奥塞梯语授课。随着用俄语及格语学习者人数的增长，奥塞梯语在学校范围内的使用受到严重削弱。

针对格政府在南奥塞梯推行的学校改革，学者们的争论较为激烈。乌克兰学者丘加延科认为，格当局是故意曲解苏共中央的决议（认为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联邦同属例外，即南奥塞梯自治州的母语授课也具有暂时性的特点），意在取消母语授课。^①然而，很多格鲁吉亚学者却指出，由于没有熟练掌握俄语及格语，在继续学业和族际交往中，当时用民族语学习的大多数中小学毕业生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他们对格政府的学校改革表示赞同。对此，南奥塞梯学者普哈耶夫（К. Пухаев）认为，学校改革是对南奥塞梯居民的公开文化歧视。^②事实上，实行学校改革给使用民族语学习者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由于不懂或者还未完全掌握格语及俄语，学生们难以领会老师的授课内容，跟不上进度，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成绩。这成为他们升学、毕业及深造的障碍。正因如此，格当局的改革措施引发了南奥塞梯民众的抗议。1951 年 8 月，大学生瓦涅耶夫（В. Ванеев）、加西耶夫（Л. Гассиев）、演员别科耶夫（Г. Бекоев）等人公开要求在学校恢复奥塞梯语授课。当局以“奥塞梯民族主义”的罪名，分别判处他们 25 年、10 年和 8 年监禁。^③此后，名为“公平”（奥塞梯语«Рæстдзинад», 俄语«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的地下青年组织成立。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反抗格政府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

格政府在阿布哈兹也实行了学校改革。1945 年 3 月 13 日，格共阿布哈兹州委员会会议通过《关于完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学校教育工作质量的措施》决议，规定自 1945–1946 学年起，阿布哈兹语学校的教学语言转为格语。为此，政府加大教师的格语培训力度，引进大量懂格语的教师。6 月 13 日，格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上述决议。自此所有阿布哈兹语学校正式转为格语教学。与此同时，阿布哈兹语广播、报纸被取消。上述措施引发了阿布哈兹人

① Чугаенко Ю.А. Грузия-Южная Осет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К.: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3. С.59.

② Пухаев К. К вопросу о геноциде//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97. 1 ноября 2006 г.

③ Чугаенко Ю.А. Грузия-Южная Осет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65-66.

的不满。1947年2月，阿布哈兹族知识分子沙克雷尔（К. Шакрыл）、济扎利雅（Г. Дзидзария）和申库巴（Б. Шинкуба）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写信，抗议学校改革。阿布哈兹语言学家乔努瓦（Б.Г. Джонуа）认为，“格当局对阿布哈兹语的打压不仅未能使当地居民接受格语，反而促使他们向俄语及俄罗斯联邦靠近”^①。

此外，更名运动也是阿布哈兹学者与格鲁吉亚学者争议的焦点之一。阿布哈兹学者萨加里亚（Б.Е. Сагария）指出，格当局于1936-1951年间（特别是1948-1951年间）在阿布哈兹开展了大规模的居民点更名运动，其中包括镇苏维埃1处，村苏维埃24处，居民点122个，共计147处。^②由于未充分研究实地情况，更名运动给当地民众造成不便，受到民众的指责。然而，格鲁吉亚学者加马尔哈里亚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指出，1940年12月14日，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立了以哈施巴（М.Л. Хашба）为首的居民点更名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布哈兹族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古利阿（Д.И. Гулиа）与乔丘阿（А.М. Чочуа），他们积极参与更名工作。加马尔哈里亚进一步指出，1940-1944年间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开展的大规模更名运动仅涉及俄语及土耳其语地名，并列出了部分新旧地名加以对照。^③由此，他对更名运动损害了阿布哈兹语言文化及历史传统的说法表示质疑。

三、双语者数量的增加与语言问题相关争议的出现 (1954-197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有关“各民族语言平等”的规定仍十分明确。但是，在苏联有关语言问题的政策中，偏重于俄语的倾向渐趋明显。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使俄语尽快成为各民族熟练掌握的第二语言，苏联政府加大了俄语的推广力度。受此影响，格政府加强了俄语的普及工作，又将

① Джонуа Б.Г.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Абхазии: история, реал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http://apsnyteka.org/file/jonuа_b_iazykovaia_politika_v_abkhazii.pdf

② Сагария Б.Е., Ачугба Т.А., Пачулия В.М. Абхаз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1937-1953 гг.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Сухум: Алашара, 1992. С.514.

③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 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18.

阿布哈兹语与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改回了基里尔字母。

（一）偏重推广俄语，双语者数量稳步增加

在苏联有关语言问题政策的引导下，格共中央委员会于1954年1月4日通过了《关于共和国学校俄语语言文学学习状况及完善俄语学习措施》的决议。决议要求在第比利斯开设俄语师范学院，扩大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各学校的俄语教学。该决议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俄语学生的比例由1953-1954学年的18%提升至1959-1960学年的22%，格语学生的相应比例由71%降至66%。^①1954年，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由格语字母改回基里尔字母。文字书写形式的频繁改换，使得当地居民在语言习得、语言水平的保持与提高方面，面临困境。当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将遭遇挑战。这意味着苏联政府有意使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向俄语靠拢，促进当地学生尽快掌握俄语。

在苏联政府偏重推广俄语的大背景下，格政府加大格语权重的倾向也渐趋明显。这不可能不对地方政府产生影响作用。1955年，为了执行格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英姆纳泽（А.Г. Имнадзе）为首的南奥塞梯州党委，通过了《关于南奥塞梯公文事务转为格语》的决议。根据此决议，南奥塞梯各级政府机关面临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奥塞梯人将丧失党政机关的职位。对此，乌克兰学者丘加延科认为，“这是明显的歧视，其目的是同化南奥塞梯的非格鲁吉亚族居民”^②。1956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格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中的失误与不足》的决议。此后，语言政策情势出现一定好转。南奥塞梯学者普哈耶夫指出，该决议在语言政策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即“取消了‘学校改革’”^③。

在苏联中央的引导下，俄语推广工作继续得到加强，双语者数量稳定增

① Мякшев А.П. Национально-языков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тенденции// Известия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Новая серия.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5. Т.15. № 3. С.43.

② Чугаенко Ю.А. Грузия-Южная Осет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74.

③ Пухаев К. К вопросу о геноциде//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97. 1 ноября 2006 г.

加。1959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及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的纲要》。纲要第19条规定，各民族学校可以使用本族语教学，同时又特别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中等学校必修俄语”。这种“必修俄语”的规定，无疑带有强制性的特点。由于政府主导俄语的推广工作，加之俄语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这致使人们更多地选择俄语。俄语逐渐成为格国内，尤其是自治地方各少数民族的族际交际语^①。“民族语-俄语”型和“民族语-民族语”型双语者的数量开始增加。至1970年，熟练掌握俄语的格鲁吉亚人的比例为21.3%，阿布哈兹人为59.2%，奥塞梯人为58.6%^②。在南奥塞梯自治州有12.7%的奥塞梯人和13.5%的俄罗斯人熟练掌握格语，4.2%的格鲁吉亚人，15.4%的俄罗斯人，0.7%的犹太人和3.4%的亚美尼亚人熟练掌握奥塞梯语。在格鲁吉亚的双语发展状况中，我们可以发现，“民族语-俄语”型双语者的比例明显高于“民族语-民族语”型双语者的比例，且前者在自治地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比例较高。

（二）1957与1967年事件，语言相关争议出现

1954年，格鲁吉亚学者因加罗科瓦（П.И. Ингорква）的著作《格奥尔基·梅尔丘列》（«Георгий Мерчуле»）问世。1956年，该书作者有关阿布哈兹历史重大问题的论点得到广泛讨论。英国高加索学家乔治·休伊特（George Hewitt）在其文章中对因加罗科瓦的观点表述如下：“17世纪，‘如今的’阿布哈兹人才从北高加索移居至现今的阿布哈兹，他们占据并取代了历史上‘真正的’阿布哈兹人的居住地及名称，而后者（‘真正的’阿布哈兹人）是格鲁吉亚族的一个部族，因此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族的固有领地。”^③上述论断直接否定了阿布哈兹族的历史，引起轩然大波。1957年4月11

① Арутюнова М.А.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СС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25: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2. №.1. С.160.

② 笔者未找到南奥塞梯居民1970年掌握俄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准确数据，因此将1970年全苏奥塞梯人熟练掌握俄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比例（58.6%）列在此处作为参考。

③ George Hewitt, “Abkhazia and Georgia: Time for a Reassessment”,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2009, Vol.15, No.2, p.186.

至 13 日，200 名民众举行抗议活动。部分阿布哈兹族知识分子上书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要求终止格国内移民（格鲁吉亚人移居阿布哈兹），并将阿布哈兹划归俄罗斯联邦管理。关于抗议活动爆发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格当局出版因加罗科瓦的著作，是为同化阿布哈兹人奠定意识形态基础。^①然而，格鲁吉亚学者帕帕斯基里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表示，“1957 年事件是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组织的首次‘全阿布哈兹暴乱’，目的是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离出去”^②。

1966 年，格鲁吉亚学者别尔捷尼什维利（Н.А. Бердзеншвили）发表了题为《重要问题的些许见解》的文章。^③文中指出，“历史上的”阿布哈兹人积极参与格鲁吉亚国家建设，表达了“历史上的”阿布哈兹人与伊比利亚-拉兹人同族同源的观点。^④伊比利亚人是古代东格鲁吉亚的部族，讲格鲁吉亚语。^⑤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伊比利亚人在今格鲁吉亚东部及南部建立高加索伊比利亚王国，后成为东格鲁吉亚王国的基础。拉兹人是指如今居住在格鲁吉亚西南部阿扎尔地区及土耳其的民族。伊比利亚-拉兹人与格鲁吉亚族族源相近，因此别尔捷尼什维利所指的“‘历史上的’阿布哈兹人”等同于因加罗科瓦所指的与格鲁吉亚族同族同源的“‘真正的’阿布哈兹人”。这种将古代阿布哈兹族归入格鲁吉亚族的论断，引发了阿布哈兹民众对当局抹杀阿布哈兹族历史文化，进而同化阿布哈兹人的担心。1967 年，阿布哈兹居民再次提出脱离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要求。阿布哈兹族与格鲁吉亚族的族际关系愈加敏感。格鲁吉亚学者帕帕斯基里认为，“别尔捷尼什维利仅指出，中世纪初期的阿布哈兹人可能来源于卡特维尔族”^⑥，并未就阿布哈兹人的族源问题给出确切答案。

①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С.523.

② Папаскири З. Абхазия и абхазы в общегрузинском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м и политик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Часть II. С.120.

③ Папаскири З. Абхазия. История без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Тбилис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уху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С.284.

④ Гамахария Д. (гл.ред.). Абхаз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билиси: Интеллекти, 2009. С.526.

⑤ Кирчанов М.В. Пробле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Грузинской ССР в 1960–1970-е гг.// Панорама. 2017. Т.30. С.26-27.

⑥ 转引自 Папаскири З. Абхазия. История без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С.285.

四、语言改革与族际关系的恶化（1970-1990年）

自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对俄语的推广几乎成为一种运动，甚至上升至政治的高度，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①为此，格政府在语言政策规划及实践中进一步加强了俄语的推广工作。

（一）1978年事件与族际关系的紧张

1973年，格共中央委员会和格部长会议发布《关于共和国普通教育学校的俄语教学状况及其完善措施》的决议。该决议分析了格国内俄语的现状，确立了提高师生俄语水平的相应措施。1976年，第比利斯国立大学部分技术班级转为俄语教学。此举引发格鲁吉亚族精英人士的不满，数十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格国内排斥俄语的情绪逐渐扩散，“‘去俄罗斯化’的趋势愈发明显”^②。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起，俄罗斯族居民在格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开始逐年下降。1959年，其比例为10%，1970年和1979年分别为8.5%和7.4%，1989年降为6.3%。然而，格国内的“去俄罗斯化”趋势并未减弱，反而逐渐加强。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俄语推广力度的不断加大，还因为人们对直接或间接语言利益的追求，导致语言问题的政治化趋势愈加明显。可以说，抵制俄语已成为格鲁吉亚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诉求的载体之一^③。

因俄语教学改革而引发的1976年游行示威活动，使得本已敏感的格鲁吉亚族与阿布哈兹族知识分子的关系更加脆弱。1977年，苏联新宪法颁布。随后，部分阿布哈兹民众就格新宪法草案提出建议，要求加入阿布哈兹有权脱离格鲁吉亚、实行民族自决的内容。^④1977年12月10日，130名阿布哈兹文化活动家联名上书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Л.И. Брежнев）及俄罗

① 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第269页。

②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в Грузии (1978).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емонстрации_в_Грузии_\(1978\)](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емонстрации_в_Грузии_(1978))// Википедия.

③ Кирчанов М.В. Пробле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Грузинской ССР в 1960-1970-е гг.// Панорама. 2017. Т.30. С.30.

④ Зухба М.И. К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 абхаз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1931-1989 гг.)//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012. №.1. С.207.

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亚斯诺夫 (М.А. Яснов), 反对格当局同化阿布哈兹人的政策, 要求将阿布哈兹划归俄罗斯联邦管辖。

随后, 由于格宪法草案中的国语规定, 格国再此发生游行示威活动。这造成格国内族际关系进一步紧张。1978年3月24日, 格俄文报纸《东方曙光报》(«Заря Востока») 刊登了宪法草案第75条的相关内容。^①与1937年版宪法相比, 该条款删除了关于格语为国语的规定。草案一经见报就引发了格鲁吉亚人的强烈不满。4月14日^②, 格首都第比利斯及其他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在格共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 (Э.А. Шеварднадзе) 当众宣读了1978年《格宪法》第75条 (加入了规定格语为国语的内容)^③之后, 游行示威者才散去。4月15日, 《格宪法》颁布。该法保留了格语为国语的规定, 未加入阿布哈兹拥有自决权的规定。5月19日, 为了缓和阿布哈兹的局势, 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 (И.В. Капитонов) 为首的专门小组和格共中央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抵达阿布哈兹。5月24日, 格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决议。^④此后, 格当局恢复了部分阿布哈兹语地名, 切实解决了一些阿布哈兹族文化发展问题, 如开办阿布哈兹语广播电视, 将苏呼米师范学校升级为阿布哈兹国立大学等。^⑤6月6日, 《阿布哈兹宪法》颁布。该法第70条规定, 阿布哈兹语、格语、俄语同时由国家机关用语升级为国语。^⑥俄罗

① 宪法草案第75条的内容是: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障俄语在国家及社会机关、文化教育等机构的使用, 并全面关注其发展。在平等的基础上保障俄语, 以及本国居民使用的其他语言, 在格鲁吉亚各级国家机关中的自由使用。不允许某种语言在使用时享有特权抑或受到限制”。参见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в Грузии (1978).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емонстрации_в_Грузии_\(1978\)](https://ru.wikipedia.org/wiki/Демонстрации_в_Грузии_(1978))

② 4月14日现为格鲁吉亚的母语日 (День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③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4. СССР, 1977-1991 гг. С.396.

④ Шулумба Б. Влияние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на зарожде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еодической печати Абхазии//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2013. №.1. С.204.

⑤ Мельситов В.В, Тужба Э.Н.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динамика грузино-абхаз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8: Социология и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2. № 3. С.178.

⑥ Кузнецов. Д.В.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В 4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4. СССР, 1977-1991 гг. С.414.

斯学者利特温丘克 (В. И. Литвинчук) 与马尔基多诺夫 (С.М. Маркедонов) 指出, 语言地位的这种规定是在各方妥协的基础上制定的。^①

(二) 国语化改革与族际关系的恶化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俄语推广工作的意识形态化趋势更加明显。1983 年 5 月 28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普通教育学校及其他学校学习俄语的补充措施》决议。8 月 9 日, 格共中央委员会发布决议, 要求执行苏共中央决议规定的各项任务, 完善俄语学习与教学。在此背景下, 俄语普及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格普通教育学校中, 俄语学生的比例由 1980–1981 学年的 21.1% 升至 1986–1987 学年的 23.8%。^② 熟练掌握俄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格鲁吉亚人的比例由 1979 年的 26.7% 升至 1989 年的 31.78%。^③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格政府开始推行国语化改革, 加快制定格语发展纲要。然而, 国语化并不符合阿布哈兹居民的语言实际掌握情况。1979 年, 阿布哈兹半数以上 (均值为 52.9%) 的居民熟练掌握俄语, 其中阿布哈兹人为 74.7%, 格鲁吉亚人 55.8%, 亚美尼亚人 73.3%, 希腊人 71.7%, 乌克兰人 51.8%, 犹太人 43.8%, 奥塞梯人 61.6%, 其他民族 55.5%。^④ 1989 年, 97.2% 的阿布哈兹人以阿布哈兹语为母语, 81% 的阿布哈兹人熟练掌握俄语, 1.6% 的阿布哈兹人熟练掌握格语。^⑤ 显然, 国语化将对阿布哈兹居民

① Литвинчук В.И.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специфики грузино-абхаз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естник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Н.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08. №.5. С.234; Маркедонов С.М. Советский Кавказ в 1970-е годы: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Деба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и культуре. 2007. №.2. [http:// www.intelros.ru/2007/10/10/sovetskij_kavkaz_v_1970e_gody_predchuvstvie_grazhdanskojj_vojjny.html](http://www.intelros.ru/2007/10/10/sovetskij_kavkaz_v_1970e_gody_predchuvstvie_grazhdanskojj_vojjny.html)

② Арефьев А.Л.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М.: Центр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и маркетинга, 2012. С.38.

③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89 г.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Грузинской ССР по наиболе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ям и языку// Демоскоп Weekly [http:// 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lan_89_gr.php](http://www.demoscope.ru/weekly/ssp/sng_nac_lan_89_gr.php)

④ Абхазия в цифрах в 1985 г. Сухум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Абхазской АССР, 1986. С.5.

⑤ Халидов А.И. Экология языков Кавказа. Статья вторая: абхазско-адыгские языки//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Чече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013. № 1(18). С.194.

的语言利益产生较大影响。阿布哈兹居民面临放弃已熟练掌握的俄语，重新学习和使用格语的压力。同时，他们还将丧失在各级党政机关的职位。面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愈发强烈的独立诉求，以及不可逆转的“去俄罗斯化”趋势，阿布哈兹居民开始担心出现被同化的可能。1989年3月18日，约3万名阿布哈兹人（其中包括阿布哈兹部分党政机关的阿布哈兹族领导）在阿布哈兹古达乌塔区雷赫纳村举行大规模集会。集会通过决议及《告戈尔巴乔夫书》，要求恢复阿布哈兹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3月27日，格鲁吉亚独立运动领袖采列捷利（И. Церетели）在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正式宣布组建政党^①，其诉求为“推翻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退出苏联，解散共产党”。此时，阿布哈兹国立大学部分格鲁吉亚族师生，提出了建立第比利斯国立大学苏呼米分校的建议。自4月4日起，首都第比利斯市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居民独立的要求。但后来运动的矛头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人的分离主义，转向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至此，双方关系变得更加紧张。5月14日，格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在阿布哈兹首府苏呼米建立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分校，并于7月16日进行招生考试。阿布哈兹政府对此决定持否定态度，苏联中央也认定此举不合法，但苏呼米分校的领导却宣布招生依然有效。政府层面的分歧加剧了居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此时，格鲁吉亚族人在阿布哈兹已具有明显的人口优势^②。而对阿布哈兹人而言，苏呼米分校的建立意味着强制同化的开始。7月15日，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之间爆发流血冲突。随着格鲁吉亚独立步伐的加快，阿布哈兹居民对被同化的担忧日益加剧。1990年8月25日，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率先通过了独立宣言。宣言第15条规定，“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保障……阿布哈兹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发挥功能”^③。此后，阿布哈兹语言文化的恢复与

① Обострение грузино-абхаз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 июле 1989 года// Кавказский Узел. <http://www.kavkaz-uzel.eu/articles/246527/>

② 自20世纪30年代起，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族居民的数量持续增加。1939年，格鲁吉亚族人在阿布哈兹总人口中的比例是29.49%，1959年为39.09%，1970年为40.99%，1979年为43.89%，1989年达到45.68%。阿布哈兹族人的相应比例是18.02%、15.12%、15.87%、17.09和17.76%。

③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е Абхаз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5 августа 1990 года. <http://www.apsuara.ru/portal/node/1013>

发展工作被提上日程。

国语化改革同样也对格鲁吉亚族与奥塞梯族的族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1989年1月27日，格作家协会报纸《格鲁吉亚文学报》（格鲁吉亚语«ლიტერატურული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俄语«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рузия»）刊登了沙夫古利泽教授（Т. Шавгулидзе）的文章。文章指出，依据现行法律，南奥塞梯的公文事务用语为格语，但实际上奥塞梯语和俄语的普及程度更高。该地区语言实际使用情况与语言地位的不对等状况，加剧了南奥塞梯与格当局在语言问题上的分歧。1989年8月15日，筹备已久的《格鲁吉亚语国家发展纲要》颁布。纲要规定，在国家各领域优先使用格语，制定共和国非格语学校必修格语的详细方案，保障格语在社会各领域的普遍使用。依照纲要，南奥塞梯所有文件必须使用格文书写（随后政府机关中出现了首批格文打字机）。这引发了南奥塞梯居民对新的强制同化的担忧。奥塞梯社会运动组织《民族话语》（奥塞梯语«Адæмон Ныхас»，俄语«Слово народа»，1988年11月成立）就此向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及苏共中央委员会表达抗议，要求审查南北奥塞梯合并问题。^①南奥塞梯政府对此也做出快速回应：9月4日，南奥塞梯通过了《关于奥塞梯语发展的国家纲要》决议。9月26日，《奥塞梯语国家发展纲要》通过南奥塞梯苏维埃第二十次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审查，奥塞梯语获得国语地位。格当局声称南奥塞梯苏维埃的行为违宪，双方分歧加剧。1990年9月20日，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11月28日更名为南奥塞梯苏维埃共和国。

五、语言现状与族群关系的疏远（1991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不同语言政策的引导下，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的语言现状出现较大差异：英语在格国内和俄语在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的普及力度与程度基本相当^②。围绕语言相关问题的争论不息。

① Грузино-южноосет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https://ru.wikipedia.org/wiki/Грузино-южноосетинский_конфликт

② Сихарулидзе Т.Т. О 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их и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Грузии. <http://www.philology.ru/linguistics1/sikharulidze-06.htm>

（一）语言现状差异的形成

宣布独立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①都将发展与巩固本民族语言作为首要任务，并先后通过语言立法，确立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历经近 30 年的发展变化，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的语言现状呈现出较大差异。

在格鲁吉亚全国范围内，俄语的地位逐渐衰落。1995 年 8 月 24 日，《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颁布。该法第 8 条规定，“格语是格鲁吉亚的国语，阿布哈兹语是阿布哈兹的国语。”^②2004 年 12 月 23 日，《广播法》颁布。该法第 38 条规定，全国性广播电台应播放国语类节目，地方广播电台也应播放国语类节目。2005 年 4 月 8 日，《普通教育法》颁布。该法第 4 条规定，格鲁吉亚普通教育机构的授课语言是格语，阿布哈兹学校的授课语言为两种国语（格语和阿布哈兹语）中的一种，同时需必修另一种，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用母语学习，但需必修格语。独立以来，俄语的地位与社会功能不断衰退，掌握俄语的居民比例接连下降。1989 年，格国内以俄语为母语的居民比例为 8.9%，以俄语为熟练掌握的第二语言的居民比例为 32.2%，未掌握俄语或未完全掌握俄语的居民比例为 58.9%。2002 年的相应比例为 2.3%、25.2%和 64.9%。2011 年的相应比例为 1.5%、20%和 78.5%。在教育领域，俄语自 2005 年起成为一门外语。^③俄语学生的比例，由 1989—1990 学年的 24.3%降至 2010—2011 学年的 1.4%。^④随着格鲁吉亚亲西方政策的确立与实施，英语得到大力普及。2011—2012 学年，70%的学生在外语考试科目中选择了英语，20%的学生选择俄语。

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俄语的生存空间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拓展。1994

① 20 世纪 90 年代初，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宣布独立，并与格政府发生冲突。实现停火后，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成为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2008 年，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的独立得到俄罗斯的承认。截至目前，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的独立并未获得格鲁吉亚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②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Грузии. <http://www.refworld.org.ru/pdfid/548f04404.pdf>

③ Мариносян Т.Э., Куровская Ю.Г.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лож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примере стран Закавказья и Балт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 зарубежн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 2017. Т.1. №.1(35). С.116.

④ Арефьев А.Л.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С.176.

年11月26日，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通过《阿布哈兹共和国宪法》。该法第6条规定，“阿布哈兹共和国的国语是阿布哈兹语，俄语与阿布哈兹语是国家及其他机关用语”^①。除公文事务领域外，俄语在阿布哈兹的教育体系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俄语是所有学校的必修课，共有169所学校教授俄语。2011年，阿布哈兹共有40所俄语学校和16所阿布哈兹语-俄语学校。1993年11月2日，南奥塞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南奥塞梯共和国宪法》。该法第4条规定，“南奥塞梯共和国的国语是奥塞梯语。保护和发展奥塞梯语是南奥塞梯共和国国家政权机构最重要的任务。俄语、奥塞梯语是国家政权、国家管理及自治机关的官方语言”^②。俄语不仅在南奥塞梯的公文事务、大众传媒领域，还在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2011年，在54所学校中共有5.4万名中小学生学习俄语。

（二）语言相关问题争议的持续

实现停火后，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在语言相关问题上的争议仍在持续，并对族际关系的调整与缓和产生影响。

阿布哈兹方面指出，1992年10月22日，格安全委员会、军队故意焚毁阿布哈兹国家档案馆等机构的珍贵语言、民俗及历史文献。^③此举被认为是旨在毁灭阿布哈兹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此外，阿布哈兹族与格鲁吉亚族的族源问题又再次引发学者们的讨论。1998年出版的八年级《地理》教科书中，阿布哈兹语被置于格语语族之列。^④事实上，阿布哈兹语和格语虽同属高加索语系，但属不同语族。前者属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族，后者属卡特维尔语族。关于阿布哈兹语、阿布哈兹族与格鲁吉亚语、格鲁吉亚族的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Абхазии. http://presidentofabkhazia.org/upload/iblock/9b1/Конституция_Республики_Абхазии_2015_03_31_13_14_23_110.pdf

②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Южной Осетии. <http://www.kavkaz-uzel.eu/articles/105143/>

③ Чирикба 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Республики Абхазия. Сухум: МИД Республики Абхазия, 2013. С.15.

④ Рувинский В. Этническое огораживание в советских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ах//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 № 1. С.39.

类似论点在苏联时期就已出现。独立后，部分格鲁吉亚学者仍持此类观点。俄裔美国学者德尔卢扬（Г.М. Дерлугьян）指出，“在部分格鲁吉亚学者的论断中，阿布哈兹语只是格语的一种简单方言”^①。

2008年3月7日，阿布哈兹人民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关于请求承认其独立的两份呼吁书（一份致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另一份致俄罗斯联邦议会）。在呼吁书中，阿布哈兹政府在解释其独立的历史原因时这样写道：“格鲁吉亚实行同化阿布哈兹族的政策，宣布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历史地区，阿布哈兹族是格鲁吉亚族的一个亚民族，关闭阿布哈兹语学校，实行格语教学，将阿布哈兹语地名大规模更改为格语，等等”^②。由此可见，阿布哈兹政府将苏联时期格政府的语言政策，作为其寻求独立的众多依据之一。对此，格鲁吉亚学者潘菲洛夫（О.В. Панфилов）表示，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杜撰了“格鲁吉亚人阻碍阿布哈兹族发展，消灭阿布哈兹语”的说法，其目的是为阿布哈兹独立提供论据支撑。他表示，“阿布哈兹语属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族，阿迪格语直至19世纪中期才有了阿拉伯文字。1928年，阿布哈兹语才有了正式的拉丁文字，属于新近获得文字的语言”^③。潘菲洛夫指出，阿布哈兹学者撰写了大量著作，叙述本民族古老的历史文化。他认为，这些著作都是伪史料，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语言复兴”口号，也毫无依据。

同样，南奥塞梯方面对格政府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合理安排感到不满，这也成为双方达成和解的一个障碍。南奥塞梯方面指出，与格政府谈判期间，格当局颁布的法律并未对奥塞梯语做出任何相关规定，并未展现出解决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问题的应有姿态。^④例如，1997年颁布的《普通法院法》^⑤第10条规定，除阿布哈兹外，诉讼程序均使用格语；1998年颁布的《国家

① Дерлугьян Г.М. Абхазия: резюме этниче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тология: журнал меа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2. №3. С.184.

②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обращения Абхазии к мировому сообществу о признан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http://alaniainform.org/4756-polnyj_tekst_obraschenija_abhazii_k_mirovomu_soobshchestvu_o_priznanii_respubliki.html

③ Олег Панфилов. Полуживой язык Абхазии. <https://ru.krymr.com/a/28836182.html>

④ Чугаенко Ю.А. Грузия-Южная Осет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73-74.

⑤ 普通法院包括区（市）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

公务员法》第 12 条规定，国家的行政管理使用格语，阿布哈兹可同时使用阿布哈兹语。国家及地方自治机关职位的竞选人应掌握格语（第 15 与第 16 条），不懂国语者可被解雇（第 98 条）；1999 年颁布的《行政法》第 14 条规定，格语是行政管理的官方语言，阿布哈兹语作为补充官方语言在阿布哈兹使用；2005 年颁布的《地方自治法》第 10 条规定，国语是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语言和公文事务用语。

与此同时，双方在语言相关问题上的争议仍在持续。1994 年，由格鲁吉亚学者编写的论文集《奥塞梯问题》^①问世。格鲁吉亚学者巴克拉杰（А. Бакраде）在此论文集中写道：“历史上既不存在地理事实上的‘南奥塞梯’，也不存在政治现实上的‘南奥塞梯’”^②。俄罗斯北奥塞梯学者济得佐耶夫（В.Д. Дзидзоев）认为，该论文集具有明显的反奥塞梯色彩。他指出，“什达-卡尔特利与奥塞梯问题”、“散居格鲁吉亚的奥塞梯人问题研究”、“格鲁吉亚领土上的奥塞梯人”和“术语‘南奥塞梯’出现于何时？”等文章意在表明，如今的南奥塞梯与过去的南奥塞梯都不存在，甚至“南奥塞梯”这一术语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臆造的。^③南奥塞梯学者表示，格鲁吉亚学者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加格罗提（Ю.С. Гаглойти）指出，依据较为可靠的希腊-拉丁、古格鲁吉亚及古亚美尼亚语史料，南奥塞梯地区自古就是奥塞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民族领土之一。^④祖加耶夫（К.Г. Дзугаев）认为，这些史料是南奥塞梯共和国合法性的有力论据。^⑤济得佐耶夫也写道：“他们（具有政治倾向的格鲁吉亚历史学家）不仅伪造了格鲁吉亚人与奥塞梯人交往的历史……还完全偷走了后者（奥塞梯人）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⑥。

① Осет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Тбилис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ера-XXI», 1994. 178 с.

② Бакраде А. Вместо предисловия// Осет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Тбилис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ера-XXI», 1994. С.3.

③ Дзидзоев В.Д. Книга «Осет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как антиосетинский манифес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й анализ)// Вестник Владикавказ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2013. Т.13. №.3. С.2.

④ Гаглойти Ю.С.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2006. 27 мая.

⑤ Дзугаев К.Г.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иалог вокруг непризн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апп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Slavic Research Center of the Hokkaido University, 2007. С.83.

⑥ Дзидзоев В.Д. Кавказ конца XX в.: тенденции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ладикавказ: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р», 2004. С.27.

如前文所述，学者们在语言政策相关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还因为他们的身份与立场不同。这种不同意见既遍及语言文化层面，亦侵入相关历史研究领域，影响着语言问题的解决和族际关系的调整，造成族群关系的进一步疏远甚至仇视。

六、结 语

语言政策在格国内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格族际关系的影响，具有独特的复杂性。独立前，苏联政府、格鲁吉亚政府、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政府的语言政策与主张，涉及格国内的几大族群（俄罗斯族、格鲁吉亚族、阿布哈兹族和奥塞梯族），并影响到自治地方主体少数民族语言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的书写方式（基里尔字母和格语字母）。三大层次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造成各族群语言的实际掌握情况与程度出现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俄语在格鲁吉亚人中的实际掌握情况和程度，大大低于其在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中的相应水平；格语在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中的掌握情况，以及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在格鲁吉亚人中的普及率都处于较低水平。三大层面的语言政策引发非主体民族阿布哈兹族与奥塞梯族对自身被边缘化与被同化的担忧，和“去俄罗斯化”在格国内的产生与发展，成为格族际关系紧张的潜在危险因素。独立前夕，由于语言现状的差异性，格政府和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政府的语言规划出现较大分歧。显然，格政府的语言政策旨在使格语取代俄语的实际地位与功能（俄语并无相应的法律地位），从而达到格语法律地位与实际地位的统一。而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政府的语言政策，在于恢复和发展民族语言（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同时保障俄语的实际地位与功能的发挥（赋予俄语与其实际地位相符的法律地位）。格政府和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政府在语言政策上的分歧，造成了语言利益的差别和对立，继而成为格国内族际关系（尤其是格鲁吉亚族和阿布哈兹族及奥塞梯族之间的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独立后，格政府和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政府在语言政策中，分别侧重于英语和俄语（除主体民族语言格语、阿布哈兹语和奥塞梯语外），语言现状出现较大差异。纵观独立前和独立后的语言政策，可以发

现，苏联政府、格政府和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政府的语言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格国内的族际关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如今学者们在一系列语言相关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这不仅加大了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也造成族群关系的进一步疏远甚至仇视。正如格鲁吉亚学者西哈鲁里泽（T.T. Сихарулидзе）所言，“当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选择英语或俄语中的一种作为中介语言进行交流时，双方关系才可能出现转机”。其实，“英语”和“俄语”已不仅指语言本身，也是不同文化和认同的选择与构建。“选择英语或俄语”意味着重新选择文化和认同（格统一国家认同和分离（族群）认同）。

【Abstract】 Due to its unique history, Georgian linguistic policy is rather complex. In the 1920s, initiated by the Soviet government's ethno-linguistic views that "any language is equal", the government of Georgia took the leading role by means of legislation to guarantee the equal rights of ethnic languages, the national language education attain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Since the late 1930s, linguistic policie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have lai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Russian, which forced the Georgian government to speed up its propaganda of Russian and consequently brought about domestic "de-russification" in Georgia. Meanwhile, the Georgian government also strengthened its efforts to popularize Georgian in its linguistic policies, which raised the fear of assimilation among non-dominant ethnic groups, especially the Ossetians and Abkhazians. The tendency of "de-russification" and the fear of assimilation among residents of autonomous areas became a potential danger in triggering tense ethnic relations in Georgia. In the late 1980s, as the government of Georgia began to implement its national language reform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of Georgian* was made and issued), the interests of the language between main ethnic Georgians and non-dominant ethnic Abkhazians, Ossetians gradually show big differences and ethnic relations got worse.. The influence of linguistic policy on the adjustment and mitiga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cannot be ignored.

【 Key Words 】 Soviet Linguistic Policy, Georgian Linguistic Policy, De-russification, Abkhaz, Ossetian

【 Аннотация 】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ему уникально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ю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Грузи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большой сложностью. В 1920-х годах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 «Вс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язык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 —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рузии приняло законы по защите равных пра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языков, чт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о развитию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ю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языков. С конца 1930-х годов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ётк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лась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рузии вынуждено было постоянн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появлению и развитию тенденции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и в Груз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рузии также усилило работу п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что вызвало опасение у иных наций, особенно у южных осетин и абхазцев. Тенденция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и и опасения ассимиляции жителей автономных районов стал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м фактором риска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в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Грузии. В конце 1980-х годов, ког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рузии начало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рефор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разрабатывание и принят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развития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ежду грузинами и иными нациями, особенно абхазцами и южными осетинам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возникал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по языковым интересам,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ухудшению межэтн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Грузии. Нельзя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влияние язык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изменение и ослабление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Груз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Грузии,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абхазский язык, осетинский язык

(责任编辑 孙超)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8年第5期

(总第213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ISSN 1009-721X



定价：30.00元